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БЪЛГАРСКА ЛИТЕРАТУРА

保加利亚文学

杨燕杰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保加利亚文学

杨燕杰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加利亚文学/杨燕杰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ISBN 7 - 5600 - 1735 - 5

Ⅰ.保… Ⅱ.杨… Ⅲ.文学史 - 保加利亚 Ⅳ.I54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632 号

保加利亚文学

杨燕杰 **著**

*　　*　　*

责任编辑: 朱云奇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 //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53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600 - 1735 - 5/H·990
定　　价: 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保加利亚文学史，并重点介绍了十几位保加利亚著名作家，是一本介绍保加利亚文学的通俗读物。全书共分4章，22节。每章包括一个历史时期：古代文学（7—14世纪）、沦陷时期文学（15—19世纪）、资本主义时期文学（1878—1944年）和社会主义时期文学（1944—1989年）。每节的内容或是概括一个历史阶段；或是论述一个重大文学问题（现象）；或是介绍一位重要作家和他的作品。其他重要作家的介绍，则在行文中给予较多的篇幅。为了能让读者了解保加利亚文学的一些背景知识，本书简要介绍了保加利亚民族、保加利亚国家和斯拉夫文字的由来。本书集文学史，作家、作品介绍，作品赏析，文学资料于一身，对读者提高文学素养有一定帮助。由于译成中文的保加利亚文学作品大都出版在几十年前，现在已很难找到，另外也为了增加可读性，本书较多地节录和翻译了一些作品（除两篇外，全是编著者自己翻译的）。本书还比较详尽地叙述了译成中文的保加利亚文学作品的情况，从而为不懂保加利亚文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保加利亚文学，提供了方便。书后附有主要参考书，保加利亚文学大事年表、人名索引、“保加利亚文学在中国”等资料，供读者查阅。

目　录

一历史悠久的保加利亚文学（7—14世纪）

1 保加利亚人的由来

在今天的保加利亚国土上，发现最早的人类遗迹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大约距今10万年至4万年。那时，巴尔干半岛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原始人靠洞穴藏身，并开始学会了取火烧烤食物。基本的社会单位是氏族，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到了新石器时代（约在公元前7000年至3000年间），巴尔干半岛的气候已大为改善，原始人的生活也随着起了根本变化，母系制占了上风。在公元前2000年初，铜器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公元前1000年初，开始使用铁器，经济生活更加发展，并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改变，母系氏族逐渐被男子起主要作用的父系氏族代替。

迄今已知的保加利亚土地上的居民，是属于印欧人种的色雷斯人。但是，他们究竟是巴尔干半岛的土著，还是从多瑙河北面移居过来的，至今还没有考证清楚。色雷斯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他们有相当发达的文化，他们的诗歌和音乐尤为著称。

公元前8至6世纪，原始公社制在色雷斯人当中逐渐解体，他们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市民在爱琴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许多殖民城市，扩大了希腊文化对沿海地带的色雷

斯部落的渗透。公元前 4 世纪，四分五裂的色雷斯各部落被南面强大的马其顿所征服。后来，虽然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独立，但仍处于分裂状态。公元前 168 年，马其顿又被罗马帝国征服。色雷斯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罗马人在征服色雷斯人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文明。但是，这种同化的过程主要发生在城市。此后三个世纪的“蛮族”连续入侵，引起了深刻的种族变化。但是，当时在今天的保加利亚土地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仍然是色雷斯人，他们也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点。

公元 6 世纪，一部分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和波罗的海之间辽阔土地上的斯拉夫人开始移居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同色雷斯人一样，属于印欧人种。据史料记载，斯拉夫人强健有力，吃苦耐劳；体肤洁白，发色浅黄；生活简朴，朴实善良，特别好客。

在斯拉夫人移居巴尔干半岛时，他们的氏族公社制正处在解体阶段。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公社，逐渐演变为由若干邻近氏族公社组成的村社。村社由首领领导，村社成员共同享有牧场、森林、河流、鱼塘等，定期重新分配土地。若干村社组成由酋长领导的部落。

根据斯拉夫人的习惯法，奴隶（主要是战俘）可以赎身，也可以在劳动一段时间之后，成为斯拉夫人社会中的自由成员。

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崇拜各种神灵。他们认为众神之中的主神是佩伦，它是雷电的制造者和一切的主宰。此外，还有牧人守护神维勒斯、天神斯特里博格、火神斯瓦罗格和智慧女神拉达等。斯拉夫人也相信人死后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

斯拉夫人移居巴尔干半岛后，同当地人（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小亚细亚的移民、希腊人、古意大利人、哥特人、匈奴人等）有了直接的关系。这些居民是许多部族（其中有的已被希腊化，有的已被拉丁化）的多彩的混合体。由于在多次异族入侵时遭到屠杀和劫掠，以及饥馑和疾病的不断发生，他们已经大量消失了。因此，斯拉夫人移居后，得以在语言和人种方面同化当地人，而当地人则

在斯拉夫人当中留下了自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许多痕迹。斯拉夫人不仅从色雷斯人那里接受了某些宗教信仰、词语、礼仪和物质文明的成就，而且还因与当地居民通婚而使自己的种族产生了变异。今天，从保加利亚人和南部斯拉夫人的肤色来看，地中海深色素型而不是斯拉夫人所固有的浅色素型占绝对优势，就是一个明证。斯拉夫人在同当地居民的接触中，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民族文化的演变过程。

斯拉夫人获得拜占庭帝国的巴尔干领土和他们在那里的长期定居权，是古代末期和中世纪初期东南欧历史中的重大事件。随着斯拉夫人的到来，开始了斯拉夫和拜占庭的文化与政治的共生现象，从而导致了一种新型的中世纪欧洲文明的形成。

现代保加利亚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原始保加利亚人。原始保加利亚人（又称古保加利亚人）属于突厥－阿尔泰语言民族集团，他们的发祥地在阿尔泰山谷，公元1至2世纪开始从中亚细亚向欧洲东部迁移。最初在高加索北部的里海和亚速海一带定居，同有高度文化的萨尔马特①和阿兰②部族接触，并吸收了他们的部分文化。历史上第一次提到“保加利亚人（保加尔人）”，是在公元354年。公元4世纪下半叶匈奴人的进攻，迫使大部分原始保加利亚人加入了匈奴人向欧洲东部的进军，并定居在潘诺尼亚③和喀尔巴阡山地区。

公元632年，原始保加利亚人几经战乱，终于团结在库布拉特可汗周围，形成了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即东达库班河，西接第涅伯河，北抵顿涅茨河，南达亚速海和黑海的幅员辽阔的“古代大保加利亚”，都城在塔曼半岛的法纳戈里亚（今捷姆留克附近）。

① 古代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草原上讲印欧语的游牧民族。

② 古代顿河和高加索之间讲印欧语的部族。

③ 罗马帝国的行省，相当于今匈牙利西部以及奥地利东部和南斯拉夫北部部分地区

库布拉特可汗死后，联盟瓦解，分成 3 个部落，分属其 3 个儿子。幼子阿斯帕鲁赫率部西进，于 7 世纪 70 年代定居于多瑙河河口一带。这次定居，对保加利亚历史有着重大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原始保加利亚人的纪年法属阴阳历，12 年为一周期,每年都用 1 种动物（6 种家养动物、6 种野生动物）表示，次序严格不变。第一年到第十二年分别为鼠、牛、狼、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种纪年法同中国的纪年法相似。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原始保加利亚人纪年法中的动物有所改变，如虎改为狼，龙改为有翅膀的蛇形怪兽或多角兽。月份也如同中国的历法一样，是用数字表示的。公元 7 世纪开始出现的《保加利亚可汗名录》①，就是用的这种纪年法。这种方法一直到 9 世纪末保加利亚接受基督教为国教时，才停止使用。

原始保加利亚人曾是人口众多的部族。在公元 4 至 5 世纪，分布在欧洲许多地方：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特兰西瓦尼亚、喀尔巴阡山南部地区、高加索和黑海以北地区、伏尔加河流域。也正因为过于分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难于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以致最后连自己的语言都丢掉了。但是，在中世纪初期的保加利亚国家历史中，原始保加利亚人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他们把自己民族的名称给了这个国家；接着，又把这个名称留给正在形成中的保加利亚民族。另外，中世纪初期保加利亚国家的建立、它的军事行政机构的命名和其他制度的建立，都是原始保加利亚人的功绩。最后，原始保加利亚人在创立独特的保加利亚中世纪文化中，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公元 7 世纪下半叶，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在东南受拜占

① 从远古到公元 8 世纪中叶保加利亚可汗的名录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成书于 7 世纪末阿斯帕鲁赫时期；第二部分成书时间不详。名录对每一位可汗都记有姓名、在位时间、家族情况和登基年代，是研究保加利亚人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是在保加利亚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文学文献

庭帝国的威胁，西北受阿瓦尔汗国的侵扰。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局面，他们团结起来，结成了军事部族联盟。定居在多瑙河北面以阿斯帕鲁赫为首的原始保加利亚诸部落，击败了拜占庭的出征，乘胜追击，越过多瑙河，在巴尔干半岛东北部定居下来，成了斯拉夫人的近邻。得胜的原始保加利亚人，在阿斯帕鲁赫的领导下，与当地斯拉夫人的首领结成联盟，从而宣布了保加利亚国家的诞生。

保加利亚国家的诞生，在欧洲，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它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南欧许多事件的进程，推动了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和原始保加利亚人在政治和民族上的团结，为保加利亚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成为反对拜占庭、阿瓦尔人和法兰克人对斯拉夫世界进行扩张的前哨。

2 斯拉夫文字的创立

公元 9 世纪后半期，保加利亚和其他斯拉夫民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斯拉夫文字的创立和应用推广。这一事件是同最早的斯拉夫教育家基里尔(Кирил, 827—869）和麦托迪(Методий，约 815—885)两兄弟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基里尔又名康斯坦丁－基里尔(Константин-Кирил)和基里尔·菲洛索夫(Кирил Философ)。

基里尔和麦托迪出生在拜占庭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萨洛尼卡，那里住有许多斯拉夫人。他们的父亲是拜占庭的显贵，母亲是斯拉夫人。两兄弟在小亚细亚奥林波斯山的一个修道院研修经典，长达 8 年。对经籍的多年研究，促使他们于公元 855 年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立了斯拉夫字母[1]，并在少数门徒的帮助下，将一

[1] 即“格拉戈”字母。这一套字母后来经过改进，称为“基里尔”字母，为许多斯拉夫国家采用。1708 年俄国彼得大帝当政时，“基里尔”字母又简化为“民用字母”，即今日在保加利亚、俄罗斯、马克兰、白俄罗斯、塞尔维亚等许多国家使用的斯拉夫字母

部分祈祷书从希腊文译成斯拉夫文。

公元 863 年，基里尔和麦托迪两兄弟应大摩拉维亚国王的邀请，帮助对抗日尔曼人的军事、宗教和文化扩张。他们的活动使斯拉夫文字得到更大的推广。因此，863 年就成了斯拉夫文字创立之年。

基里尔、麦托迪先后死去。他们的门徒继续在摩拉维亚艰苦奋斗了许多年。但是，日尔曼教士仍不断对他们进行迫害。最后，终于把他们驱逐出境。其中，克利门特（Климент，约 840—916）、纳乌姆（Наум，？—910）和安格拉里（Ангеларий，？—约 886）3 个门徒逃到保加利亚避难。他们受到保加利亚国王博里斯（Борис）的欢迎。当时，博里斯正力图使保加利亚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并想找到开导人们实现其意图的途径。他发现基里尔和麦托迪的门徒正是实现他这一政策的理想人物，于是就把克利门特派往保加利亚西南部的奥赫里德地区（在今马其顿境内）。克利门特在那里成为一个非常积极的教师和传教士。他开办学校，培养了 3500 个学生从事教育和传教工作，创立了著名的奥赫里德学派。公元 893 年，克利门特被任命为奥赫里德地区的主教。麦托迪的另一位门徒纳乌姆则留在保加利亚的新京城普雷斯拉夫，成为另一个学术中心的组织者，创立了普雷斯拉夫学派。克利门特成为主教后，纳乌姆又接替他到奥赫里德地区从事教育工作。

由于基里尔和麦托迪的门徒的辛勤工作，保加利亚成了使用斯拉夫文字的中心，同时也成为斯拉夫文化的中心。曾长期作为这个国家官方语言的希腊文，逐渐为斯拉夫文所代替。

由于斯拉夫文字在保加利亚的传播，文学作品才有可能用人民熟悉的语言创作出来。在这方面，保加利亚人民的条件要比西欧各国优越得多，因为 9、10 世纪西欧各国的书籍几乎都是用人民大众难于读懂的拉丁文写成的。

3 保加利亚古代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到公元 9 世纪中叶，保加利亚加入基督教国家大家庭的条件已经具备。作为一个多神教国家，保加利亚一直被排除在以基督教为思想基础的欧洲精神文明发展的进程之外。保加利亚的统治者和封建贵族，也十分需要一个全国上下一致信奉的统一宗教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思想基础，并强调这一政权是神意的产物。这种统一的宗教，对斯拉夫人和原始保加利亚人的融合，也是十分必要的。

经过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或称牧首）对保加利亚的长期争夺，保加利亚最后皈依了君士坦丁堡教会。从此，保加利亚的历史和命运就永远同东派教会联系起来了，同逐渐形成的统一的拜占庭斯拉夫政治、教会和文化联系起来了。

信奉基督教后，原始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别已经完全消失，一个保加利亚民族最终形成了。

保加利亚信奉基督教最重要的后果，是拜占庭在保加利亚影响的加强。仿效拜占庭的新法制开始推行；拜占庭文学开始在全国传播；拜占庭的宗教绘画和宗教建筑的形式也被采用了。拜占庭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影响，对保加利亚大有裨益。到 10 世纪末，保加利亚已经培养出自己的神职人员以代替拜占庭的神职人员，并且创立了奥赫里德学派和普雷斯拉夫学派，广泛开展了教育和学术活动。保加利亚成了第一个斯拉夫学术中心。

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属于早期封建社会类型。封建关系的形成和确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博里斯的儿子西梅安（Симеон，864—927)在位时，保加利亚领土扩张达到了极点，国家处于全盛时期。保加利亚人民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普雷斯拉夫和奥赫里德两个文化中心的出现、原始保加利亚人的多神教的消失、古保加利亚语成为国家和教会的正式语言，这一切迎来了保加利亚文学的第

一个黄金时代。京城普雷斯拉夫涌现了许多作家：约翰教区长（Иоан Екзарх，9—10世纪）、康斯坦丁·普雷斯拉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Преславски，9—10 世纪）和切尔诺里泽茨·赫拉伯尔（Черноризец Храбър，9—10 世纪）等。他们都得到西梅安的赞助。流传至今的一些普雷斯拉夫作家的作品，足以说明当时文学的兴旺。

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作家当属约翰教区长。传说他曾在著名的君士坦丁堡马格瑙拉学校攻读了 9 年。西梅安皇帝也是该校的学生。约翰教区长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有《天》（约 895 年）和《六昼书》(约 910 年）。《天》是一部神学性质的作品。约翰在编著《六昼书》时，曾利用了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许多希腊和拜占庭作者的作品，并在书中不止一次展开同他们的辩论。这部书的绪论和 6 章中的许多部分，都是作者自己撰写的。作者为了证明《六昼书》中的基本思想——大自然的完全规律性和合理性，除了利用基督教关于创世的传说外，还利用了对人类的生活和制度、对动植物和自然现象的观察，此外还有许多引人入胜的地理描写。因此，《六昼书》实际上是古代保加利亚文献中第一部关于自然知识的百科全书。《六昼书》中还有对于统治者、官吏和人民的生活以及风俗习惯和文化的重要描述。他深入探索世界的合理性与和谐性的强烈愿望，正好说明了他的哲学思想；而观察细腻、描写生动、语言丰富、风格清新，说明他是一位极有天赋的诗人。他创造了许多关于医学、科学和哲学的术语，规定了许多关于抽象概念的词汇，对丰富保加利亚语言，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对西梅安的京城和皇宫有过如下的描写：

> 若有他乡贫者初抵皇城门前，见之定瞠目而不知所至。甫进城来，即见两侧房屋栉比林立，均饰以各色玉石和精雕木刻。及至进入皇宫，更见高大殿宇和教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内部则饰以大理石和黄金白银，其华丽

无与伦比。因斯人在其国内仅见茅屋陋舍，不知人间尚有如此景象，遂惊愕不止。如斯人有幸觐见皇帝，但见圣上端坐前方，身披珠绣皇袍，金链于颈，玉镯于腕，身系紫红锦带，腰佩熠熠利剑。更见两厢大臣，亦身戴金链玉镯，腰围锦带。斯人回乡，若有人询问见闻，斯人必答曰：其美无以形容，惟有身临其境，始信吾言不悖。

这段描述，不仅是流传至今的关于普雷斯拉夫的惟一可靠材料，而且还以其爱国主义的精神，受到后人的崇敬。

切尔诺里泽茨·赫拉伯尔（意译为勇敢的黑衫人）的生平不详，许多学者推断这是西梅安皇帝的笔名。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有《论字母》一书。通过对此书内容的分析可知，这只是一部论战性著作的一部分。目前从各个时代和各斯拉夫国家流传下来的抄本共有六十多种。最古老的抄本包括拉夫伦蒂修道士于 1348 年为保加利亚国王伊万－阿列克桑德尔编著的文集中。

切尔诺里泽茨·赫拉伯尔在这篇文章里介绍了斯拉夫文字的创始情况，热情地捍卫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独立发展的权利。作者在同拜占庭人的斗争中，论证了如下的见解：每个民族都有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一切语言都是得到上帝承认的，世界上万物都在变化和完善之中。切尔诺里泽茨·赫拉伯尔以这些见解坚决反对教会的教条主义和中世纪的繁琐世界观，从而采取了民主和进步的立场。《论字母》是保加利亚文学中第一部论及世俗问题的著作。它以其现实性、丰富的论据、出色的论战风格和作者的博学多才，成为中世纪保加利亚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4 博戈米尔运动和它的文学

公元 10 世纪上半叶，在保加利亚土地上出现了一场震撼欧洲

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博戈米尔运动。宣传和反映这一运动的文学被称作博戈米尔文学。

当时，封建制度在保加利亚日益巩固，农民的处境也日益恶化。各种各样的徭役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大批农民家破人亡。保加利亚教会的活动也出现了危机，上层教士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同他们所宣讲的基督教教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使广大农民对国王、贵族和上层教士的不满逐渐加深。

西梅安皇帝的继承者佩特尔统治时期（927—967 年),农民的不满达到了极点，终于酿成了这场遍及全国的运动。这场运动是由名叫博戈米尔(Богомил ,公元 10 世纪)的神甫发起的,参加运动的人被称作博戈米尔派（或称鲍格米勒派）。由于历代对博戈米尔运动的迫害，传世的博戈米尔文献极少。因此，博戈米尔神甫的生平至今无人知晓。

就其实质来说，博戈米尔运动是一种反抗封建压迫的社会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教义。这种教义是以“异端”形式出现的，即反对以正统教会作为现存制度的支柱。这一运动的观点受到当时在整个拜占庭帝国广泛传播的摩尼教和保罗派的影响。

博戈米尔派是二元论者。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两种创造力在活动 善(上帝)和恶(魔鬼)。他们认为,整个可见的世界和人都是魔鬼的产物，只有人的灵魂，才是神的创造。这两种本原的斗争，将以善和社会的正义的胜利而告终。另一部分博戈米尔派则是极端的二元论者。他们认为善与恶的斗争永无止境，没有胜利者。博戈米尔派痛恨国王、上层教会人士和庄园主，认为上帝厌恶那些为国王效力的人，规劝奴隶不为主子工作。他们的这些主张，有力地震撼了当时社会制度的全部基础。

博戈米尔派揭露正统的教会，否定基督教的许多教条，宣传神职人员是上帝和人之间多余的中介，痛斥他们离经叛道而又贪婪成性、穷奢极侈,是十足的寄生阶层,他们和国王、领主,都是‘魔鬼

的奴仆”。

博戈米尔派拒绝履行既定的宗教仪式和圣礼，如洗礼、圣餐、婚礼等，甚至对十字架、圣像和圣物也概不尊敬。他们认为圣餐的面饼和葡萄酒、洗礼用的水和圣体灯用的油，都是普通的食品和液体，并不神圣和神秘。他们更不相信死者会“复活”。他们在寻常百姓家，甚至露天，进行祈祷仪式，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无所不在。他们只相信《新约》而否定《旧约》，不承认全世界基督教会代表会议和本地教士代表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决议是在《旧约》基础上通过的。他们在努力简化宗教仪式方面，成为英国威克利夫和捷克胡斯等宗教改革家的先驱。

博戈米尔派的教义，反映了劳苦大众对那些养尊处优的富人的深恶痛绝。该派抨击财富，反对衣着豪华和大吃大喝。此外，他们还反对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乱，表达了人们对国王和贵族挑起的频繁战争的痛恨，完全符合普通人们的心情。由于缺乏史料，博戈米尔派早期的组织形式已不可考，只知道公元10世纪时出现了一个总的领导者，手下有门徒若干，称为“使者”。后来，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加，博戈米尔派开始创立宗教组织“弟兄会社”。每个会社都有自己的领导者，由称为“德德茨”的长老担任。到12至13世纪，在保加利亚的西南部和色雷斯地区就有许多会社，其中以保加利亚会社和德拉戈维契亚会社最为有名。

博戈米尔派的教徒，分为3个等级，即“至圣”、“信徒”和“教友”。“至圣”是会社的领导者和教义的传播者。他们必须严守教规，过严格的禁欲生活，弃绝一切世俗安乐。“信徒”和“教友”却不必严格地禁欲修身。其中“信徒”是会社正式成员，而“教友”则不必参加会社。他们还一反基督教的教条，规定女子也可以成为“至圣”，认为女子和男子都是根据同一方式来到人世的，女子并非由亚当的肋骨做成。他们对“至圣”宣传的摈弃世俗、逆来顺受、修身养性等等，并不十分满意。与此相反，这些主要由贫苦农民和城镇居民组成的博戈米尔派教徒宁愿拿起武器进行战斗，争取改善自

身生活，夺回被封建领主霸占的土地，并废除一切赋税和徭役。正统博戈米尔派所宣讲的理论，常常被教徒根据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理解加以修改，变得更富有现实意义，也更加切实可行了。

博戈米尔派的活动集中在他们的弟兄会社中。会社的组织大体上与《福音书》中的基督教团体相似。会社由“至圣”领导，一般举行 4 种仪式：祈祷会（包括共同进餐和布道）、忏悔会（会社成员之间互相忏悔）、“教友”晋升“信徒”和“信徒”晋升“至圣”。

博戈米尔运动的广泛传播，激怒了教会和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早在佩特尔国王统治时期就已对这些异教徒进行了迫害，或加以监禁，或驱逐出境。博戈米尔神甫本人就是被迫害致死的。尽管如此，这一运动已无法根除，因为当时有适合它发展的肥沃土壤。博戈米尔死后，米哈伊尔神甫成了他的继承者，领导这一运动。

博戈米尔运动是中古保加利亚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间接地鼓舞了保加利亚人民进行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号召他们不要对强暴专横的行为无动于衷。这一运动还表达了保加利亚人民对自由、幸福生活、社会正义和平等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在拜占庭统治保加利亚的近两个世纪中（1018—1186 年），博戈米尔运动更为流行。他们当时不仅反对封建压迫，而且也反对外国统治。他们在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也有支持者。他们宣传恶的代表撒旦（恶魔）就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由此可以看出博戈米尔派对拜占庭政权的仇恨。

博戈米尔运动对保加利亚的文化发展，特别是文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博戈米尔派为了在群众中传播教义，不仅进行了广泛的口头布道，而且还发放了大量书籍。他们写出的作品语言生动且通俗易懂，内容丰富多彩，因而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他们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在 5 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博戈米尔运动传播极广，范围远远超出了保加利亚的国界。 11 世纪上半叶，博戈米尔派的传教士到

达拜占庭（色雷斯南部和小亚细亚），使那里整村整村的居民信奉了他们的教义。同时，博戈米尔派教义也开始传到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12至13世纪，博戈米尔派教义更远传至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博戈米尔派的二元论与当地情况结合，促进了有名的卡特里[①]教派和阿尔比教派的运动在这些国家发展，成为西欧对天主教的第一次群众性反抗，也为后来出现的宗教改革运动准备了条件。

博戈米尔文学是与博戈米尔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同时存在的。作为运动的精神武器，它的使命是反对正统教会和封建制度的教条。博戈米尔文学属于欧洲中世纪最早的反教规作品，与伪经有着密切联系并互相影响，代表了保加利亚古代文学中的民主路线。因此，它受到历代当权派的残酷迫害，作品流传至今的只有一些片段。它的形式一如经书，内容则取自圣经和伪经中的传说以及民间创作里的神话。它被称为“异端邪说”，因为它随意改动教会认定的关于基督的传说和概念，把一些博戈米尔派关于创世和社会的新思想加了进去。很多作品都是匿名的，但是流行很广，甚至传到国外。少数署名的作品都是博戈米尔派领导人的著述，体裁接近伪经文学和民间创作，内容大多是宣传上面介绍过的关于博戈米尔派的教义、活动形式和对封建主和教会上层的反抗。博戈米尔派最重要的著作是《秘经》(*Тайната книга*，10—11世纪）或称《约安福音》。这部书最完整地表述了温和的博戈米尔派关于创世和世界末日的观点，其古保文本已经失传，现今只有保存在意大利的两种拉丁文译本。书是以使徒约翰和耶稣的对话形式写成的，内容则是典型的博戈米尔派的二元论。它认为根据罪恶秩序建立起来的物质世界必定要消亡。创世说和神学的表述，都与一定的社会思想相联系。对社会制度采取不妥协的态度。这些都鲜明地

① 或译清洁派、纯洁派，强调持守“清洁”(希腊文 Katharos)，反对腐化，因而得名。是11至13世纪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流行的博戈米尔派式的宗教派别。

反映了博戈米尔派的造反精神。《卡特里圣礼书》记述了博戈米尔派的仪式，其中有许多关于异端会社的性质和组织的珍贵材料和关于这些异端礼仪的描述。《十字树记》也是一部讲述博戈米尔派活动的作品。

在博戈米尔派文学的影响下产生了许多二元论的故事和传说，都是民间创作的精品。博戈米尔派作品和民间创作的相互渗透，说明保加利亚博戈米尔派具有深刻的人民性，也说明这一运动对保加利亚历史的重要意义。

5 保加利亚古代文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保加利亚在西梅安统治时期曾扩张了大片领土，此后即开始衰落。频繁的战争和封建贵族日益加深的压迫，使人民财尽力竭，陷于绝境。拥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贵族，羽毛既丰，便开始要求获得更大程度的自治，对国王也不再惟命是从。国家的衰落，引来了外部的入侵，其中以拜占庭最为危险。公元 971 年，拜占庭攻陷了保加利亚京城普雷斯拉夫。保加利亚东北部沦为拜占庭的一个行省。但是，保加利亚西南部在 4 个贵族兄弟的领导下，建立了西保加利亚王国，先后定都于普雷斯帕和奥赫里德。西保加利亚同拜占庭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殊死斗争，有时甚至还占了上风。尽管人民进行了顽强抵抗，保加利亚的许多贵族却已经倾向媾和。1018 年，京城奥赫里德终于被拜占庭人攻陷。

拜占庭对保加利亚的黑暗统治持续了将近两百年。这一时期，保加利亚人民的文化生活受到极大限制。直到 1187 年，保加利亚人民通过起义，经过多次战斗，才解放了自己的国家，文化生活才得到恢复和发展。13 至 14 世纪，保加利亚文化更达到了全盛时期。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许多流派，呈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保加利亚文学从而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

第二保加利亚王国文学的主要成就出现在 14 世纪下半叶。

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埃夫蒂米宗主教（Патриарх Евтимий，约生于1325—1330年间，死于14世纪末）。他生于京城特尔诺沃一个知名的富裕家庭，1350至1363年在特尔诺沃南面的基利法雷沃修道院做保加利亚静修派著名创始人特奥多西·特尔诺夫斯基的门徒和助手，曾随特奥多西去君士坦丁堡，后又只身去东正教宗教文化中心阿托斯山，1371年才回到保加利亚京都附近的圣三一修道院，专心从事学术活动，奠定了特尔诺沃学派的基础。1375年被选为特尔诺沃的宗主教。他相信可以通过消除道德沉沦和提高人民的道德观念，通过禁欲主义和静修，通过消灭异端邪说和保持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与威望，来拯救保加利亚。特尔诺沃被土耳其人攻陷后，埃夫蒂米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人民进行抵抗。后被土耳其人流放到保加利亚南部，并在那里去世。

埃夫蒂米主张文学必须表达事物的绝对实质和永恒的内核。因此，他修订了大量经文，并亲自翻译。他的译本在俄罗斯、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广为流传。

埃夫蒂米最重要的文学活动是撰写行传，他为伊万·里尔斯基[①]、佩特卡·特尔诺夫斯卡、伊拉里安·默格伦斯基、菲洛特亚等人写的行传，都贯穿着静修派的宗教哲学思想，并将宗教题材同对保加利亚历史的颂扬与由于土耳其人的严重威胁而产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巧妙地糅合起来。其中最有名的是《伊万·里尔斯基行传》。他写的赞辞以其充沛的感情、完美的风格和华丽的语言，为保加利亚文学增添了光彩。他给各国宗教界和政界人士写的信札，不仅反映了他在同代人中所享有的威信，也反映了他处理宗教和社会问题的才能。

埃夫蒂米不仅以文学作品闻名于世，他还是为创造统一的文字拼法而进行改革的奠基人。

① 伊万·里尔斯基(约876—946年）是一个独居修道士，为了抗议封建剥削而隐居里拉山，创建里拉修道院，著有训诫门徒的《嘱言……》，被人民奉为圣徒。

格里戈里·察姆布拉克（Григорий Цамблак，约 1364—1420年）是埃夫蒂米的门徒。他的主要作品是训诫辞和赞辞，其中以颂扬埃夫蒂米宗主教的赞辞最为有名，是保加利亚中世纪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赞辞运用戏剧性的艺术手法，描述了土耳其人对特尔诺沃的围攻以及京城沦陷后居民的遭遇。保加利亚亡国后，格里戈里·察姆布拉克流亡俄国，1414 年被推选为基辅的大主教，并于 1418 年参加了在德国南部康斯坦茨召开的世界基督教会代表会议。

保加利亚沦亡后，一些著名的文人学者被迫流亡异国，除了格里戈里·察姆布拉克外，还有康斯坦丁·科斯特内奇基和基普里安等人。前者在塞尔维亚活动，后者在俄国工作，并被任命为莫斯科的大主教。他们对当地的文学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在宗教文学发展的同时，还出现了相当多的世俗作品。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将百科知识同传奇故事结合起来，其中许多译自希腊文。例如，有一本名为《生理学家》或《博物志》的书就极为流行。《特洛伊寓言》也广为流传，内容是关于特洛伊战争的。14 世纪时，保加利亚社会对国内外历史事件的兴趣大大增加了，这些历史记述成了后人了解第二保加利亚王国晚期的重要资料。这一时期的经外文学也有了很大发展，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经济生活、农村生活、占卜术、世界和人类的起源以及人民的渴望等等。

保加利亚文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指的就是公元 14 世纪的下半叶。与国家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时期的文学却达到了保加利亚中世纪文学的高峰。伊万·阿列克桑德尔国王在位时相对长久的和平时期、经济的繁荣和丰富的文化传统的发扬，使得保加利亚在 15 世纪较西欧能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早期文艺复兴的气息。在西欧，城市受制于封建主，因而发展缓慢；而在巴尔干地区，城市受中央国家权力统治，市民一般生活比较自由，国家统治者比较关心并大力鼓励手工业、商业和艺术的发展。此外，在中世纪的西欧，宗教势力在国家生活和人民思想方面占有

统治地位，而在巴尔干地区，由于种种历史的和客观的原因，世俗权力具有无可争议的垄断地位。巴尔干地区属于拜占庭文化范畴，这种文化具有相当多的古代文化的遗风，从而成为引向文艺复兴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的桥梁。

以埃夫蒂米宗主教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学者，更成了保加利亚文化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中坚。与此同时出现的世俗作品和经外文学，则具有更加浓厚的文艺复兴精神。 14 世纪后半叶保加利亚文学的这一高潮，使保加利亚进入迈向新时期的国家的前列。不幸的是，奥斯曼帝国对东南欧的野蛮入侵粗暴地中断了这一大有希望的高潮。

6 保加利亚的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是人民的语言艺术，也就是口头创作。它早于书面文学，并且是书面文学的渊源之一。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特别是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民间文学，对欧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的特殊原因，这种民间文学较之其他欧洲国家的民间文学得到了更好的保存，是研究欧洲乃至印欧语系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据。

保加利亚的民间文学分韵文和散文两大类。韵文主要指民歌①，大致可分为神话歌、礼仪歌、历史歌（包括勇士歌、海杜特歌等）和生活歌（包括劳动歌、情歌、催眠曲等）。散文则包括民间故事（民间神话、民间传说）和笑话等。由于民间文学在发展、题材、体裁等方面的独特性，我们打破时期的界限，在这里作单独的介绍。

在神话民歌中交织着远古的多神教和基督教的传统，这些民歌的内容多是关于人与超自然生灵（如女妖、怪兽等）之间的关系。

①有中译文，《保加利亚民歌选集》，新文艺出版社，1958 年，上海

礼仪民歌只在由基督教历法规定的宗教节日演唱，人民政权建立后也在一些民间节日演唱，婚丧嫁娶时演唱的民歌也属于这一类。下面就是一首新年时演唱的民歌：

寒冷的年，快乐的年

寒冷的年，
快乐的年！
地里的麦穗饱饱的，
腰里的钱包鼓鼓的，
园里的苹果红红的，
家里的绸缎落落的，
健健康康到明年，
到明年，祝您过个快乐年！

礼仪民歌大都由一组人演唱，他们到村里各家轮流演唱几首。如果村庄较大，也可以分成几组。各家主人对演唱者都要表示感谢，送些糖果或零钱。男演唱者身背口袋，女演唱者手提小篮，用来存放收到的礼品。如果主人不想听歌，演唱者也可以不唱，但是主人必须赠送礼品。

勇士民歌一般都比较长，主要由男子演唱。在民歌中最早出现的勇士是莫姆齐尔（Момчил），但是从他的诗歌形象中很难了解他的生平。后来出现的另一个勇士克拉利·马尔科（Крали Марко）逐渐成了勇士民歌中最著名的英雄，他不仅是保加利亚人民的传奇人物，而且还是所有南部斯拉夫民族的崇拜对象。克拉利·马尔科曾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原型是封建领主马尔科（Марко，1371—1395），经过历代人民的精心加工，已经成了一个非凡的英雄，力大无比，智慧超群，是与人民命运相连、体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愿望的传奇人物。他的结拜妹妹是经常帮助他的山中女妖（самодива），这些女妖一般都住在山上，留着浅褐色的长发，穿着雪

白的长衫。有意思的是，在民歌中莫姆齐尔还是克拉利·马尔科的舅舅。在勇士民歌中还歌颂了另外一些英雄。

海杜特（хайдути）民歌比勇士民歌出现得要晚些（14世纪以后）。海杜特是土耳其统治时期反对土耳其压迫的人民的保护者和复仇者。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们逐渐在深山老林结成队伍，有首领和旗手，成为经常性反抗压迫者的起义队伍，这一运动被称为海杜特运动。这些民歌歌颂的都是有名的抗击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英雄。海杜特民歌一般比勇士民歌要短小，而且所描写的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

民歌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内容，重要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都在保加利亚民歌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保加利亚人民曾遭受奥斯曼帝国长达500年的异族压迫，这一不幸的历史时期在保加利亚民歌中有着大量描述。下面这首在保加利亚流传久远的民歌，就道出了保加利亚人民在异族奴役下的苦难：

山里人约沃，你答应不答应？

“山里人约沃，你答应不答应
让美丽的亚娜信奉土耳其教？”
“老总，我宁愿不要头颅，
也不让亚娜信奉土耳其教！”
他们砍掉了约沃的双手，
又开始审问：
“山里人约沃，你答应不答应
让美丽的亚娜信奉土耳其教？”
“老总，我宁愿不要头颅，
也不让亚娜信奉土耳其教！”
他们砍掉了约沃的双脚，
又开始审问：

“山里人约沃，你答应不答应
让美丽的亚娜信奉土耳其教？”
“老总，我宁愿不要头颅，
也不让亚娜信奉土耳其教！”
他们刺瞎了约沃的双眼，
也顾不得审问，
就抱起美丽的亚娜，
把她抬上快马
迫不及待奔向山脚，
奔向山脚，土耳其人的老巢。
亚娜轻声对约沃说：
“约沃哥,再见了!”
“美丽的亚娜，祝你一切安好！
我虽失去双眼，但能看到你的容貌，
我虽失去双手，但能把你拥抱，
我虽失去双脚，但还能送你一遭！”

1923年9月23日，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民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法西斯武装起义。起义不幸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不能再留在保加利亚。为了保存力量，他们流亡到苏联。下面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就是歌颂这次斗争的：

春光明媚

春光明媚，露珠沾湿三叶草，
美丽的伊丽娜正在采鲜花，
采鲜花呀——野天竺葵和樱草，
这两种花的相貌一点也不差。

春光明媚，露珠沾湿三叶草，

美丽的伊丽娜正在采鲜花，
采鲜花呀——野天竺葵和樱草，
边采边唱，春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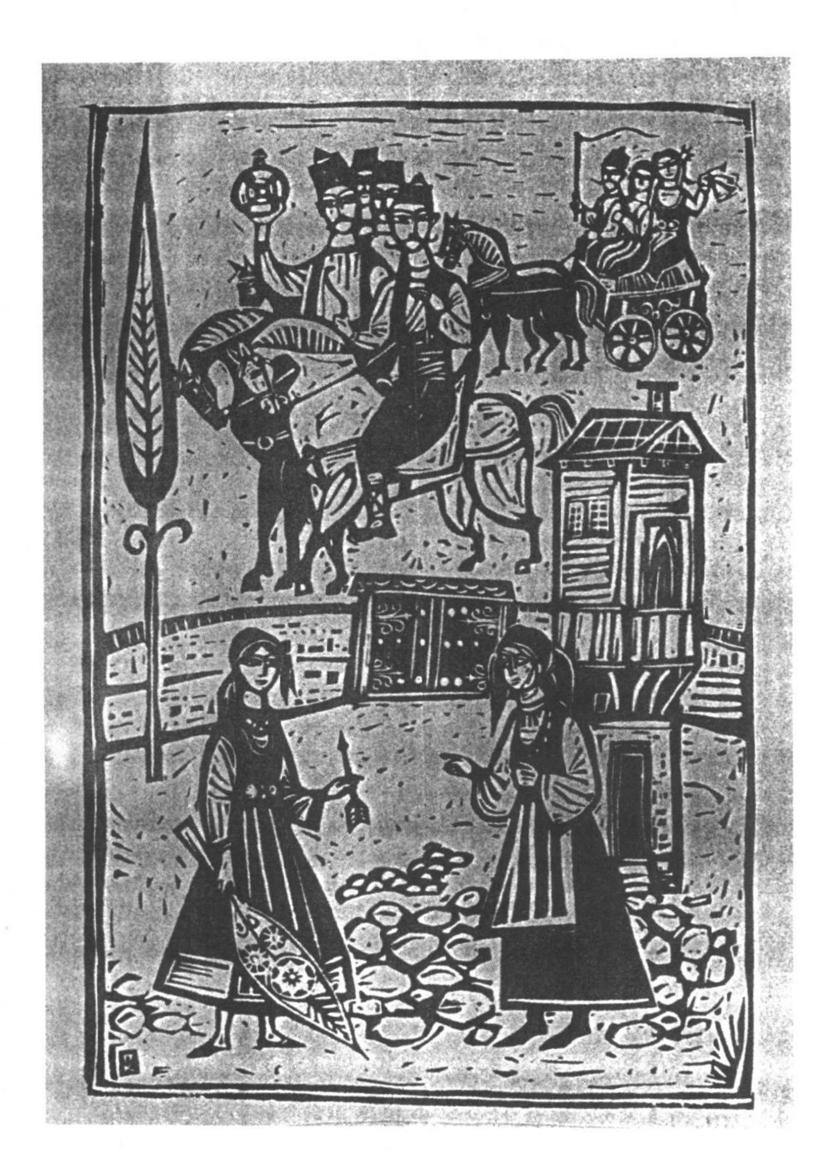
我等着情人快回来，
英俊的密特科快把我亲吻。
为什么我的情人还不回来？
为什么也不给我捎封信？

他在布尔什维克的国家里做什么？
还惦记我吗，密特科，我的爱人？
莫非有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把他迷住……
他是个小伙子——谁知道他的心？

我不相信。他是个多么老实的人；
他还把戒指送我留作纪念！
春光啊，春光，狂热的青春，
我这短暂的欢欣！

春光明媚，露珠沾湿三叶草，
美丽的伊丽娜把那鲜花采，
一边采花，一边叹息，
微风吹得树枝东摇西摆。

树枝上有只灰色的小鸟，
不停地向我唱着奇妙的歌：
“来，姑娘，让我们一起去把英雄找，
他就在那边等着你呢，你的密特科。”
鸟在天上飞，姑娘在地下跑，



保加利亚人过新年

姑娘不安地问：他在哪里？快对我说！
春光啊,春光,狂热的青春，
我这短暂的欢欣！
那边有座坟墓，长满荒草，
墓上落着一只骄傲的雄鹰，
雄鹰保护着坟墓，不让风吹雨打，
因为它也喜爱那起义的英雄。

雄鹰鼓着翅膀飞去，
好像小伙子，飞在暴风雨中。
伊丽娜喊着，哭了起来。
树上的叶子轻轻对她说：
“我的情人啊，美丽的伊丽娜，
眼睛像葡萄酒一样黑的伊丽娜！

“我的爱人啊，我有许多同志，
他们全是英俊的起义者，
挑一个你最喜爱的吧，
你要对他忠诚，我的小妹妹，
我亲爱的人，纯洁的小白鸽。

“寻找我那沉重的脚印吧：
在山林中，在河谷里！
到所有隐蔽的茅屋中去！
哪里有痛苦就到哪里去！
你会看到我那忠诚的脚印——
你可以跟着血迹寻找，
你顺着这些脚印就可以登上顶峰，
比雄鹰飞到的地方还高。”

劳动民歌使人们在艰苦的劳动中增加一丝情趣，减轻一些重负，得到一点慰藉。在旧日的保加利亚农村，每到收割小麦的季节，尽管烈日当空，田野上总有女歌手此起彼伏地引吭高歌，人们手中镰刀的唰唰节奏也随着快了起来。

姑娘和牧童比赛收割

牧童在高岗上，
在绿色的枞树旁，
向姑娘高声喊：
“姑娘,快快歇晌，
已经是中午时光。”
姑娘对牧童说：
“小牧童,别骗我，
姑娘自己知道，
太阳什么时候从当空过。
到那时镰刀刀口发黑，
田野里的麦穗下垂，
荒草也干得睡倒。
来，年青的牧童哥，
让我们比赛收割，
如果你赢了我，
你就把我领走和你一起过；
如果我赢了你，
你的羊群就归我！”
姑娘敏捷伶俐，
她把牧童赢了，
把他的羊群赶走不算，
还带走了他盛水的木桶。

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是生活民歌的重要内容。下面的一首民歌就是描述女儿出嫁前惜别和对结婚后的生活感到彷徨的心情：

再见了，妈妈，再见了

再见了，妈妈，再见了！
咱们一直相靠相依，
今朝要分离。
我要和公公婆婆、
大小姑子、大小叔子，
还有比我大的妯娌
吃饭在一起。
再见了，妈妈，再见了，
浇我的花儿，可别忘记：
清晨用露水，
中午用井水，
晚间，妈妈啊，用泪水。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民歌中也不例外。爱情歌大概是民歌中数量最大的一种。有纯粹描写爱情的，也有同其他内容交织在一起的。上面引录的《春光明媚》，同时也是一首哀婉的爱情民歌。下面，我们再引两首人们熟悉的爱情歌：

紫 罗 兰

紫罗兰啊，紫罗兰，
你爱上了哪个小伙子？
我爱上了黑眼睛的小羊倌，
黑眼睛的小羊倌，名叫伊万。

他会做精致的牧笛，
精致的牧笛，还有精致的纱杆。
他给我做了一个新纱杆，
还把他自己画在上边。
我纺纱时就能把他看见。
他还做了一个悦耳的牧笛，
又把我画在上边，
好让他在吹笛时能把我仔细观看。

细雨霏霏似珍珠

细雨霏霏似珍珠，
我的情郎备鞍要上路，
要去远方挣大钱。
我苦苦向他恳求：
“情郎啊,情郎,你听清楚，
今年冬天你就别再出走。
金钱什么时候都能挣，
青春啊，青春，却一去不回头。
青春就像那晶莹的朝露：
降落在清晨，消失在太阳出！”

生活中少不了幽默，而人们在幽默中常常能看到自己的缺点：

新娘夸新郎

我的新郎真能干，
一天能耕一垄田，
一周能耕一畦田，
一月能耕一亩田，

一年能耕一决田。
新郎没耕多少田，
打个瞌睡真香甜。
他把犁杖插田间。
那该死的梨木犁杖不一般，
它趁着新郎打瞌睡，
长出了新芽一片片，
又结出了甜梨黄灿灿。
新郎醒来一睁眼，
嚯，索性把梨吃个完。

保加利亚民歌的大规模收集和整理工作始于 19 世纪。1861 年，迪米特尔·米拉迪诺夫（Димитър Миладинов，1810—1862）和康斯坦丁·米拉迪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ладинов，1830—1862）两兄弟在萨格勒布出版了第一部保加利亚民歌集—《保加利亚民歌》。米拉迪诺夫兄弟都是民族复兴时期的教育家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士，他们的活动激怒了奥斯曼当局，双双被投入狱，并遭杀害。他们的这部巨著对研究保加利亚民族文化和民间创作具有特殊意义。19世纪下半叶，许多保加利亚报刊杂志都刊登保加利亚民间创作作品。其中以《民间创作集》年刊的影响最大。保加利亚著名诗人潘乔·斯拉维伊科夫（Пенчо Славейков，1886—1912）也编选了名为《歌书》的民歌选。据统计，至今已经收集到 120 000 首保加利亚民歌。

由于民间文学中的谜语和谚语也常常是有韵的，所以也归在韵文之列。这些谜语和谚语与保加利亚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因而它们是研究保加利亚民俗学和民族志的重要源泉。

保加利亚民间文学中的散文主要是民间故事、传说和笑话。民间故事又分为神话、生活故事、动物故事等等。保加利亚的民间故事与印欧各族人民的古代神话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深受阿拉伯

民族和其他东方民族的民间故事（如《一千零一夜》）的影响。

保加利亚神话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非凡的人物，是姑娘则美貌绝伦，是小伙子则英勇无比。“神水”（或称“生命之水”）能起死回生；“神帽”能使人隐身；“神袋”能使财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神话中常常出现怪兽（三头或九头飞龙）。

保加利亚的动物故事中最常出现的是狐狸和狼。狐狸代表狡猾和阴险；狼则代表力量和愚蠢。一般是狼受狐狸的愚弄。狗熊也是保加利亚民间故事中经常出现的动物，它一般代表正义。刺猬在保加利亚民间故事中是受人尊敬的动物，有一个故事中说它曾以智慧拯救了世界，大意是：一天太阳想结婚，地球上的万物都十分高兴，并积极准备婚礼，只有刺猬感到十分不安，它认为太阳结婚后必然要生出许多太阳，地球就要烧焦了。刺猬用花言巧语规劝太阳打消了结婚的念头。所以太阳至今还是一个单身汉。

保加利亚的生活故事与保加利亚农村的生活密切相关，主要题材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问题。儿媳与公婆之间的微妙关系构成了许多故事的内容。

笑话中最常见的主人公之一是狡猾的彼得①。关于彼得的笑话出现在土耳其奴役时期，其中的很多内容也可在土耳其民间故事中看到，但是主人公的名字换成了纳斯特拉丁·霍查。在保加利亚的笑话中常常可以看到狡猾的彼得与霍查相遇而彼得赢了霍查。加布罗沃笑话②是很典型的保加利亚笑话。加布罗沃是19世纪兴起的保加利亚中部的一个工商业城市。那里的人们十分重视节俭，但有时做得过分，成了笑柄。加布罗沃笑话中说，加布罗沃城里的猫都没有尾巴，因为这样人们在它们冬天出入房间时可以

① 又译“希特尔·彼得”，有中译本，见《两分钟幽默故事》，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湖北。

② 有中译本，《加布罗沃笑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另见《两分钟幽默故事》，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湖北。

把门关得快些，以减少热气的损失。又说加布罗沃的医生为了节省，把生前在诊所门前挂着的大理石匾牌当做墓碑使用，以至在墓地上还会看到“某某大夫在此应诊”的字样。秃尾巴猫后来就成了加布罗沃市的市标。

传说与民间故事之间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真实的而后者是虚构的。其实这只是在叙述的方式和口气上的不同。很多传说也完全是虚构的。传说可分为宗教的、哲学的和历史的3类。在保加利亚之所以有许多宗教方面的传说，是因为保文圣经早在公元9世纪就翻译出来了，而在欧洲许多其他国家直到14世纪以后才有本民族语言的圣经。这种传说其实常常只是用了神和一些使徒、圣者的名字，内容则常是一些哲理，通过神和魔鬼的斗争反映人间的不平。历史传说也常常与史实相去甚远，甚至毫不相干。它们只是反映了人们要求保持民族历史传统的殷切愿望而已。

二保加利亚文学呻吟在奥斯曼帝国的异族统治下(15—19世纪)

1 修道院——文学的庇护所

保加利亚沦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以后，它的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几乎所有的教堂、修道院、城堡以及许多艺术品和建筑古迹都遭到破坏。土耳其人的用心是不让它们唤起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意识。不少教堂改为清真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土尔其人禁止保加利亚人修复旧教堂或兴建新教堂。珍贵的文献古籍遭到焚毁，大批学者被驱逐出境。为发展文化提供经济来源的保加利亚封建统治阶级也被消灭了。宗教事务和文化生活的领导权则大部分掌握在希腊人手中。真正的保加利亚文化处处受到压制。尽管如此，土耳其的统治和希腊人的垄断并未能扼杀保加利亚文学。处在国家沦陷条件下的这种文学，在形式和思想内容方面，都起了质的变化。这种文学变得日益通俗和富有民主精神，它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和实现统治的工具，而成为人民反抗征服者的武器。

进入17世纪，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保加利亚的文学具有了新的特点：不拘泥于中世纪的传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还促使

语言发生变化，口语大量进入书面作品。一种更接近人民的新的保加利亚文学也出现了，它不仅保留了宗教性质，而且有大量世俗内容。但是，这些变化都是十分缓慢的，中世纪的传统还是保加利亚文学的基本内容。

沦陷时期的保加利亚文化，有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修道院成了文化的主要中心。这些修道院有的幸免于难，有的则在原来的基础上逐渐修复起来。其中以里拉山①深处的里拉修道院、罗多皮山②中的巴奇科沃修道院、埃尔马河畔的波加诺沃修道院（在今南斯拉夫境内）、巴尔干山区的埃特罗波列修道院和切雷皮什修道院，以及普罗夫迪夫附近的库克伦修道院影响最大。阿托斯山上的希伦达尔修道院和佐格拉夫修道院（均在今希腊境内），在保加利亚文化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许多修道院还在城镇和乡村设立分院。修士被派到这些分院去募集捐款或带领教徒去本院朝圣。修士还在分院和本院他们居住的斋房里开办"私塾",担负起培养神甫、修士、学者、艺术家、雕刻家的任务。一些较大的修道院还同俄国的教会和修道院保持着联系，并不断派出修士去俄国募捐，接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心是里拉修道院。15世纪下半叶，著名的学者弗拉迪斯拉夫·格拉马蒂克（Владислав Граматик, 约1410/1412—15世纪末）曾在这里工作，他的名著《里拉修道院之修复及伊万·里尔斯基圣骨自特尔诺沃迁回始末》一书（文学史上一般称为《里拉记事》（Рилска повест）,被认为是埃夫蒂米的《伊凡·里尔斯基行传》的续篇，详细记述了1469年迁移圣骨的过程。这一活动，在土耳其统治下成了人民反抗异族压迫的一次示威。作者以悲壮的笔触深刻表达了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和深埋在内心的爱国主义激情。这篇著作成为记述土耳其统治初期保加利亚人

① 在保加利亚西南部，主峰穆萨拉高2925米。

② 在保加利亚南部，主峰高2191米。

民悲惨处境的珍贵资料。《里拉记事》对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里拉修道院工作过的还有约西夫·布拉达蒂(18 世纪末），他的活动主要是用人民熟悉的现代保加利亚语言，翻译萨洛尼卡修士达马斯金·斯图迪特的劝人为善的教喻，即所谓的《达马斯金文献》(*Дамаскинска книжнина*)。

公元 16 世纪，索非亚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中心。著名学者佩约神甫(Поп Пейо,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和马特伊·格拉马蒂克(Матей Граматик, 16 世纪）都在这里活动。佩约神甫写了《格奥尔基行传》，这是一部记述索非亚金匠格奥尔基因为拒绝接受伊斯兰教而被土耳其侵略者活活烧死的故事。作者不顾生命危险，亲自将格奥尔基的遗体偷偷运走埋葬。这部作品突破了使徒行传的束缚，是一部充满爱国激情的传记。马特伊·格拉马蒂克则写了《尼科拉行传》。尼科拉是一个鞋匠，也因不愿当伊斯兰教徒而被杀害。这部行传也写得十分生动。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描写,成了 16 世纪索非亚学派的特点。行传中对索非亚城的描写，充满了歌颂保加利亚人民的英勇和智慧的内容，成为这一城市历史的珍贵材料。

反映保加利亚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的编年史，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化遗产。其中以 15 世纪的《保加利亚纪事》和麦托迪·德拉吉诺夫神甫的编年史笔记最为著名。前者对土耳其的入侵有详细描写，后者主要记叙了 1657 年在切皮诺（罗多皮山脉西部）发生的强迫保加利亚人信奉伊斯兰教的事件。

15—18 世纪中期保加利亚人民的生活还反映在许多民间创作中。民歌、民间故事和传说，特别是民间传说，十分丰富。其中许多内容都表达了对侵略者的反抗和被奴役的痛苦，歌颂了弃家进山抗击民族敌人的“海杜特”。这种民间创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抗敌英雄克拉利·马尔科为主人公的（详见本书第一章第 6 节）。

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的 500 年异族统治，对保加利亚人民是空前的民族灾难，其残酷无情的程度是难以想像的。保加利亚

人民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他们的文物古迹遭到彻底破坏，文化名人遭受杀害或被赶到国外，他们的精神遭受摧残、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更有甚者，土耳其人还惨无人道地实行被称为“德夫希尔梅”(девширме）的血贡制度，即定期从保加利亚家庭中选征身强力壮、聪明能干的少年，将他们送到专设的营校，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把他们训练成被称作“埃尼恰林”（еничарин)的效忠伊斯兰教的士兵，成为奥斯曼帝国陆军中镇压被奴役人民的精锐部队。

尽管如此，几百年来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异族压迫的起义斗争从未停止过。由于东正教教会，特别是修道院锐意保存保加利亚文化遗产，由于保加利亚文化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奥斯曼帝国的500年统治一直未能同化保加利亚人民。保加利亚人民终于保存了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并且通过长期的英勇斗争，赢得了民族的解放，恢复了自己的民族尊严。

一位忧国忧民而又博学多才的修士，吹响了民族复兴的号角。他就是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Паисий Хилендарски，1722—1773）他那部催人觉醒、引人入胜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成了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

2 文学——民族复兴的号角

18世纪后半叶，保加利亚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时期——民族复兴时期(1762—1878年）。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启蒙运动、通过建立独立的保加利亚教会争取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地位和人民革命运动三个阶段。

这一时期的到来，是当时保加利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土耳其封建制度的解体以及在这一制度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构成了民族复兴运动据以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这时，保加利亚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和同西欧各国贸易的扩大，破坏了

土耳其帝国的封建自然经济，动摇了帝国军事力量的基础，加速了帝国的衰落进程，帝国政府企图通过加强中央统治和加紧剥削来挽救危机，结果却加深了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受异族压迫的人民群众，要求复苏民族意识和开展启蒙运动，从而开始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酝酿和舆论准备阶段。

《斯拉夫保加利亚史》这部划时代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保加利亚民族复兴这一伟大时期的开始。该书作者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首先看到了保加利亚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他对受难的祖国充满热爱，向人民指出解放之路，成为人民愿望的表达者、民族复兴运动的伟大号角。

关于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生平的历史材料十分缺乏。人们从他本人在《斯拉夫保加利亚史》的序和跋中透露的有关情况，以及他曾经居住过的两个修道院的大事记中的某些记载，加以研究推论，才得到一个大致的轮廓。

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生于保加利亚西南部的班斯科城。1745 年到阿托斯山（在今希腊境内）的希伦达尔斯基修道院，投奔其兄，并当了修士。后被修道院派出巡游全国。他在各地目睹了人民亡国之苦，遂萌发了撰写自己民族历史的念头，决心全力论证保加利亚人民有取得自由的权利，唤醒深藏在同胞心中的爱国激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不顾身体虚弱和收集资料的重重困难，走访了阿托斯半岛的所有修道院和保加利亚境内的许多地方，耐心查阅古籍和手稿，终于在 1762 年完成了自己的光辉著作《斯拉夫保加利亚史》。为了使这部历史作品真正起到动员作用，他又致力于组织抄写和传播的工作。他特别注意在普通老百姓当中进行宣传，收集农民、牧民、手工业者的反应，以验证它的鼓动效果。1773 年死于带领朝圣团去阿托斯半岛的路上。

在内容上，《斯拉夫保加利亚史》与过去的保加利亚一切著作迥然不同。它充满了具有号召力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篇唤起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意识，号召他们反对异族压迫者的宣言书。在

书的前言中，他敦促读者热爱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保加利亚名字，不要耻于当保加利亚人。所有保加利亚人都应当热爱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语言读书写字。他谴责那些耻于说出自己的保加利亚出身，并崇拜希腊文化而宁愿被人看作是希腊人的同胞。

为了提高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帕伊西用重墨描绘了中世纪保加利亚的伟大成就、对拜占庭的多次胜利、保加利亚人民的英勇气概、古保语和斯拉夫语字母的创始者基里尔和麦托迪兄弟的业绩、保加利亚对繁荣斯拉夫文化的贡献等，他还将保加利亚当时受压迫、遭奴役的悲惨状况同克鲁姆、西梅安和中世纪其他保加利亚皇帝在位时的繁荣强大作了对比，以建立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和争取精神和政治解放的决心。帕伊西的著作一出现，就对提高人民的觉悟起了巨大的作用。它如同圣物一样在全国迅速传抄，在没有印刷术的困难条件下，这部书竟能流行全国，足见它的影响之深远。流传到今天的不同抄本达 60 种之多。这部史书的原稿，目前仍旧保存在希伦达尔斯基修道院。

在帕伊西所生活的时代，《斯拉夫保加利亚史》的问世还有着巨大的学术和思想意义。帕伊西摆脱了中世纪世界观的束缚，探索生活的新意义和价值。他第一次以新的目光全面审视保加利亚人民的过去，并从历史乐观主义和相信保加利亚人民的力量和前途的立场给以评价，尽管当时人民群众还受着残酷的异族压迫。他第一次使人民认识到：将来解放他们的不是神，而是他们自己。这正是他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成为保加利亚民族复兴时期开始的标志的根本原因。

从文学的角度看，《斯拉夫保加利亚史》也是一部少有的作品。它那炽热而且诚恳的文笔，深深打动了每一个有血性的保加利亚人，使他们立即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解放动员起来。

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的事业，经过他的继承者的不懈奋斗，终于在他的历史著作问世 100 年之后取得了成功。

索夫罗尼·弗拉昌斯基(Софроний Врачански，1739—1813)是《斯拉夫保加利亚史》的第一个传抄人，同时也是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的热烈追随者。他一连20年在家乡科特尔城（位于巴尔干山东脉）当神甫和教师，而在故乡同帕伊西的会见，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就成了一位全国知名的爱国者。索弗罗尼·弗拉昌斯基抄写了多部帕伊西的史书，其中的一部随同他的遗嘱留在科特尔教堂被作为圣物保存起来。

索夫罗尼·弗拉昌斯基由于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活动屡遭土耳其当局迫害，被迫辗转到了保加利亚西北部的弗拉察城。他仍不断在各地传教，进行启蒙活动。由于土耳其当局的迫害日益加深，他最后不得不逃亡到布加勒斯特，继续献身学术和政治活动。

索夫罗尼·弗拉昌斯基一生有许多著述，其中以自传《罪人索夫罗尼生平与苦难》最为重要。他在这部书中，以浅近的现代保语,真实地描绘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保加利亚人民在土耳其封建领主混战的动乱年代的苦难。此书文风朴实，感情真挚，其中对保加利亚人民和作者本人所经历的苦难的描述，令读者无不为之感动。

3 黎明前的保加利亚文学

在土耳其长达500年的异族统治中，保加利亚人民争取解放的暴动和起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到了19世纪30年代，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武装斗争更加频繁了。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后，保加利亚人民的处境更加险恶，战争带来的种种后果，使群众的不满大为增长，一场遍及保加利亚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这是一场保加利亚人民争取从土耳其奴役下获得民族解放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保加利亚民族复兴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保加利亚历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一页。

保加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经历了两个发展阶

段。19世纪中叶以前，是分散的自发的武装反抗阶段。除了海杜特运动这种传统的武装斗争形式以外，30—40年代，在西北部的贝尔科维察、贝洛格拉德奇克、皮罗特(在今南斯拉夫境内)、维丁、库拉、洛姆等地，先后多次爆发了起义。在罗马尼亚境内的保加利亚流亡侨民，也多次建立武装队伍，发动起义。这些起义虽都惨遭镇压，但却给摇摇欲坠的土耳其封建制度以沉重打击，同时也锻炼了保加利亚人民，呼唤着民族革命的到来。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反土武装斗争阶段。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格奥尔基·拉科夫斯基（Георги Раковски，1821—1867）、瓦西尔·列夫斯基（Васил Левски，1837—1873）、留本·卡拉维洛夫（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1834—1879）、赫里斯托·波特夫（Христо Ботев，1848—1876）等人在君士坦丁堡、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境内创立了许多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领导机构，组织革命武装，多次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发动武装起义。其中以1876年的四月起义规模最大，斗争也最激烈。

四月起义以失败而告终，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和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嗜血成性的土耳其统治者屠杀了约三万名保加利亚居民。巴塔克等一些村庄，变成了一片片坟场。无数青年爱国者或捐躯沙场，或惨死在绞刑架下。数以百计的城镇村庄被洗劫焚毁，夷为平地。四月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使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的统治遭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失败不但未能使保加利亚人民屈服，反而进一步动员了人民，准备新的战斗。四月起义还充分暴露了土耳其统治者的狰狞面目，使保加利亚人民赢得了世界的同情。一年以后，俄国再次对土耳其宣战，主战场就在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爱国者踊跃参加由俄国人创立的保加利亚兵团（保加利亚志愿军），整个战争期间共组织了12个兵团。1878年春，俄军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土耳其政府被迫求和。保加利亚获得了自治地位，取得了解放斗争的历史性胜利，走上了

独立发展的道路。

1878年获得民族解放的前夕，尽管生活条件极为困难，保加利亚文学仍然获得了显著发展。

一般认为，保加利亚新文学始自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这种新文学同保加利亚古代文学的区别在于：

①它使用的是现代保语，而不是古保语；

②根据文艺复兴以后形成的欧洲文学体裁、审美体系而创立了新的体裁和审美体系；

③对宇宙和人的新概念，摆脱了宗教文学的束缚。

这种新的体裁和审美体系，最终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直到这时，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才基本赶上了欧洲文学的步伐。民族复兴时期保加利亚新文学的杰出代表，是赫里斯托·波特夫。

直到19世纪中叶，保加利亚真正的诗歌和散文还处于萌芽状态。第一部具有艺术价值的诗是奈登·格罗夫（Найден Геров，1823—1900）的《斯托扬和拉达》。格奥尔基·拉科夫斯基的长诗《森林的旅客》，通过描写海杜特的生活，向人民揭示了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由的真理，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多布里·钦图洛夫（Добри Чинтулов，1823—1886）所写的《狂风呼啸，巴尔干山呻吟》、《你在哪里，对人民的真诚的爱》、《起来，巴尔干的勇士》等诗，充满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流传极广。

保加利亚的第一位杰出诗人是佩特科·斯拉维伊科夫（Петко Рачев Славейков，1827—1895）。他深受民歌的影响，创作了许多抒情诗和爱国诗，其中以《无畏的女首领》、《贝洛诺加的泉水》最为有名。这些诗歌反映了人民对解放的向往、又表现了那个时期保加利亚妇女的英雄气概。佩特科·斯拉维伊科夫在使诗歌形式臻于完善和确立保加利亚规范语言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保加利亚的小说也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才出现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瓦西尔·德鲁梅夫（Васил Друмев，1841—1901）。他在1859年写的保加利亚第一部小说《不幸的家庭》

（*Нещастна фамилия*）中，以一个保加利亚家庭遭受土耳其人迫害的悲惨命运为主线，描写了三兄弟奋起走上反抗道路当了海杜特的经过。这部小说对当时的抗土斗争起了推动作用。

留本·卡拉维洛夫是直到解放时为止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几十篇中短篇小说中，刻划了土耳其压迫者的残暴专横，揭露了保加利亚“乔尔巴吉亚”（чорбаджия，依附土耳其统治者的保加利亚财主）的巧取豪夺，描写了爱国者为解放祖国而进行的斗争，也描绘出了保加利亚民族的风俗习惯。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难道要诅咒命运吗？》（最初用塞尔维亚文写出）、《旧日的保加利亚人》、《首领》①、《母亲的宝贝》等。

19 世纪 50—70 年代，保加利亚剧本也诞生了。多布里·沃伊尼科夫、康斯坦丁·维利奇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Величков，1855—1907）等人都创作了剧本。他们的作品深受当时欧洲戏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同时，这些作品也洋溢着革命和爱国主义思想，其中以沃伊尼科夫的《拉伊娜公主》、《被曲解的文明》等最为著名。德鲁梅夫的历史剧《刺杀阿森一世的伊万科》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

4 不朽的伟大民族解放诗人赫里斯托·波特夫

民族复兴时期保加利亚诗歌的顶峰是赫里斯托·波特夫的作品。他的诗歌同保加利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联系得最为紧密。波特夫是 19 世纪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卓越领袖。他于 1848 年生于巴尔干山南麓的卡洛费尔城。他的父亲博蒂奥·波特夫是知名的启蒙学者和进步教师。1863 年，波特夫去俄国敖德

①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和《首领》都有中译本，前者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5 年北京，后者见《东欧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北京。

萨求学，深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影响。 1867 年，波特夫从俄国回到故乡，接替了父亲的工作。他开始在青年中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组织他们学习射击和制造子弹，为将来的武装斗争作准备。同年，在一次纪念斯拉夫文字的创始者基里尔和麦托迪的大会上,19 岁的波特夫勇敢地站出来痛斥统治者，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暴政。为此，他触怒了地方当局，被迫告别故乡，流亡国外。在路过罗马尼亚时，波特夫结识了许多进步的保加利亚流亡者，并决心留在那里致力于解放祖国的革命事业。为了宣传革命和组织力量，他穿梭往来于许多城市之间，曾遭到当局的监禁，经常处于贫病交加的境地。

1871 年，波特夫开始出版《保加利亚侨民言论报》,表现了他的政论才能。第二年，迁居布加勒斯特，协助卡拉维洛夫出版《自由报》和《独立报》,同时,他自己还出版了一种讽刺性的报纸《闹钟报》。

波特夫不仅是诗人和政论作家，而且还是最杰出的民族革命思想家。他通过刻苦学习，接受了俄国和西欧的最进步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基于这些思想，他认为保加利亚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他把农业互助组、手工业者行会和各种文化团体，看作是将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萌芽。他认为农民是革命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波特夫还研究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并十分赞赏意大利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斗争和巴黎公社的斗争。他一生的最后几年，还阅读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开始领会到阶级斗争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的重大意义。他在一篇文章中曾满腔热情地谈到马克思所创建的第一国际。但是他却未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保加利亚当时的落后经济，使他无法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保加利亚当务之急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因此，波特夫最关心的是民族解放斗争。同时，波特夫还是巴尔干各族人民联合的热情拥护者。他认为这种联合只有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他还赞成为了共同反对封建压迫

和苏丹暴政，与土耳其人民达成兄弟般的谅解。这些主张对保加利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以波特夫为首的保加利亚革命中央委员会，在总结了过去失败的教训，分析了当前形势以后，又着手准备新的起义，起义日期定在 1875 年 9 月 16 日。但由于国内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起义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起义又遭失败。起义的屡次失败，并没有使保加利亚爱国者丧失信心。这时日益尖锐的土耳其内部危机，已使革命的爆发不可避免。保加利亚全国规模的大起义正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加紧准备。

震惊世界的四月起义的枪声，于 1876 年 4 月 20 日在中部山脉深处的科普里夫什蒂察城打响了。起义的目的是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整个保加利亚沉浸在无比兴奋和期望之中。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正在俄国为建立起义队伍筹集资金的波特夫，得知国内已经宣布起义，便立刻回到罗马尼亚，和战友们组成了一支 205 人的队伍，自任队长。起义队伍进入保加利亚境内，战士们亲吻了祖国的土地，在波特夫的率领下直奔弗拉查城。由于该城没有爆发起义，奥斯曼帝国的地方军队得以集中全力对付波特夫的队伍。起义者在几个山头同敌人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退守山顶。在 6 月 2 日傍晚的卡马拉山峰上，波特夫正同战友们商讨战况时，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为祖国光荣牺牲。

波特夫在 1876 年初致一位战友的信中写道：“我要把双手变成铁锤，把皮肤变成战鼓，把头颅变成炸弹，高唱战歌奔赴疆场。”他在奔赴战场途中写给妻子薇内塔的最后一封信中说：“请原谅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去处。我这样做是出于对你们的爱。……如果我活下来，那我们将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如果我死去，请你明白：除了祖国，我最爱你……”在这些信中，波特夫以深厚的感情，倾诉着对祖国、对亲人的热爱，倾诉着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决心。他正是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和他的战友们为祖国的解放而捐躯。四月起义虽然被残酷镇压了，但起义者的牺牲却唤起

了保加利亚人民，也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同情。当时的国际著名人士雨果、达尔文、王尔德……都曾经大声疾呼维护保加利亚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权利，谴责奥斯曼帝国的暴行。两年之后，保加利亚人民终于在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下，经过浴血奋斗，获得了解放。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和爱国者，保加利亚人民把他牺牲的日子6月2日定为“烈士节”，把巴尔干山脉的最高峰命名为波特夫峰。如今山峰巍峨挺拔，就像英雄的业绩：顶天立地，永垂青史！

四月起义以伟大的保加利亚革命家和诗人赫里斯托·波特夫率领的支队所进行的英勇战斗而告结束。

波特夫留给后人的诗只有20首[①]，但是每首都是对自由的颂歌，字字都是射向压迫者的子弹。他的诗揭示了祖国的灾难和同胞遭受压迫的命运。《海杜特》是一首没有写完的叙事长诗，内容是讲子承父志，争当海杜特的故事，反映了保加利亚人民世代相传，坚决与民族敌人战斗到底，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离别》是他在罗马尼亚准备参加起义前写给家人的决心书，表达了诗人对母亲、兄弟的情意和为人民尽忠的伟大胸襟。《瓦西尔·列夫斯基的绞架》是一首悼念民族英雄的挽歌。下面是他献给英雄哈吉·迪米特尔的著名诗歌：

哈吉·迪米特尔

他还活着，活着！那里，在巴尔干山上，
一个胸前受了重伤的勇士，
一个年轻力壮的勇士，
呻吟着，倒在血泊里。

① 有中译文，《波特夫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北京。

他把步枪抛在一边，
另一边是折断的军刀，
他两眼发昏，头在摇晃，
嘴里咒骂着全宇宙！

勇士躺着，可是在天上，
停住的太阳在愤怒地喷吐烈焰；
收割的村女在田野里歌唱，
勇士的鲜血流得更欢！

现在是收割的时节了……女奴们，
唱这些悲惨的歌吧！而你，太阳，
也在这奴隶的土地上照耀吧！这位勇士
就要牺牲了……我的心啊，安静！

在争取自由的战斗里倒下的人，
永生不死：土地、苍天、猛兽、大自然
都要为他哀悼，
歌手们也要唱歌把他咏赞……

白天，老鹰为他遮阴，
灰狼温驯地吮舔他的伤口；
空中的巨雕，勇敢的鸟，
也照顾着他，像亲密朋友！

黄昏来临——月亮升起，
星斗渐渐布满天空，
树林开始微语，晚风轻轻吹拂，——
巴尔干山响彻海杜特的歌声！

温柔美丽的白衣仙女，
开始唱起欢乐的歌，——
她们悄悄踏过绿草地，
向勇士走来，在他身旁坐下。

一个用药草敷住他的伤口，
另一个把清水洒在他身上，
第三个快捷地吻了他的双唇，——
勇士看着她，——笑容满面，亲切善良！
“告诉我,好姐姐,卡拉贾在哪里？
我忠诚的队伍又在哪里？
告诉我，然后把我的灵魂带走，——
姐姐啊，我要在这里安息！”

仙女们拍拍手，互相拥抱，
唱着歌儿飞向天空，——
飞着，唱着，直到破晓，
到处寻找卡拉贾的魂灵……

可是已经天明！勇士躺着，
鲜血染红巴尔干山，
灰狼还在吮舔他那剧痛的伤口，
太阳又开始喷吐烈焰！

这首诗一直被认为是保加利亚诗歌的最高典范。它以浪漫的手法悼念一位争取民族解放的英勇战士，实际是告诉人们：生与死都是相对的。有的人虽生犹死，而有的人则虽死犹生。哈吉·迪米特尔(1842—1868)是保加利亚一支起义队伍的领袖。 1868年夏，



赫里斯托·布赖科夫为《哈吉·迪米特尔》作的插图

他与战友斯特凡·卡拉贾带领队伍从罗马尼亚渡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准备发动反土耳其奴役的武装起义，在巴尔干山脉的布兹卢贾山峰与敌人遭遇，英勇牺牲，卡拉贾被俘、后被敌人绞死。他们都“还活着,活着”。

诗人以强烈而夸张的手法表达对英雄之死的无限悲痛。全诗并没有伤感的情绪，而是调动了天地万物来衬托英雄业绩的崇高伟大“:土地、天空、猛兽、大自然,都要为他哀悼”,太阳也因敌人的残暴而“愤怒地喷吐烈焰”。甚至一向凶狠异常的老鹰、灰狼都成了英雄的朋友。古斯拉夫传说中一贯迷惑牧人的仙女，这时也变得温柔善良，照拂起勇士来了。这一切都是为了烘托诗的主题：“在争取自由的战斗里倒下的人，永生不死”。

一百多年来，这首诗一直鼓舞着保加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更美好的未来而英勇奋斗。

三独立道路上的保加利亚文学（1878—1944年）

保加利亚人民从奥斯曼帝国的异族统治下获得的解放，大大推动了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人民的力量被引向国家的建设以及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时期的保加利亚文学，大体上以世纪交替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1 从解放到1900年的保加利亚文学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建立的保加利亚国家，将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放在全新的基础上。一方面，民族复兴时期的传统和成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国家鼓励国人汲取西欧和俄国文学的精华，从而使本国文学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衰落状态，走上复兴的道路，紧紧追赶欧洲文学。

1878年以后的保加利亚文学在发展的初期受到了欧洲文学和艺术的各种流派、体裁和风格的强大影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世纪末，保加利亚文学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技巧上，都开始进入成熟时期。作为保加利亚文学强大动力的民族复兴时期的传统，已经开始建立在欧洲文学的现代基础之上。这时的保加利亚文学，不仅把目光朝向过去，而且努力以现代的、朝前的目光，审视

自己的历史遗产。

这样一种革新的过程是同国家的现代化并行的，有时甚至还超前发展。这一过程大大提高了保加利亚人民对文学艺术的鉴赏能力，不仅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注意作品的艺术形式。在这种全新的条件下，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方向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这不仅仅决定于新的社会矛盾，而且还决定于外部的文化影响。国内哲学和文学理论中的乐观主义，以及欧洲文化和哲学中的悲观主义，在保加利亚同时存在，并强烈地影响着保加利亚的文学。

在解放的最初几年，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仍然直接影响着保加利亚的作家和诗人，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

总之，保加利亚解放后 20 年的文学发展，适应了保加利亚社会改革高潮的需要，使保加利亚在文学方面迅速赶上了欧洲的步伐。

被称为保加利亚新文学鼻祖的伊凡·伐佐夫(Иван Вазов, 1850—1921)，是这一时期文坛上的主要人物。他的作品促进了保加利亚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他的长篇小说《轭下》(*Под игото*, 1894)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保加利亚最优秀的小说。

扎哈里·斯托扬诺夫(Захари Стоянов, 1850—1889) 和康斯坦丁·维利奇科夫在解放后的最初年代，也以同一主题进行创作。斯托扬诺夫写了几本回忆录和传记作品，其中写得最好的是《保加利亚历次起义札记》(*Записки по българските въстания*)和关于瓦西尔·列夫斯基和赫里斯托·波特夫的传记。维利奇科夫的回忆录《狱中》，以动人的笔触表现了保加利亚人民渴望自由独立、英勇不屈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另外一些作家如察尼·金切夫(Цани Гинчев, 1835—1894)、托多尔·弗拉伊科夫(Тодор Влайков, 1869—1943)、斯托扬·米哈伊洛夫斯基(Стоян Михайловски, 1856—1927)、阿列科·康斯坦丁诺夫(Алеко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1863—1897)、米哈拉基·格奥尔基耶夫(Михалаки Георгиев, 1854—1916)、安东·斯特拉希米罗夫

（Антон Страшимиров，1872—1937）、昌科·采尔科夫斯基（Цанко Церковски，1869—1926）等人，也在新的条件下，沿着保加利亚民族复兴时期文学健康而独特的传统继续创作。佩特科·托多罗夫（Петко Тодоров，1879—1916）、佩约·雅沃罗夫（Пейо Яворов，1877—1914）、潘乔·斯拉维伊科夫（Пенчо Славейков，1866—1912）等人的早期作品，也是遵循这一传统的。他们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保加利亚的社会问题同他们个人的感受和哲学十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这时的保加利亚文坛变得五光十色，流派繁多。

阿列科·康斯坦丁诺夫的作品，在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中，特别是在确立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著名作品《甘纽大叔》①幽默而深刻地刻画了当时贪得无厌、举止粗俗、不学无术和野心勃勃的资本家暴发户，这正是19世纪90年代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缩影。

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间，保加利亚文坛上还出现了民粹派。民粹派作家把目光集中在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社会悲剧上，严厉地揭露了资本家的剥削，反映下层劳动者的愤怒和抗议。他们的作品虽然有力地批判了现实社会，并且捕捉到某些社会发展规律，但却宣传恢复宗法制和小私有者的生产关系等落后保守思想，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一派的代表作家是托·弗拉伊科夫。

总的说来，保加利亚解放后的文学形成了两条路线。第一条是从民族解放斗争时期汲取养分的爱国主义路线。第二条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求支点的批判现实主义路线。当然，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伊凡·伐佐夫则在这一时期将两者结合起来，成为最负盛名的文学大师。

社会主义文学也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它的奠基人是迪米特

①有中译本；《甘佑先生》，云海出版社，1946年，上海；《甘纽大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北京。



博里斯·安格卢舍夫为《甘纽大叔》作的插图

尔·布拉戈耶夫（Димитър Благоев，1856—1924)。作为理论家、评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他在保加利亚文学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迪米特尔·波梁诺夫(Димитър Полянов，1876—1953)和格奥尔基·基尔科夫（Георги Кирков，1867—1919）是这方面的先驱。波梁诺夫的《被推翻的偶像》吹响了保加利亚无产阶级诗歌进军的号角，而基尔科夫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则是无产阶级散文的开端。1892年，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克勒斯蒂奥·克勒斯特夫(Кръстьо Кръстев，1866—1919)主编了《思想》杂志。以杂志为中心的一批作家，将目光投向欧洲文学、哲学和美学等方面的新思想。于是在这里开始出现了个人主义（或译作个性派）的最初萌芽。个人主义为保加利亚文学中的现代派提供了哲学基础。这一派的特点是在资产阶级充分暴露其贪婪、残酷、野蛮的天性，以及阶级矛盾日益加深时，害怕并回避社会问题，主张在作品中自我反省，反映他们的个人心情和体验，以逃避阶级斗争。他们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的原因也在于此。但是他们终究不能完全超脱人民大众的生活，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创作了一些颇有价值的作品。

同欧洲，特别是同俄国和法国的联系，奠定了保加利亚文学理论的人才基础。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史家、民间创作研究者有伊万·希什曼诺夫、阿列克桑德尔·特奥多罗夫－巴兰(Александър Теодоров-Балан，1859—1959)等人。

总之，保加利亚解放后20年的文学发展，适应了保加利亚社会改革高潮的需要，使保加利亚在文学方面迅速赶上了欧洲的步伐。

2 保加利亚新文学的鼻祖伊凡·伐佐夫和他的《轭下》

伊凡·明切夫·伐佐夫是保加利亚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诗

人。伐佐夫于 1850 年 7 月 9 日生于保加利亚巴尔干山南麓的小城索波特。他的父亲是一个殷实的商人，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者，母亲是一位愉快、开朗、好学的妇女。伐佐夫在这样一个有民主气氛的家庭中长大，15 岁时就到卡洛费尔去当助理教员。他任教的学校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伐佐夫在那里广泛涉猎俄国的进步文学。 1867 年，伐佐夫的父亲为了把他培养成一个商人，送他到普罗夫迪夫去学习当时经商所必需的土耳其语和希腊语。但是伐佐夫并不喜欢这两种语言，却对法语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学会了法语可以阅读雨果等伟大作家的作品。由于他未能通过土耳其语的学年考试，只得回到故乡帮助父亲经商。这时伐佐夫已经热爱文学，对父亲的商业毫无兴趣。 1870 年，他父亲把他送到在罗马尼亚经商的叔父那里。这时他又对诗歌发生了极大兴趣。他的第一首成名诗作《松树》就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不久，他离开了叔父，只身来到罗马尼亚的小镇勃拉伊拉，结识了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著名领袖、革命诗人波特夫和许多保加利亚流亡者。革命志士的爱国热忱深深感染了年轻的伐佐夫，对他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伐佐夫在他后来写的中篇小说《流亡者》等许多作品中，深刻地反映了这些流亡国外的爱国者的生活与斗争。

1872 年，伐佐夫回到祖国，当了一段时期的教师和铁路修建队的翻译。1874 年又回到故乡，参加了当地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诗歌。

1876 年反对土耳其统治的四月起义失败后，伐佐夫被迫侨居布加勒斯特，参加了保加利亚中央慈善协会。 1877 至 1878 年俄土战争期间，伐佐夫在俄国军队里服务。这一时期，他出版了反映四月起义和俄土战争的诗集《旗帜与古斯拉》、《保加利亚的忧伤》、《解救》等。保加利亚独立后，伐佐夫在斯维什托夫和鲁塞当过职

员，还在贝尔科维查当过法官。他的长诗《大石堆》[1]、《后山来的女人》、《我的邻居格米特拉》和短篇小说《米特洛芬和陶尔米道尔斯基》[2]的素材，就是在当法官时搜集的。1880 年他到保加利亚南部的大城市普罗夫迪夫，积极参加那里的政治文化生活，编辑出版《科学》、《曙光》等杂志和《人民之声报》。这一时期他还出版了诗集《古斯拉》和《田野和森林》,写了中篇小说《流亡者》和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3]等。

1885 年保加利亚南北统一后，国内资产阶级的派别斗争激化，伐佐夫被迫侨居俄国，他在敖德萨着手写反映四月起义的著名长篇小说《轭下》以及后来收入诗集《声音》中的许多诗作。

1889 年，伐佐夫回到索非亚。1894 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897 年出任教育部长，但两年后即脱离政界，专心致力于文学事业。1921 年 9 月 20 日在写作中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于索非亚。

伐佐夫开始文学活动的时候正是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时期。他一生写下了大量作品，创造了无数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他的早期作品是一些描写爱情和带有感伤色彩的抒情诗。然而到了 70 年代中期，革命的爱国主义就成了他诗歌的中心主题，而这些爱国主义诗歌的顶峰就是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

伐佐夫一生都坚定地认为：真正的艺术具有高度的社会、民族和文化的任务；为艺术而艺术是一种有害的游戏；真正的诗人不能不是自己的人民和时代的忠实反映者。而伐佐夫在自己的文学事业中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 这些歌儿是不朽的人民精神的热烈回声，
> 只要在我们的自由国度中，

① 有中译文,见《伐佐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北京。

② 有中译文，作家出版社，1956 年，北京。

③ 上述诗集的许多作品在《伐佐夫诗选》中都有中译文。

众人的心还为悲欢而跳动，
我的歌就将永远被人们吟诵。

伐佐夫是保加利亚现实主义诗歌，特别是现实主义散文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现实主义又常常具有鲜明的浪漫色彩。这一点在他的许多作品，特别是前期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伐佐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深刻的反映。他热爱保加利亚人民，热爱保加利亚的古老文化，热爱保加利亚的大自然，热爱保加利亚语言。当时有许多人看不起刚刚从土耳其 500 年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保加利亚的一切，甚至也看不起保加利亚的语言，但是伐佐夫却满怀着爱国主义的激情歌颂祖国的语言：

啊，我将承受你这种不幸的耻辱，
它会鼓舞我振奋起来，
我将把你变为光辉的声音，
传给未来的蓬勃一代；
啊，我将拭去你身上的污泥，
让你显露出那固有的夺目光辉，
我将把你那语言的美当作一根巨棒，
狠狠惩罚那些辱骂你的败类！

伐佐夫热爱祖国，憎恨那些欺压人民，鱼肉百姓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和外国剥削者，他痛斥他们说：

“请来看看我们!”人们在恳求,呻吟，
“你们这些被我们养肥的英明老爷们……
暂时离开一下你们那
贩卖昂贵空话的喧闹市场——

请来看看我们！

“你们，生活在安逸的衙门里，
到我们这里来一下——你们这些饱食终日的体面人！
隔着我们的烂篱笆望一望，
也许能使你们毛骨悚然！
请来看看我们！”

伐佐夫深信人民的崇高理想必能实现，相信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断提高文化水平，必能把落后弱小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强国。他这样号召人民：

干吧！懒惰是生命的大敌，
是智慧的刽子手！
懒惰是苦难的永恒伴侣，
是耻辱的盟友。

干吧！这里没有
比劳动更强大的武器，
只有它最诚实可靠，
能粉碎旧世界，所向无敌。

伐佐夫的全部创作反映了保加利亚民族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前和之后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是作者给后人留下的一笔珍贵遗产，正如伐佐夫在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所说：

人民的不幸这张巨大的犁铧，
已经犁遍了我的心田，
我在这里是一部活的历史，

记载着巴尔干山的一切震颤！

作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伐佐夫在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时，并不理解当时已经有了相当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在热情歌颂祖国勤劳勇敢的人民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时，却陷入保加利亚沙文主义的泥淖中。他在讴歌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合作和俄罗斯人民对保加利亚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巨大帮助的时候，也往往对沙皇俄国抱有幻想。这都是他的世界观和他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反映。

伐佐夫的文学遗产极其丰富。他几乎运用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游记等一切体裁。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语言生动，对保加利亚文学和民族语言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他的全部作品有二十多卷，前前后后曾出过 5 种全集。伐佐夫还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他的著作已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出版了二百多种外文译本。

长篇小说《轭下》再现了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最后阶段的悲壮场面，是一部不朽的杰作，在世界文坛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中文节译本是著名翻译家施蛰存于 1952 年从英文译出的，1982 年由 4 位保加利亚学家校订补译出版，并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除了《轭下》外，中篇小说《流亡者》以及诗集《旗与琴》和《保加利亚的悲哀》也是他的重要作品。基于对新兴的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贪婪和野心的愤慨，他还写了著名的诗集《被遗忘者的史诗》，歌颂民族解放战士的不朽业绩和大无畏精神。

伐佐夫的名字对中国读者也不陌生。鲁迅先生曾翻译过伐佐夫的短篇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和《村妇》，并热情而详细地介绍过这位保加利亚作家的生平和创作。

下面是小说《轭下》的第一章①。

① 选自施蛰存译《轭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北京。

在 5 月里的一个美好的晚上，马尔科财主光着头，穿着睡衣，正在院子里和他一家人坐着吃晚饭。餐桌照例放在葡萄架下；一边是清冷的溪泉，泉水像一只燕子似地呢喃着日夜流过；另外一边，是一大片茂密高大的黄杨树，终年青翠地遮盖着墙壁。一盏灯从一株丁香树的横枝上照下来，而那些丁香花则在这一家人的头顶上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是一个大家庭。在马尔科、他的老母亲和他的妻子的四周，围了一大群孩子，大的小的，都挥舞着刀叉在他们的餐桌上残酷地厮杀着，他们简直成了土耳其俗话中所说的“粮秣的仇敌”。他们的父亲不时地看他们一眼，好像非常赞赏这些有着尖利牙齿和坚韧肠胃的喘着粗气的劳动者，同时还向他们微笑着，鼓励他们道：“吃呀，孩子们，快快长大吧！把酒壶再斟满，佩娜。”于是那女佣就走到泉边，从浸在冷水里的大酒樽里倒出酒来，把一个陶器酒壶灌得满满的。马尔科把酒壶递给孩子们的时候，总是兴高采烈地说：“喝呀，你们这些淘气鬼！”于是那酒壶就在餐桌上巡行着。大家眼睛里闪着亮光，两颊都变得红红的。他嘴唇微张，露出了一个心满意足的微笑。这时，马尔科转向妻子，看见她脸色有点不大高兴，就神态严肃地说：“让他们在我面前喝点儿吧——只是别让他们贪酒……因为我不愿意他们将来长大了变成酒鬼。”

马尔科对于教育有一套合乎实际的看法。他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因为他是个老派人物），但是由于天赋的常识，他很懂得人的脾气，知道人常常对于总是不准做的事就越是想做。为了这个理由，他常常把钱柜钥匙交给儿子们，这样来防止他们起偷窃的歹念。“戈乔，去把那杉木柜子打开，把我的钱包拿来！”或者，他对另一个孩子

说:“孩子,从小笸箩里数出 20 个小金币，等我回来的时候交给我。”

当时社会上的习俗，在吃饭的时候，为了表示尊敬长辈，孩子们只能立着吃。马尔科却不理睬这种规矩，他准许他的孩子们坐着一起吃，就是有客人在座也是如此。“我要让他们交际交际,”他总是这样说:“不要变野了,看见陌生人就羞得无地自容，像安科·拉斯波切一样。”安科·拉斯波切一见穿黑呢长裤的人就害羞得要命。

因为整天忙于营业，马尔科只有在吃晚饭的时候，才能和他全家的人见到一面，所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有机会实行他那套特别的教育制度。

“迪米特尔，你祖母还没有吃呢，你可不能先吃，——你都要变成一个共济会[①]会员了！”“伊利亚，你不要像一个屠夫似的拿刀子呀；好好地切面包，不要乱砍乱剁的。”“戈乔，你怎么像个乡巴佬那样敞开衣襟呀？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不要忘记把帽子摘掉。怎么，你的头发长得像一个都脱拉干[②]的农民了，快去甘科那里剪短点，要哥萨克式的。”“瓦西尔，把你的胳膊收拢些，整个桌子都要给你占去了,在田里可以这样,在这里可不行。”“阿甫拉姆,你吃完饭站起来的时候总是不画十字，我这里不准有这种新教徒的样子。”

不过这只是当马尔科兴致好的时候才如此；如果他不高兴，吃饭时就没有一个人敢开口了。

马尔科非常之虔诚与严格，他竭力用一种正规的宗教精神去教育他的儿女。每天晚上，全家的大人都必须

① 中古时代的反宗教秘密团体，以互助友爱为目的。当时在保加利亚，这个字差不多与新教徒同义，指反对东正教的人物、无神论者或自由思想者。

② 都脱拉干是索波特附近的一个城市，那里的人以鄙野粗俗著称。

在神龛前一起念祈祷文。每一个礼拜日或是节日，全家人都要到教堂里去——这是一个绝不容许打破的规矩；任何一个人破了例，就会在家里引起一场风波。有一年的圣诞节前夕，马尔科吩咐基罗到教堂里去办神功，因为他要在第二天早晨领圣体。基罗从教堂回来，早得可疑——他其实没有参见神甫。“你办了神功没有？”他父亲不信地问。“办了。”“交谁办的？”“交——埃纽神甫办的。”基罗着了慌，讷讷地说。这一下就明白了，他是在撒谎，因为埃纽神甫不过是一个年轻的神甫，他还没有权力给人家赦罪。马尔科立刻就戳穿了这个谎话，大发雷霆地扭着他儿子的耳朵，拖到街上，然后一直把他拖到教堂里，交给史塔夫利老神甫，说道：“神甫，给这个驴子办神功吧。”于是他就坐下来等着，一直等到神功办完为止。

如果他的儿女有偷懒逃学等事情，那么他就更为严厉了。虽然他自己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却喜爱学问和学者。当时有许多热心于新教育运动的爱国志士，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使保加利亚到处开满了学校，马尔科也是这些志士中间的一个。不过，对于一个在当时差不多只有农民、工匠和商人的国家，知识到底会有些什么实在的好处，这个观念在他却是很模糊的。马尔科很歉疚地看到那些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的学者，既找不到工作，又没有饭吃。但是他觉得，他心底里知道一定有一种秘密的力量潜伏在学问里，它会改变整个世界。信赖学问正如他信赖天主一样——是毫不怀疑的；因此他就尽他的能力去提倡它，他惟一的愿望就是被选举为白拉切尔克瓦[①]这座小城的一个校董。由于各方面对他的尊敬和器

①即巴尔干山南麓的索波特城，是伐佐夫的出生地。

重，他的确一直就被选任着这个职务。在这个卑微的社会职务上，马尔科一点不偷闲，毫不厌烦地工作着；但是他很小心地避免与官僚们发生别的关系。尤其是那些衙门①里的人物。

餐桌收拾干净之后，马尔科就站起身来。他的年纪大约五十岁，身材很高，略微有些驼背，可是体格还很匀称。他那红红的脸（因为常常往来于剪羊毛场和集市，已经被风吹日晒而变得粗糙和黝黑了）有着一种严肃而冷漠的表情，即使在微笑的时候也如此。两道横卧在他的蓝眼睛上的浓眉毛，又给他的丰采增加了一些庄严。但是另外有一种温和、坦率和诚恳的神情缓和了那严肃的调子，使得他整个容貌还是显得可亲可敬的。

马尔科在黄杨树丛中铺着红色坐垫的凳子上坐下，吸着他的长烟袋。孩子们分散在四下里自由自在地玩耍，女佣把咖啡端了上来。

这个晚上，马尔科兴致很好。他很起劲地看着他那些吃得好、养得肥的孩子们喧哗嬉闹。他们玩耍的花样时时在改变，而他们的脚步声和嬉笑叫嚣声也愈来愈响，正像一群麻雀在树丛里游戏。但是这个天真而快乐的游戏不久就发展成为一种严重的状态：叫声变得愤怒起来了，小手激烈地伸出来威胁着了，小拳头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一个愉快的音乐会登时变做一场七嘴八舌的争吵。于是胜利者和失败者——大家都奔向他们的父亲，急于替自己辩护，或者诉苦。一个奔到祖母身边去寻求保护，另外一个就奔向他母亲身边去找帮手。这时候，马尔科就从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的地位，忽然担任起审判官的职务来了。他有权利和责任判断谁是谁非。但是，他

①土耳其行政首长的官邸。



根据《轭下》拍摄的同名电影的海报

完全不顾一切法律程序，对于原告被告双方的控诉全都不要听，干脆就宣布并执行了他的判决——抚摸几下这个孩子的脑袋，以示安慰；扭扭那个孩子的耳朵，以示惩罚。但是对于那几个小的（受了委屈的孩子们）往往就亲吻一下来适应这种情况的需要。

于是一切又都归于平静；但那已被喧嚷声惊醒睡在祖母伊凡妮查怀里的最小的孩子哭了起来。“别作声，宝宝，别作声，要不然土耳其人就会来把你抓走的。”祖母伊凡妮查一边轻轻地摇着那孩子，一边低低地说。可是这又引起了马尔科的不快，他说：“妈，可别再拿土耳其人来吓唬孩子们了，你这样就只会把他们养成一些胆小鬼了。”那祖母说道：“是啊，是啊，我就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不该这样说呢，那些土耳其人不是够可怕的吗？让老天爷把他们消灭干净吧！我已经 70 岁，快要入土了，看来，我是活不到那幸幅的一天了，真是死也难瞑目啊！”于是小彼得就接口说：“啊！奶奶，等我和瓦西尔哥哥，还有格奥尔基哥哥长大了，我们一定拿镰刀去把土耳其人杀个精光！”“你一个都不留下他们吗，亲爱的？”

“小阿森怎么了？”马尔科问刚从屋子里出来的妻子。“现在他退烧了，已经睡熟了，”她回答说。“为甚么让他去看这种事情？现在弄得他生病了。”那老祖母埋怨着说。

马尔科皱着眉头，一声都不响。在这里，作者必须交待明白，原来小阿森是在学校窗子里望见了人们把那个没有头的尸体，那个漆匠甘乔的儿子，从田野里抬到教堂院子里的时候吓坏了，因此得了惊风症。马尔科赶忙改变了话题，对孩子们说：“好吧，孩子们，我要你们的大哥哥给我们讲一个故事，然后你们一起来唱个歌。瓦西尔，老师今天教了你些什么，讲给我们听听。”“今天讲了一课

世界历史。”“好的，讲给我们听。”“是关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什么，讲那些西班牙人吗？别说了，我的孩子，那没有甚么意思……给我们讲些俄国的事情吧。”“哪些事情？”瓦西尔问。“譬如，关于伊凡雷帝的故事，或者那个放火烧掉莫斯科的波拿巴的故事。”

马尔科还没有说完话，院子的黑暗角落里忽然有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墙上有好几片瓦噼噼啪啪地砸下来。大大小小的鸡都吓醒了，咯哒咯哒地叫起来，到处乱飞乱扑。那个正在把晾在外面的那些洗过的东西收进去的女佣惊喊着“有贼，有贼！”

院子里的情景立刻变得非常慌乱。妇人们都躲进了屋子；孩子们也不见了，只有马尔科（他不是一个胆小的人）站了起来，对那发出响声的黑暗角落察看了一眼之后，就跑进屋里，每只手抓了一管手枪，立刻返身出来，急忙向马厩奔去。

他这个与其说是果断，不如说是鲁莽的动作，敏捷得使他的妻子来不及细想和拦阻他。她所能做到的只是低声叮嘱他小心些，但就连这个声音也被那条惊怒得闪在井边的看家狗的狂吠所掩盖了。

在马厩和鸡棚中间的暗处，的确有一个不速之客在那里，但是因为太暗了，所以甚么都看不出来，再加以马尔科刚从灯光下跑出来，他的眼睛尤其看不清楚。

马尔科蹑手蹑脚走进马厩，先抚拍他的马，使它安静下来，然后从窗格里向外窥看。不知是由于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黑暗呢，还是由于幻觉，他看见在角落里，就在那窗子旁边有一个东西直立着，像是人的样子，但是一动都不动。

马尔科擎起了手枪，身子伛向前，严厉地吆喝道：“别

动，不然就把你打死！”[1]他把手指按在扳机上，等了一会儿。

“马尔科大爷，”[2]一个声音轻轻地叫着。

“你是谁？”马尔科用保加利亚语问。

“马尔科大爷，不用害怕，是个朋友。”于是那人向窗子走近些。现在马尔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身段了。

“你是谁呀？”马尔科收起了他的手枪，狐疑地问。

“我是伊凡，是马诺尔·克拉利奇老爷的儿子，维丁地方的。”

“我不认识你啊。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就会告诉您的，马尔科大爷。”那陌生人压低了声音说。

“我看不清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要告诉您的，马尔科大爷，我从远地方来。”

“从哪里呢？你说的远地方是哪里呢？”

“是很远的地方，马尔科大爷。”那陌生人轻轻地说，几乎听不见了。

“什么地方？”

“从狄亚倍吉尔[3]来的！”

这个字在马尔科的记忆中起了电一般的作用。他记得马诺尔老爷有一个儿子曾经被流放到狄亚倍吉尔去。马诺尔跟他有过长期的商务关系，而且还帮过他许多忙。

他出了马厩，走到那个躲在黑暗里的夜客的身边，握着他的手，带他穿过马厩走进披屋里。

① 这句话是用土耳其语说的。

② 这句话是用保加利亚语说的。

③ 土耳其属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城市。当时城中要塞是拘禁政治犯，特别是拘禁保加利亚解放运动者的地方。

“怎么,伊凡乔[1]，是你吗？我记起你小的时候来了，我的孩子……你可以在这里过夜，明天早晨再想办法。”马尔科轻轻地说。

“谢谢您，马尔科大爷。在这个地方，我认识的只有您一人。”克拉利奇悄悄地说。

“不必这样说。我是你父亲最好的朋友。你放心在这里好了。有人看见你没有？”

“我想不会有，我进来的时候，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进来？就这样进来吗，孩子？像冲锋似地爬过墙头！别担心，马诺尔老爷的儿子在这里永远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尤其是当他从那么远的地方跑来。你肚子饿吗,伊凡乔 ?”

“谢谢 马尔科大爷,我不饿。”

“来吧，来吧，你总得吃一点晚饭。让我先去把家里人安定下来，我就回来，那时我们可以好好地谈谈了……考虑如何把你安置好。天主保佑你，孩子，我差一点儿要对你不起啦。”马尔科说着，把他的手枪退了膛。

“对不起,马尔科大爷,我做了件蠢事。”

“你在这里等我回来。”于是马尔科走了出去，同时把马厩门关上了。

他看见他的妻子和母亲都吓昏了。她们看见他平安无恙，就尖叫了一声把他的手抓住，仿佛要阻止他再出去似的。马尔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嘻嘻地安慰了她们；他说院子里并没有什么人——说不定是野猫或是狗碰落了几片瓦，而使那个呆气的女佣佩娜吓了一跳。

“就这么一回事，我们把四邻八舍都惊动了。”他说着，把两支手枪放进枪套里，重又挂回墙上。

①伊凡之昵称。

一家人都又安定了下来。

老祖母伊凡妮查高声叫着那个女佣："佩娜，我的姑娘，你见了鬼啦！你害我们受了一场虚惊。赶快去把孩子们叫来，在蓝矾上撒泡尿罢！[1]"

正在这个时候，大门上传来一阵沉重的敲门声。马尔科走到院子里，问道："谁敲门呀？"

"开门，财主老爷。"是用土耳其话回答的。

"警长，"马尔科仓皇地自言自语。"我们该把他藏到别的地方去。"于是，他来不及注意第二次敲门声，赶紧奔到马厩里去。

"伊凡乔！"他向披屋里喊着。

并没有回答。

"他一定是睡熟了。伊凡乔！"他又高声叫了一遍。

还是没有回答。

"可怜的人！他一定已经逃跑了。"马尔科心里想。这时才注意到那马厩门开着。"现在这孩子会碰上什么命运呢？"他着急地自言自语。

为了放心起见，他又叫了一两声，仍旧没有回答，他这才回到大门边，此时敲门的已经愈来愈凶，快要把门砸破了。

读者从这里可以感受到，小说一开始就把读者紧紧吸引住，并随着情节的跌宕起伏而不能平静，急切地想知道故事的发展和主人公的命运。

伊·伐佐夫在与他的好友伊万·希什曼诺夫（Иван Шишманов，1862—1928）谈到构思《轭下》的过程时说："我的目的在于描写保加利亚人受奴役的最后年代的生活和四月起义时代的革命精神。"

①流传于保加利亚民间的一种为儿童治惊风的旧风俗。

伊·伐佐夫是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写出这部小说的。他在1920年《轭下》第五版的序言中就写道："1887年我被逐出保加利亚，在敖德萨过了一年光景，在那里我深深感到失去祖国的悲哀和痛苦。我的脑子、我的心、我的灵魂每时每刻都向祖国飞去。"伊·伐佐夫的拳拳爱国心可以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感受到。

3 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保加利亚文学

20世纪上半叶的保加利亚文学，是在十分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发展的。它又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保加利亚自从1878年从土耳其统治下获得解放后，社会以迅速的步伐发展着。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迅速走向腐朽、反动。1885年，以普罗夫迪夫为中心的东鲁梅利亚和保加利亚公国，实现了北南合并。合并后的保加利亚，仍被在外国势力控制下的各资产阶级派系之间的斗争弄得国无宁日。1891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成立，无产阶级正式走上政治舞台。接着又成立了人民党（1894）、民主党(1896)、农民联盟(1899)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各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导致各政党之间和政党内部各派系之间反复不断的斗争。1900年，政府为了摆脱经济困境，恢复了缴纳实物的谷物什一税，从而引起了农民起义。

1904年，在普罗夫迪夫召开了保加利亚职工总会的成立大会。在1909年举行的职工总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 1882—1949）当选为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早在1901年就被选为印刷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次年加入社会民主党，站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边，积极地参加了建立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党组织的工作，并成为它的领导人之一。后来他成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共产国际的领导人。

1905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黑山等国组成联盟对土耳其进行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于1913年5月取得了胜利。后来，又因盟国之间在瓜分土地中的矛盾加剧而酿成自相残杀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保加利亚在四面受敌的形势下被迫求和。保加利亚人民从而被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引向第一次民族灾难。民族灾难带来了巨大的沮丧情绪，同时也使人民产生了争取和平的真诚愿望。但是，大资产阶级和专制君主的意愿，却恰恰与此相反。他们为了报复，竟把希望寄托在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上。最后，终于投靠了以德、奥为核心的同盟国，将保加利亚人民又引向第二次民族灾难。在这段时期里，真正维护人民利益、反对战争威胁的，只有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

20世纪前20年的保加利亚文学，就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发展的。在为了反映新的现实而探索新的方法和形式的保加利亚文学中，出现了两条基本思想路线。第一条路线的最鲜明的代表，是人民诗人和作家伊凡·伐佐夫，他将保加利亚文学引向同民族复兴时期传统精神相结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轨道。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作家外，站在这条路线上的作家，还有当时已经成名的埃林·彼林（Елин Пелин，1877—1949）、格奥尔基·斯塔马托夫（Георги Стаматов，1869—1942）等人。第二条路线的代表是《思想》杂志和诗人彭乔·斯拉维伊科夫。这条路线热衷于宣传当时西欧文学中的新的创作方法和形式。实质上，两者都表达了民族精神，但是形式上却各不相同：前者强调民族独特性；后者具有现代类型的艺术理解，而且还有许多理论上的折中主义成分。

两派最初的公开争论开始于1901年发行的《思想》杂志上。佩约·雅沃罗夫第一个推动了保加利亚文学中的象征主义。他的诗集《失眠》标志着他开始了从现实主义传统向象征主义的过渡。几乎与此同时，诗人特奥多尔·特拉扬诺夫（Теодор Траянов，1882—1945）也在新流派中作了尝试。紧随在他们后面的，有迪米特尔·博亚吉耶夫（Димитър Бояджиев，1880—1911）、埃马努伊

尔·波普迪米特罗夫（Емануил Попдимитров，1885—1943）、尼科莱·利利耶夫（Николай Лилиев，1885—1960）、迪姆乔·德贝梁诺夫(Димчо Дебелянов，1887—1916）、赫里斯托·亚森诺夫(Христо Ясенов，1889—1925）等人。颇有才华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博扬·佩内夫(Боян Пенев，1882—1927）也对这一新流派产生了巨大兴趣。所有象征派人士都在不同程度上脱离社会，寻求自我，鼓吹“纯艺术”。

但是，他们宣传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并没有使他们的大部分作品离开民族文化传统的健康土壤，而是通过保加利亚民族三棱镜折射出了德国和法国的象征主义思想。因此，他们创造了许多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接近现实主义路线，与现实主义作家一道努力提高保加利亚人民的文化水平和艺术鉴赏力。保加利亚文学中的这两种倾向的接近，也说明了人民传统和象征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欧洲文学中所具有的那种互相疏远的现象。在保加利亚文学生活中，逃避和不参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即使像特奥多尔·特拉扬诺夫和迪姆乔·德贝梁诺夫那样的保加利亚象征派著名代表，也是如此。

因此，由《思想》杂志在形式上推行的使保加利亚文学“现代化”的路线和伐佐夫的现实主义的民族路线，尽管表面上是相互矛盾的，但它们却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两种派别互相影响，而且在客观上都取得了同一效果：将保加利亚文学提高到欧洲的水平。这不但没有破坏，反而加深了保加利亚文学的民族色彩。这些象征派作家后来在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情况下，大多回到了人民大众的立场，这可算是20世纪前30年保加利亚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在20世纪前20年中，翻译文学在保加利亚文化生活中的比重大大增加了。介绍到保加利亚的，主要是俄国和西欧作家的作品。翻译文学作品成了保加利亚和外界交流思想、增进了解、借鉴艺术成就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保加利亚文学，是在下述三个基本因素作用下发展的：

①两次民族灾难所留下的痛苦影响；

②俄国十月革命和战后三次起义（1918 年的士兵起义、1923 年的六月起义和九月起义）的失败；

③被民族复仇主义和新产生的法西斯思想所扭曲变形的资产阶级文学的继续渗入。

欧洲文学在这以前所起的有益的推动作用，已经不再是影响保加利亚文学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在上述背景下，文学领域内的社会政治两极化日益明显。这是保加利亚社会的阶级和思想意识分化的必然反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反对资产阶级统治和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斗争、知识分子中深刻的思想变化和动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欧洲革命事件的发展，都为具有高度思想性和战斗性的社会主义文学和反法西斯文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赫里斯托·斯米尔宁斯基（Христо Смирненски，1896—1923），是战后革命危机时期讴歌革命斗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位作家，也是保加利亚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1923 年 9月反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在保加利亚文化界激起了强烈反响，出现了以九月起义为主题的“九月文学”。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许多作家和诗人克服了他们的个人主义和象征主义，发展了保加利亚文学中接近 20 至 30 年代无产阶级文学路线的现实主义流派。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安东·斯特拉希米罗夫（Антон Страшимиров，1872—1937）、格奥·米列夫（Гео Милев，1895—1925）、阿森·拉兹茨维特尼科夫（Асен Разцветников，1897—1951）尼科拉·富尔纳吉耶夫（Никола Фурнаджиев，1903—1968）、赫里斯托·亚森诺夫、尼科莱·赫雷尔科夫（Николай Хрелков，1894—1950）等人。1923 年九月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米

列夫创作了他最著名的长诗《九月》（*Септември*）[1]，诗中歌颂了起义人民的英雄气概，刻画了法西斯刽子手的邪恶无耻。斯特拉希米罗夫的小说《霍罗舞》（*Хоро*），愤怒地揭露了九月起义失败后法西斯分子的暴行。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涌现了一批现实主义的语言艺术大师：安东·斯特拉希米罗夫、埃林。彼林、约尔丹·约夫科夫（Йордан Иовков，1880—1937）、康斯坦丁·佩特坎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канов，1891—1952）、斯托扬·扎戈尔钦诺夫（Стоян Загорчинов，1889—1969）、拉乔·斯托扬诺夫（Рачо Стоянов，1883—1951）、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1890—1970）。保加利亚现实生活中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促使他们关注人民的命运，在作品中生动地再现了人民的苦难和向往。在同一时期，保加利亚诗坛上还出现了埃莉萨维塔·巴格梁娜（Елисавета Багряна，1893—1991）、多拉·加贝（Дора Габе，1888—1983）和阿塔纳斯·达尔切夫（Атанас Далчев，1904—1978）这样一些享有国际盛誉的诗人。迪米特尔·潘特列耶夫（Димитър Пантелеев，1901—1993）、埃马努伊尔·波普迪米特洛夫、尼科莱·马兰戈佐夫（Николай Марангозов，1900—1967）等人也创作了许多极好的批判现实主义诗歌。小说家格奥尔基·斯塔马托夫，继续沿着批判现实主义的路线进行创作。喜剧作家斯特凡·科斯托夫（Стефан Костов，1879—1939）在20—30年代创作了许多反映社会政治生活的优秀作品。他的喜剧和约夫科夫、拉乔·斯托扬诺夫的剧本一起，成为保加利亚戏剧中的瑰宝。

在两次大战期间，保加利亚文学在欧洲文化生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早在20年代，保加利亚就成了国际笔会的成员国。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伊万·希什曼诺夫，成了这一世界作家组织的第一个保加利亚籍主席。在此期间，苏联文学的影

[1] 有中译文，见《九月及其他》，群众书店，1955年，北京。

响有所增强。由于保加利亚政府在 30 年代后半期日益投靠法西斯德国，德国文化影响逐渐在保加利亚取得上风，而法国文化的影响，由于保加利亚文学中的象征主义在二次大战前夕陷人危机而明显削弱。

1923 年 9 月反法西斯起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反法西斯斗争，产生了一大批新的进步作家和诗人：柳德米尔·斯托扬诺夫（Людмил Стоянов，1888—1973）、赫里斯托·拉德夫斯基（Христо Радевски，1903— ）、格奥尔基·卡拉斯拉沃夫（Георги Караславов，1904—1980）、奥尔林·瓦西列夫（Орлин Василев，1909—1977）、克鲁姆·丘利亚夫科夫（Крум Кюлявков，1893—1955）卡门·齐达罗夫（Камен Зидаров，1902—1987）、尼科拉·兰科夫（Никола Ланков，1902—1965）、安格尔·托多罗夫（Ангел Тодоров，1906—1993）、克鲁姆·维尔科夫（Крум Велков，1902—1960）克勒斯蒂奥·贝列夫（Кръстьо Белев，1908—1978）、斯维托斯拉夫·明科夫（Светослав Минков，1902—1966）、拉马尔（Ламар，1898—1974）、姆拉登·伊萨耶夫（Младен Исаев，1907—1991）、文科。马尔科夫斯基（Венко Марковски，1915—1988）。格奥尔基·巴卡洛夫（Георги Бакалов，1873—1939）和托多尔·巴甫洛夫（Тодор Павлов，1890—1977）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无产阶级文艺评论家。他们都参加了劳动作家联盟，用笔揭露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残忍和腐朽，鼓舞人民的斗志。格·卡拉斯拉沃夫的小说《儿媳妇》[①]（*Снаха*）和斯托扬诺夫的《霍乱》[②]（*Холера*）等，都是这样的优秀作品。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季米特洛夫 1933 年在莱比锡法庭上的最后发言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政论文，在保加利亚广为传诵。1933 年，季米特洛夫在柏林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制造

① 有中译本：光明出版社，1955 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上海。

② 有中译本：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 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 年，上海

了莱比锡审判案，诬告他是焚烧德国国会大厦的罪犯，妄图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大屠杀。但是，事件的进程正同法西斯分子的主观愿望相反。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在死亡面前，不畏强暴，大义凛然，把法西斯法庭变成了世界论坛。他不仅揭露了国会纵火案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向全世界广大群众阐明了共产党的原则、纲领和策略，为共产主义进行了极其生动的宣传，同时还指出法西斯主义对全世界人民的巨大危险性。季米特洛夫在这里树立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光辉榜样，捍卫了祖国人民的荣誉和共产党人的尊严。他在法庭上的第一次讲话中就自豪地宣称：“是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是的，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我是一个负责的处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我对我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文件和行动完全负责。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不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冒险家，不是阴谋家，不是纵火犯。”

3 个月以后，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的最后一次发言中，义正词严地宣布：

> 不仅我被报纸肆意攻击——我对这种事是完全漠然视之的——而且保加利亚人民也因我而被指为‘残忍’、‘野蛮’。我被称作‘巴尔干的可疑分子’、‘一个野蛮的保加利亚人’。我对于这类事情不能沉默不语。
>
> 是的，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保加利亚的工农和人民知识分子是绝不残忍，也绝不野蛮的。是的，巴尔干的物质福利水平还不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高，但是要说我国人民大众在政治上或精神上也比其他民族低，那就错了。我们的政治斗争、我们的政治愿望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是同样崇高的。在外国奴役下生存了 500 年而没有丧失其语言和民族性的一个民族，过去和现在都在与保加利亚法西斯作斗争、为共产主

义而奋斗的我国工农，这样一个民族不会是残忍的、野蛮的。只有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者才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请问您，庭长先生，哪个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者不是残忍的、野蛮的？

保加利亚民族曾经坚决地、全力地反抗外国的压迫。所以我要抗议对保加利亚民族的攻击。我没有耻于做保加利亚人的理由。我因为自己是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儿子而自豪。

17 世纪科学物理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曾经受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宗教裁判所认定他是一个异教徒，要处他死刑，而他却满怀信心和决心地喊道：‘地球仍然在转动！’这个科学的原理后来成了全人类的财富。我们共产党人现在能够和老伽利略一样坚定地说：‘它仍然在转动！’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向前转动……

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所推动的这个车轮，无论是用恐怖手段、判处苦役或者死刑，都不能把它挡住。它现在和将来都在转动，一直转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

这场经过了 57 次庭审，连同预审共历时 10 个月的审讯，本来是法西斯分子想用以对付共产主义的，结果却变成了对刚刚上台的希特勒法西斯集团的第一次打击，世界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起来保卫季米特洛夫，组织了抗议莱比锡审判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于是，审判又起到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法西斯的巨大作用。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气吞山河的发言，已经成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不朽文献。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个发言也是一篇极好的政论文章。人们可以从中学习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坚定品格，汲

取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心和力量。它鼓舞了全世界，其中也包括中国的一代代革命者为美好的未来同敌人英勇斗争。多少囚禁在敌人监狱里的革命战士曾经以季米特洛夫为榜样，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忠贞！

4 《总有一天》——斯米尔宁斯基的信念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保加利亚引起了强烈反响，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空前壮大。斯米尔宁斯基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一员。

斯米尔宁斯基(1898—1923)出生在库库什（今称基尔基斯，在希腊境内）一个有革命倾向的小甜点商家庭。1913 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库库什城被毁，全家迁到索非亚成了难民。他曾在索非亚上过技术学校和军校，因不肯镇压起义士兵而提前离开军校。1918年入索非亚大学攻读法律。由于经济困难，斯米尔宁斯基不得不从事各种繁重的杂工。1921 年加入共产党，积极参加集会、游行、示威。1917 年创立并编辑幽默刊物《笑与泪》。1918 年出版诗集《不同口径的叹息》。1918 年至 1922 年多次参加幽默刊物《保加利亚佬》的编辑工作。他还多次在《红色的笑》、《工人报》、《青年》、《人民军队》等党的报刊上投稿。1922 年出版诗集《总有一天》。1922年 11 月他还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和他哥哥共同编辑讽刺刊物《假面舞会》,直到病重。1923 年 6 月死于诗人称之为“黄色女客”的肺结核,当时只有 25 岁。

斯米尔宁斯基 17 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最初写一些讽刺抒情诗歌。1920 年后他的作品开始反映战争带给人们的灾难和战争引起的社会矛盾。组诗《冬夜》、《城市的孩子》(1923)描写了社会底层的悲惨生活;《维苏威的暴动》(1920)、《我们》(1920)、《奴隶的春天》等诗则揭露了剥削者的荒淫腐朽，同时也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斯米尔宁斯基写了大量歌颂十月革命的诗歌：《北方之光》、《红色骑兵连》、《莫斯科》、《俄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等。处于

斯米尔宁斯基诗歌中心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形象。他的抒情主人公是具有不屈不挠战斗意志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如《约翰》、《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德勒克吕泽之死》等作品中的主人公。他的诗歌充满崇高的公民热情和革命的浪漫精神；他的风格以精深而夸大的形象著称。

斯米尔宁斯基还写了许多讽刺作品、短篇小说和小品文，鞭挞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斯米尔宁斯基的诗歌以及他的全部文学作品，反映了战后保加利亚人民生活的转折和他们奋起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他的作品是预示社会主义革命在保加利亚即将到来的号角。他的名诗《总有一天》就是他坚信社会主义必将取得胜利的庄严宣言，而他生前最重要的一部诗集也是以这首诗的名字命名的。

几十年来，斯米尔宁斯基的作品以不同方式出版过几十种版本,其中以 1978—1984 年出版的 6 卷本《斯米尔宁斯基全集》最为精到。他的作品在中国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斯米尔宁斯基诗文集》(1959)和《斯米尔宁斯基、瓦普察洛夫诗选》(1965),此外，个别作品还发表在许多报刊和多国多作家的选集中。

下面是斯米尔宁斯基逝世前一个月写的一篇小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的独特风格。

台阶的故事

——献给一切准备说“这与我无关！”的人

“你是谁？”魔鬼问他。

“我生来就是平民，一切衣衫褴褛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啊，世界多么丑恶，人们又多么不幸！”

青年这么说，昂着头，紧握着拳头。他站在一座用玫瑰花纹大理石砌成的高台阶之前。他的目光望着远方，那里如涨水的大河，浊浪滔滔，灰蒙蒙的苦难人群在喧嚷着。他们焦躁不安，接着群情鼎沸，纷纷举起黑瘦的手

臂，冲天的愤怒呐喊在空中震荡，回声缓缓地、庄严地消失了，有如远方的隆隆炮声。群众越聚越多，扬起团团黄土，一个个人影在灰色的背景上显得越来越清楚。一个老人走来，弓背低身朝着地下，好像在寻找他失去的青春。一个赤脚的小女孩牵着老人的破衣衫，用温顺的、蓝得像矢车菊一样的眼睛，望着那高大的台阶。她望着，又笑着。在他们后面走着的全是灰色的、消瘦的人影，穿着褴褛的衣衫，大声唱着一支悠长的挽歌。有一个人尖声吹着口哨，还有一个，手插在衣袋里，嘶哑地高声大笑，眼睛里燃烧着疯狂的光芒。

“我生来就是平民，一切衣衫褴褛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啊，世界多么丑恶，人们又多么不幸！啊，你们，那些在上面的，你们……”

青年这么说，昂着头，紧握着表示威胁的拳头。

“你恨上面的那些人吗？”魔鬼问，狡诈地朝青年低下身来。

“我要向那些王公贵人报仇。我要狠狠地向他们报仇，为我的那些兄弟，他们的脸色黄得像土，他们的呻吟声比 12 月的狂风还要可怕！看看他们那赤裸的、流着血的身体吧，听听他们的叹息声吧！我要为他们报仇！让我上去！”

魔鬼笑了：“我是上面那些人的卫士，没有贿赂，我是不会出卖他们的。”

“我没有黄金能拿来贿赂你，我什么也没有……我是衣衫褴褛的穷小子……但是，我准备牺牲我的头颅。”

魔鬼又笑了：“啊，我不要那么多！只把你的听觉给我就行了！”

“我的听觉！行……让我永远什么都听不见，让我……”

“你仍旧会听得见的！”魔鬼安慰他，并让开了路，“过去！”

青年跑了过去，一步跨了三级，但是魔鬼毛茸茸的手把他拉住了：“够了！停下来，听听下面你的那些兄弟怎么呻吟吧！”

青年停下来，倾听着。——奇怪：他们为什么忽然愉快地唱起歌来了，又那么无忧无虑地笑着？……于是他再往前跑。魔鬼又拦住了他：“如果你还要跨三级，我要你的眼睛！”

青年绝望地挥了一下手：“那么我就既看不见我的兄弟，也看不见我要向他们报仇的那些人了！”

魔鬼说：“你仍旧会看得见的……我会给你一双好得多的眼睛！”

青年又跨了三级，望了望下面。魔鬼提醒他说：“看看他们那赤裸的、流着血的身体吧。”

“天哪！真奇怪：他们什么时候穿上了这么漂亮的衣服！他们身上没有流血的伤口，而装饰着红艳艳的玫瑰花！……”

每跨三级，魔鬼都要收取小小的贿赂。然而青年继续往前走，只要能到达那里，向那些脑满肠肥的王公贵人复仇，他愿意付出一切！看，一级，还有一级，他就到了上面！他要为他的兄弟报仇了！

“我生来就是平民，一切衣衫褴褛的人……”

“年青人，还有一级！再上一级，你就可以复仇了！然而这一级，我总是要双倍的贿赂：把你的心和记忆给我。”

青年挥了一下手：“心吗？不！那太残忍了。”

魔鬼盛气凌人地大笑说：“我并不那么残忍。我要给你换一颗黄金的心和全新的记忆！如果你不答应，就永

远过不了这一级，你也就永不能为你的兄弟报仇了——那些人的脸色黄得像土，他们的呻吟声，比12月的狂风还要可怕。”

青年望了一眼魔鬼那满含讥讽的绿眼睛。

“可是，这样我就是最不幸的人了。你拿走了我一切有人性的东西！”

“相反——你是最幸福的人了！……要不？你同意吗：只要你的心和记忆？”

青年沉思着，一块黑影笼罩在他的脸上，布满皱纹的额头上流下浑浊的汗滴：他愤怒地握紧拳头，从牙齿缝里说道：“行！拿去！”

……像夏天的暴风雨，发怒又发狂，他披散着黑发，跨过最后一级。他已经到达最高处了。忽然，他脸上绽出了微笑，眼睛闪耀着平静而快乐的光芒，拳头也松开了。他望了一眼正在欢宴的王公们，又望了一眼下面那正在咆哮着、诅咒着的衣衫褴褛的灰色人群。他望着，然而在他脸上，连一丝肌肉也不抖动：那张脸显得很明朗、愉快、满足。

他看见下面是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群，呻吟已经变成了颂歌。

“你是谁？”魔鬼嘶哑而狡诈地问他。

“我生来就是王公，众神是我的兄弟！啊，世界多么美妙，人们又多么幸福！”

1923年5月

5 短篇小说大师埃林·彼林和他的《格拉克一家》

埃林·彼林（Елин Пелин）1877年生于索非亚附近拜洛沃村的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真名是迪米特尔·伊万诺夫·斯托扬诺夫。笔名埃林·彼林取自一首民歌，意思是“苦艾”。埃林·彼林在家乡接受了初等教育以后，曾往索非亚和其他城市读书，因酷爱文学而不重视学业，没有读到中学毕业。1895 年回到家乡当了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动员任随军记者。1903—1926 年任图书馆管理员。后来任伊凡·伐佐夫纪念馆馆长直到 1944 年。他曾在法国进修一年。1940 年被选为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并出任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主席。人民政权建立后参加《九月儿童》杂志的编辑工作。埃林·彼林自幼生活在农村，喜爱绘画和打猎，对劳苦农民和大自然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熟悉农民的痛苦和愿望、他们的机智和勇敢，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和心理。这些在他以后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中都一一体现了出来。

他在青年时代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他后来能够比较清醒地观察种种社会现象和阶级关系。但他也受过一些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这对他的某些作品产生了消极影响。

埃林·彼林继承和发扬了伐佐夫、波特夫和卡拉维洛夫这些保加利亚文学大师的现实主义传统，成了保加利亚农村的歌手，杰出的短篇小说大师，被称为保加利亚的契诃夫。

19 世纪末，保加利亚农村原有的宗法制经济开始转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少数富农把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广大的个体农民纷纷破产，沦为雇农和短工，或流落他乡。埃林·彼林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活动。

他的短篇小说深刻地反映 20 世纪初保加利亚农民在资本主义和君主专制下的苦难生活。有的描写天灾和疾病带给人们的灾难,如《天灾》、《夏日》 有的描写青年的恋爱悲剧,如《列波》、《在磨房边》 有的描写因累死耕牛而陷人绝望的农夫,如《在垄沟上》 有的描写农民流落他乡，思念故园，如《割草人 》;有的描写具有反抗精神的农村青年，如《安德烈什科》；有的揭露官吏、富农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如《迟收的田地》、《在阴间》 有的揭露教会的黑暗和

伪善,如《在修道房里》、《诱惑》…… 埃林·彼林把许多短篇小说都写得像一幅幅农村风景画，把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

在埃林·彼林众多的作品中，中篇小说《格拉克一家》[①]（*Герацuте*，1911）是最重要的一部。小说通过对一个农村大家庭的兴衰过程的描写，展示了农村宗法制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下逐渐瓦解。小说的主人公约尔丹·格拉克毕生辛辛苦苦建立了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但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他的三个不肖儿子，只几年工夫，就把他经营了几十年的一个和谐家庭，弄得破败不堪。大儿子博让虽然勤劳能干，但是贪婪、阴险、狡诈，排挤两个弟弟，还盗窃父亲的钱财。二儿子彼得不学无术，整天闲荡；三儿子帕维尔到城里当了几年兵，回来后把花柳病传给了妻子艾尔卡。8岁的小孙子扎哈林乔被他父亲彼得送到城里去当了小工。院子里象征着他们家族的那棵挺拔茂密的大松树被彼得砍倒在地。老格拉克目睹了这一切，在一个和煦的春日，在他自己的酒店门前悲愤而死。小说情节紧凑，人物鲜明，语言生动，描写细腻，集中地体现了埃林·彼林的文学才华。

埃林·彼林1922年发表的另一篇中篇小说《土地》是《格拉克一家》的姊妹篇，内容是写富农埃尼奥对土地财富的贪得无厌。这种贪婪使他拒绝了美丽的穷家女子茨韦塔的爱情而娶了富家的驼背女子斯坦卡，这种贪婪还促使他杀害亲兄弟。此后埃林·彼林还写了散文诗集《黑玫瑰》（1928）、短篇小说集《在修道院的葡萄架下》（1936）、幽默短篇小说集《我、你、他》（1936）等。1958年出版了《埃林·彼林全集》，共10卷。

埃林·彼林还是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著有诗集《清澈的小溪》。他的幻想小说《扬·彼彼扬》和《扬·彼彼扬登月》被认为是最好的少儿读物。

下面我们选录埃林·彼林的《在垄沟上》，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

①有中译文，见《埃林·彼林选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北京。

以看到作者对保加利亚农民的深厚感情、对他们贫苦生活的同情和他细腻动人的笔触。

在垄沟上[①]

雨整整下了一个礼拜没有停。白天黑夜静静地落着不紧不慢的细密的毛毛雨。淅沥，淅沥，淅沥——大地饱饱地灌足了水分。之后，微风吹来，云散天晴。秋天温和的太阳，暖煦煦地晒起来。田地慢慢晒干了。天气晴朗，正是犁田的好时候。

波内·克拉伊内内茨套上了贝尔乔[②]和西乌什卡[③]两头牛在田地里扶着犁耕起地来。他的那块地在一片宽阔肥美的洼地上，四周有树林挡着风。雨后吹干了的土地像沙糖那样松散。波内摇了一下木棒喊道：“得儿，得儿，走，宝贝，走啊！”

树林里欢乐地响起了回声。老贝尔乔摇着尾巴不慌不忙，慢吞吞地往前走着。西乌什卡，这头瘦弱的小个子乳牛，只有贝尔乔的一半大，鼓着劲儿，竭力想同贝尔乔走得步调一致。

看，第一条犁沟横贯在田地里了。接着出现了第二条，第三条。波内愁眉不展的面孔舒展开了。他忘记了自己的贫困，开始低声吹起口哨来。

“不要着急，贝尔乔，不要着急。西乌什卡在你的后面跟不上啦。走啊，西乌什卡，啊，可怜的。你们累了，可怜的，可有什么法子呢！我也很疲乏了。得儿——得儿，走吧，走吧！”

① 选自陈文贸、魏振东译《埃林·彼林选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北京。
② 从“白色”一词变来的牛名。
③ 从“灰色”一词变来的牛名。

贝尔乔，这条健壮的老公牛，喘着气，像一个爱摆架子的老爷似的，昂首阔步地走着，矮小的西乌什卡好容易才跟得上他。她的身子在轭套下面拱着，张着嘴，翘着细细的尾巴，贝尔乔迈一步，她就要迈两步。她伸着舌头使劲往前走。

周围连个人影也没有。秋天的脚步声在树林里静悄悄地沙沙地响着。干树枝在它的脚下发出细微的坼裂声。

“走啊，西乌什卡，走啊，亲爱的！”波内不时吆喝着，心惊胆战地看着这条母牛越来越没有力气了。

“停下！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两只疲劳的牲口立刻停了下来。波内走向前去，开始抚摸他们的额角。

“你真没有良心，贝尔乔，看你把西乌什卡累成什么样子了。对吗，心爱的？”

西乌什卡和贝尔乔沉重地喘着气，用悲伤的眼睛漠然望着他。西乌什卡嘴唇上冒出了白沫，流到地上。她先看看自己白色的伙伴，然后看看主人，随即低下了头。

“怎么啦，心爱的，你怎么啦？告诉我。你难过吗？啊，没关系，今天我们干点活，明天是节日，你可以休息一整天。你干吗看着我，贝尔乔？你是个好汉！”波内说道。

但是西乌什卡没有抬起头来。主人的话看来一点儿也没有能使她得到安慰。塌陷下去的两肋很不匀称地一起一落，两腿不住地打着哆嗦。

“你怎么啦，西乌什卡？告诉我，心爱的。”波内惊慌地说，像关心小孩子似的抚摸着她。随后又抓起犁杖喊道：

“喂,走呀,干活儿吧——活动活动就好啦。”

贝尔乔使劲儿往前走。西乌什卡在它后面用力想迈

步，但是不行，于是贝尔乔也停了下来。

“使劲,使劲!”波内鼓励着牲口喊道。

树林里快活地响起了回声。贝尔乔又迈了一步。西乌什卡还想往前走，但她的腿却抖起来了，她悲痛地哞地叫了一声，就带着轭套倒在地上了。

波内丢下木棒，赶紧给贝尔乔卸了套，惊慌地俯身去看西乌什卡。她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伸长脖子沉重地喘着气。她的嘴埋在松软的泥土里，眼睛紧紧地闭着。

“起来,西乌什卡,起来!”波内给她卸下了套,小心地握住牛角拉她起来。

西乌什卡微微睁开眼睛，看看她的主人，好像想说：“让我安静地死去吧。”随后又把眼睛闭上了。

波内在牛周围跑来跑去，不知怎么办才好。太阳独自在天空望着，不慌不忙地往山岗背后偏过去。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树林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息。

“起来,西乌什卡,爬起来,心爱的,看,贝尔乔在笑你呢。起来，不要淘气，看，土地多么松软，趁这个时候耕最好了。”

波内握住牛角又打算把她拉起来。她用腿撑着地面竭力挣扎着站起来，但是毫无结果，于是又一头倒在松软的土地上困难地呼吸着。

波内在她旁边坐下来，把她的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开始抚摸她，吻她的额角。

“可怜可怜我吧，心爱的。我们只剩下那边一小块了。把它犁完了你想休息多久就休息多久。将来我再也不使唤你了。你的小加里察慢慢就会长大，会来帮助贝尔乔的，那时你就可以整天躺在牛栏里享福了。孩子们会用白铜水桶给你送水，每天早晨给你刷毛，送饭。你的病会好的，你会健壮起来的。对吗，亲爱的？加里察和贝

尔乔将来会一块儿耕地，你就在山岗上吃草，看着他们，喊道：‘干活吧，干活吧！’你会喜欢他们喜欢得没个够。到了晚上我给加里察卸了套，她会舔着你说道：‘妈妈，晚安！’起来，心爱的，起来吧！”

但西乌什卡一动也不动，眼睛也不睁开。她像发疟疾似的打着哆嗦。波内站起来，掰了块面包，放了点盐在上面，送到她的嘴边。

“呐，亲爱的，吃吧。”

西乌什卡睁开眼睛感激地看了看主人，又把眼睛闭上了。

波内绝望地叹了一口气，望了望晒干了的田地，望了望沉默着的树林，望了望在田埂上温驯地吃着草的贝尔乔，看了一眼西沉的太阳，他知道只有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这儿。在这片洼地里是无从得到帮助的。

他又走到病牛眼前。

“起来，宝贝，树林里有狗熊，它要来吃掉你的！”他开始吓唬她。他从大车上取出一块破旧的粗毛毯裹在身上，走进树林里去，然后学着熊叫：“叭呜！……啊呜！……”从那里爬出来。

可怜的母牛睁开了眼睛，眼睛里燃烧着疯狂的恐惧。她抬起了头，拼命绝望地吼叫，但是仍然站不起来。

波内扔下粗毛毯，绝望地朝她弯下腰，划了个十字就放声哭起来。

西乌什卡又哞地叫了一声，眼睛睁得老大，接着就断了气。

6 伟大的反法西斯诗人尼科拉·瓦普察洛夫

30 年代后期到 40 年代初期，尼科拉·瓦普察洛夫（Никола

Вапцаров，1909—1942 ）创作的诗歌，达到了当时诗歌创作的顶峰。他虽然只写了一部诗集《马达之歌》（*Моторни песни*），但却以其卓越的艺术才能，在诗歌中成功地反映了人民反抗保加利亚君主法西斯专政的斗争，以及他对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心。他的《信念》、《春天》以及就义前几小时写的《战斗是无情而残酷的……》等诗篇，几十年来一直鼓舞着人民，特别是青年，去争取美好的明天。瓦普察洛夫和波特夫、斯米尔宁斯基一起被称为“保加利亚三大革命诗人”。

瓦普察洛夫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他 1924 年进了拉兹洛格市的高中后就积极参加文化教育活动，他的第一首诗《走向光辉的理想》就是这时发表的。1926 年瓦普察洛夫进了瓦尔纳的轮机学校。他不顾艰苦的军营生活，继续写诗。在实习期间，他接触了进步的工人和海员，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他还亲眼见到沦为殖民地的近东各国的悲惨状况，从而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并把激愤的心情倾注在诗歌里。

1932 年瓦普察洛夫到故乡附近的一家纸板厂当火夫、技工。1934 年参加保加利亚共产党，后来担任保共里拉山谷地区委员会委员。他在工人当中积极活动，鼓动他们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因此在 1936 年被工厂解雇。在这段时期里他写出了《工厂》、《春天在工厂里》、《忆旧》等反映工人斗争的诗歌。1936 年的西班牙革命鼓舞了瓦普察洛夫，他写下了组诗《歌唱一个国家》，用笔参加了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

30 年代末，法西斯主义到处横行霸道，疯狂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保加利亚反动派甘心做德国法西斯的附庸，为虎作伥。这时，瓦普察洛夫吹起了诗的号角，号召人民反对国内外的法西斯分子，保卫祖国。《我有祖国》、《起义者之歌》、《恋歌》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力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瓦普察洛夫受党的委托，到故乡发动反战斗争，不幸被捕。在保释期间，他和工人青年联盟领导人一起

积极参加《文学评论报》的工作，团结进步青年作家，宣传革命思想。1941 年 5 月被流放到戈德齐。同年 7 月，由于著名作家明科夫出庭作证，法庭才被迫宣布瓦普察洛夫无罪。这时保共已经采取武装斗争的方针。瓦普察洛夫回到索非亚后，即全力投入革命工作，成为保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切任务。1942 年 3 月，他再度被捕。

瓦普察洛夫在 4 个月的审讯期间，经受了种种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捍卫了一个真正爱国者和共产党员的尊严。法西斯法庭终于在 1942 年 7 月 23 日宣判瓦普察洛夫死刑。当天晚上，瓦普察洛夫和其他五位同志高唱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革命诗人波特夫的战歌从容就义。

瓦普察洛夫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是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的时期，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运动高涨的时期，以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和茁壮成长的时期。这一切促使年轻的瓦普察洛夫与生活搏斗，与命运较量，寻找真理和希望。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工人群众的教育下，逐渐成长为一个自觉为共产主义美好未来而奋斗的反法西斯战士、共产党员诗人，成了时代的号角、人民的代言人。瓦普察洛夫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他把这一信念用诗歌表达了出来。他生前出版的惟一诗集《马达之歌》的第一篇作品就是《信念》。

瓦普察洛夫由于有坚定信念，所以他才充满希望，热爱生活。他认为同“长着铁爪的生活”搏斗是他生命的意义。他说“为了生活,我什么都肯做”(《信念》)。在那“到处是一片黑暗”(《祖国》)的时候，他相信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他多次歌颂“春天”,写过三首以“春天”为题的诗篇。在他的笔下,“春天”就是党、希望、革命、胜利、共产主义信念。他知道“春天”要“带来雷电”，“带来暴雨和疾风”，但是它“将重新唤起人们的许多希望，洗净血污的创伤”，然后将是一派革命胜利的景象：

鸟儿将在麦田里欢唱，
在无际的晴空翱翔……
人们将愉快地劳动，
相亲相爱，如同兄弟一样（《春天》）

瓦普察洛夫懂得：一个人一定要有信念，没有信念就等于没有生命，没有希望，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正因为他认识到信念的无比重要，他才在那么多诗中指出“比歌儿更动人，比春天更美丽的生活”定将来临（《人之歌》）。正因为他认识到信念的无比重要，他才在劳累一天之后，还要组织文艺晚会，亲自朗诵新作：“用信念把人们喂饱”（《不要怕，孩子们》）。用诗歌帮助人们坚定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是瓦普察洛夫对保加利亚人民立下的最大功勋。

敌人可以夺走瓦普察洛夫生命，但是却夺不走他的信念，他庄严宣称：“信念在我胸膛中已经穿上铠甲，能攻破它的穿甲子弹还没有发现！”他在敌人的法庭上，在死亡的威胁下，无所畏惧，他说：“我的行动是完全自觉的，我正在为祖国服务，我并不后悔。我也不恳求任何人开恩。”他在牺牲前几小时仍然在用手中的笔进行战斗，再次表达他的信念，给人民留下了最后一首诗：

斗争无情而又残酷，
斗争，正如人们所说，犹如史诗。
我倒下了。另一个将代替我……就是如此——
这里，个人又有什么意义！

枪击，枪击以后——又喂蛆虫。
就是这样简单，合乎逻辑。
但是，我的人民啊，在暴风雨中

我们仍将在一起，因为我们爱你！

1942年7月23日14时

这一首用鲜血写成的诗，高度概括了瓦普察洛夫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诗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知道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抒怀》),自觉为争取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顽强战斗,为信念献身，视死如归。他的一生就是一首壮丽的诗！

瓦普察洛夫的诗朴实无华，铿锵有力，在形式、语言和风格上都有创新，成为保加利亚诗歌中新的高峰。而他战斗的一生和英勇的献身，又赋予他的诗以更大的感染力。他的每一首诗都出自肺腑，都是催人向上的号召。因此他的诗受到人们，特别是青年的热爱。

瓦普察洛夫的诗集在中国曾出版过两种不同的版本[①],《人民文学》、《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等刊物以及一些外国诗歌合集都曾多次发表过他的作品以及关于他的评论和回忆文章。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而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又精选了瓦普察洛夫的八篇诗作，作为永恒的纪念[②]。下面就是他的名诗《信念》。

信　念

看——我在呼吸，
工作，
生活，
（也尽可能）

① 《瓦普察洛夫诗选》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再版。

② 见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第36卷（保加利亚卷）第605——617页。

写些诗歌。
我和生活
怒目相视，
竭尽全力
跟它拼搏。

我和生活经常争吵，
但你不要以为
我憎恨生活。
恰恰相反：——
就是死去，
我仍旧热爱，
仍旧热爱
那长着铁爪的
生活！

譬如，现在他们
给我套上绞索，
问我：
“怎么样，还愿不愿意多活一小时？”
我会立刻高喊：
“放下！
放下！
凶手，快快放下
绞索！”

为了生活，
我什么都肯做。
我愿登上试航飞机

冲上天际；
我愿钻进喷气火箭，
独自一人
在太空中
去寻找
遥远的
星体。
那时我仍然感到
快乐——
看着那
天空中的
迷人的蓝色。
我仍然感到
快乐——
因为我还活着，
还是原来的我。

但是，譬如说，
你们从我的信念中
哪怕夺去
麦粒大的一丁点儿，
那时我就要大吼，
像心脏受伤的
金钱豹那样
痛苦得大吼。

那时的我
还剩下什么？
掠夺之后，

我就立刻粉碎，
说得更清楚些，
说得更准确些 ——
掠夺之后，
我就立刻化为乌有。

你们也许
想在这幸福的日子里
把我的信念
摧毁。
我的信念：
明天，
生活将更加美好，
生活将更加富有智慧！

请问，你们怎样进攻？
用子弹？
不！不成！
白费！——不值一文！

信念在我胸膛中
已经穿上铠甲，
能攻破它的
穿甲子弹，
还没有发现！
还没有发现！

四社会主义时期的保加利亚文学（1944—1989年）

经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起义和斗争，保加利亚人民终于在1944年9月9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有利时机，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建立了保加利亚人民世世代代渴望的人民政权。社会主义革命在保加利亚土地上的胜利，根本改变了保加利亚文学的面貌，为它的蓬勃发展展现了无限美好的前景。

1 人民政权建立初期的保加利亚文学

1944年9月9日武装起义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使保加利亚人们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中。一批批在反对法西斯政权期间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游击队，纷纷从巴尔干山回到人民群众当中，他们的丰功伟绩成了保加利亚文学歌颂的对象。

呼啸吧，巍峨的群山，
呼啸吧，自由的森林，
勇敢的游击队员来了，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诗人姆·伊萨耶夫的这支响彻巴尔干山南北的歌，充分表达了人民对勇士们的热爱。

获得解放的人民立即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把自己的儿女送入最后战胜法西斯的斗争行列，女诗人埃·巴格梁娜写出了动人的诗篇《写给我在前线的儿子》。

人民政权建立初期的保加利亚国内形势仍然十分复杂。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祖国阵线政府还没有巩固，国内被推翻的反动派和阶级敌人还在企图制造混乱，受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还要医治创伤……但是，有着与人民共患难传统的保加利亚作家，积极投入了重建国家的光荣斗争。

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十分重视文学在动员和教育人民群众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作用。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立即创立了人民自己的文学报纸《文学阵线报》（1944年9月27日出版了第1期）。在人民政权建立后不到两个月就召开了保加利亚作家协会①的全体会员大会，接受了近七十位新会员，其中有许多人参加过地下反法西斯运动。

革命胜利以后，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立即参加了与苏联红军一道消灭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保加利亚第一军的宣传连，其中有拉马尔、姆·伊萨耶夫、伊万·马丁诺夫（Иван Мартинов，1912—1991）帕维尔·维任诺夫（Павел Вежинов，1914—1983）、拉多伊·拉林（Радой Ралин，1923—　）、迪米特尔·恰夫达罗夫－切尔卡什（Димитър Чавдаров-Челкаш，1912—1972）、斯托扬·达斯卡洛夫（Стоян Даскалов，1909—1989）、佩特尔·斯拉文斯基（Петър Славински，1909—　）等人。有的作家在其他连队服役，如埃夫雷姆·卡兰菲洛夫（Ефрем Каранфилов，1915—　）、维塞林·汉切夫

① 保加利亚作家协会成立于1913年，人民政权建立之前曾长期支持国内的民主力量

(Веселин Ханчев, 1919—1966)、伊万·阿尔任廷斯基（Иван Аржентински, 1910— ）、伊万·米尔切夫(Иван Милчев, 1897—1982)、维利奇科·内什科夫（Величко Нешков, 1914— ），其中有的作家如伊万·哈吉伊斯基（Иван Хаджийски, 1907—1944 ）和马特维伊·沃列夫(Матвей Вълев, 1902—1944)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保加利亚人民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为“保加利亚卫国战争(1944—1945)”。

在革命刚刚胜利后出版的许多作品中，既可看到主题上的创新，也可看到对新问题尚未充分掌握的情形。在诗歌方面有赫·拉德夫斯基的《空气缺乏》（1945)、姆·伊萨耶夫的《战争》(1945)、文科·马尔科夫斯基的《雌鹰》（1944)、留·斯托扬诺夫的《诗集》(1945)、埃·巴格梁娜的《五颗星》（1953)、尼·富尔纳吉耶夫的《伟大的日子》（1950)等。在散文方面有格·卡拉斯拉沃夫的短篇小说集《此其时也》（1944)和《仇敌》（1945），埃米利扬·斯坦涅夫(Емилиен Станев, 1907—1979 ）的《节日和工作日》（1945)、伊利亚·沃伦(Илия Волен, 1905—1982)的《野蛮的灵魂》（1945)、奥·瓦西列夫的《真实的生活》（1945)、康·康斯坦丁诺夫的《火灾废墟上的飞鸟》（1948)。长篇小说有迪米特尔·迪莫夫（Димитър Димов, 1909—1968)的第二部小说《有罪的灵魂》(1945)、斯·达斯卡洛夫描写地下斗争和游击队运动的三部曲《路》的第一部[1]、埃米尔·科拉洛夫(Емил Коралов, 1906—1986)描写1923年9月反法西斯起义的《九月起义参加者》(1945)。戏剧方面有克·丘利亚夫科夫的第一部剧本《斗争在继续》（1945)和奥·瓦西列夫的《警报》[2](1948)，两者都是描写反法西斯斗争的。此外还有阿·拉兹茨维特

① 有两种中文节译本，名《加尔乔》，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北京；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上海。

② 有两种中译本：《人间乐园》，作家出版社，1955年，北京；《警报》(编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保加利亚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重庆。

尼科夫的《功勋》(1946)，剧本再现了1876年四月起义的悲壮场面，从而揭示了保加利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连续性。

这些作品虽然题材多样，但大都缺乏应有的深度，而且以短小的作品居多。这说明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还远远赶不上急剧变化着的新生活。

保加利亚文学界从革命胜利之初就得到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巨大关怀。1945年5月14日，还没有回到国内的季米特洛夫就通过保加利亚作家协会向保加利亚作家发出了热情洋溢的信，向他们提出了光荣的任务：

> 现在，反对法西斯德国的解放战争已经胜利结束，和平时期已经开始，我国作家进行创作活动有了良好的条件。我相信，保加利亚作家将会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因为我国人民像需要面包和空气一样需要真正的文学，这种文学将以深刻的真实性和高度的激情提高人们的文化思想水平，增进人们对人民和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加深人们对法西斯主义和人民的一切敌人的痛恨，鞭挞各种腐朽的和腐蚀人民健康肌体的东西（寄生思想、鄙俗的升官发财思想、斤斤计较的利己的政客思想），清除保加利亚空气中的大保加利亚沙文主义和各种黑暗势力的恶臭，宣传对真正科学的热爱，鼓励人们在劳动和文化领域中和为保卫人民的自由与权利的斗争中建立功勋，培养斯拉夫各民族团结，国际大团结和同我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永远友好的感情。①

接着季米特洛夫在信中指出“期待着真正的人民作家用创作之笔进行艺术加工的”重大主题，并希望写出“优秀的少年儿童文

①季米特洛夫：《论文学、艺术和文化》，第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北京。

学作品”。在这封信里，季米特洛夫还谈到作家协会的任务，并要求它开展健康的文学批评。后来这封信就成了同年 9 月召开的第一届保加利亚作家全国代表会议所遵循的重要文件之一。

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全面评价保加利亚文学的过去、正确认识作家自由的问题、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由于对付反动当局的报刊检查而称作“艺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重大问题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8 年 12 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对团结作家队伍、统一思想、明确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保加利亚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季米特洛夫的光辉形象，成了保加利亚作家“描写新的主人公”的热潮中的主要描写对象。在季米特洛夫 1949 年 7月逝世前后，出现了一批歌颂这位深受保加利亚人民和世界人民热爱的人物的优秀作品。迪·波梁诺夫、潘特列伊·马特耶夫（Пантелей Матеев，1898—1957）、拉马尔、克·佩内夫、姆·伊萨耶夫、博日达尔·博日洛夫（Божидар Божилов，1923— ）[1]、维·汉切夫、迪米特尔·麦托迪耶夫（Димитър Методиев，1924— ）、拉·拉林、帕维尔·马特夫（Павел Матев，1924— ）等人塑造了感人的季米特洛夫形象。季米特洛夫逝世后，迪·波梁诺夫、尼·赫雷尔科夫、赫·拉德夫斯基、维塞林·安得列耶夫、多勃里·若特夫（Добри Жотев，1921— ）、达维德·奥瓦迪亚（Давид Овадия，1923— ）等诗人写了深切缅怀领袖的诗篇。此外，还有许多单行本，如勃拉加·迪米特罗娃（Блага Димитрова，1922— ）写的诗集《缅怀领袖的诗》（1950），卡门·卡尔切夫（Камен Калчев，1914—1988）写的传记小说《工人阶级的儿子》[2]

① 博日洛夫的诗有中译文，见《诗刊》，1959 年第 8期。

② 有中译本，见《季米特洛夫一家》，新华出版社，1987 年，北京。

(1949)、克·丘利亚夫科夫创作的剧本《第一次打击》[1](1952)，等等。

革命胜利后的10年当中，保加利亚文学的题材极大地丰富了。以反法西斯斗争为主题的诗作，继承了波特夫、斯米尔宁斯基、米列夫，瓦普察洛夫的战斗传统，再现了许多游击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多·加贝的《薇拉》(1946)、伊萨耶夫的《火》(1946)、维塞林·安得列耶夫(Веселин Андреев，1918—1991)的《游击队之歌》(1947)、达·奥瓦迪亚的《游击队员日记》(1948)、多·若特夫的《渴望》(1951)、迪·麦托迪耶夫的诗体长篇小说《季米特洛夫的一代》(1951)、格奥尔基·贾加罗夫(Георги Джагаров，1925—)的《我的歌》(1954)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作品。

在小说方面，以中短篇小说成绩比较突出。格·卡拉斯拉沃夫的中篇小说《探戈》[2](1951)、埃·斯坦涅夫的两部中篇小说《偷桃子的人》[3](1948)和《傍晚静悄悄》[4](1949)，帕·维任诺夫的中篇小说《在原野上》(1950)等都一反个人崇拜时期的简单化、教条化，塑造了有血有肉、有内心矛盾和斗争的人物，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一些动人的回忆录式的纪实作品，也丰富了反法西斯斗争这一主题，其中较著名的有：维·安得列耶夫的《在洛皮扬森林》(1947)和《游击队故事》(1963)、埃米尔·马诺夫(Емил Манов，1919—1982)的《被俘的鸟群》[5](1947)等。这一体裁到60年代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佐拉·德拉戈伊切娃(Цола Драгойчева，1898—)的《职责的嘱托》(1972)，达·奥瓦迪亚的《八月，八月……》(1965)等都是极受欢迎的回忆录。

① 有中译本，戏剧出版社，1959年，北京。
② 有中译本，广播出版社，1982年，北京。
③ 有中译本，见《傍晚静悄悄》，新华出版社，1983年，北京。
④ 同注3。
⑤ 有中译文，《被俘的鸟群》(选译了三篇，编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保加利亚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重庆。

到 60 和 70 年代，随着艺术技巧的创新和思想内涵的加深，反法西斯斗争主题的作品更加引人入胜，比较重要的作品有帕·维任诺夫的《星星在我们顶空》[①](1966)、约尔丹·拉迪奇科夫（Йордан Радичков, 1929— ）的《带火药味的读本》(1969)、多·若特夫的《经历过的故事》[②](Преживени разкази, 1973)、维·安得列耶夫的《不朽的人们逝去了》(1973)、德拉戈米尔·阿森诺夫(Драгомир Асенов, 1926—1981）的三部曲《在赫洛斯特拉特的阴影下》(1961—1966)、科斯塔丁·丘柳莫夫（Костадин Кюлюмов, 1925— ）的《青年和山》(1974)等。

保加利亚卫国战争的战斗功勋是革命胜利后保加利亚文学的另一个主题。在诗歌方面，除了老诗人埃·巴格梁娜感人至深的《写给我在前线的儿子》外,还有姆·伊萨耶夫的《火》(1946)、维·汉切夫的《子弹夹中的诗》(1954)、拉马尔的《戈兰·戈林诺夫》(1946)、拉·拉林的《战士日记》(1955)等，在小说方面比较重要的作品有帕·维任诺夫的中篇小说《第二连》[③](1949),伊瓦伊洛·彼得罗夫(Ивайло Петров, 1923—)的短篇小说集《洗礼》(1954)和中篇小说《在异国》(1982)、斯·达斯卡洛夫的短篇小说集《前线战士》(1945)、迪恰夫罗夫－切尔卡什的《伊凡和他的同志们》(1955),以及伊·马丁诺夫的长篇小说《德拉瓦河流过斯拉夫的土地》(1946)、伊·阿尔任廷斯基的长篇小说《奥尔洛夫斯基》(1958)、佩·斯拉文斯基的长篇小说《最后的突击》(1951)等。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全保加利亚掀起了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的热潮。这一崭新的现实鼓舞了新老各代作家。义务劳动运动、一批新水库和工厂的开工、保加利亚第一座社会主义城市

① 有中译本,《星星在我们顶空》(编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保加利亚卷),重庆出版社,1992 年，重庆。

② 有中译文，《经历过的故事》（选译了一篇，编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保加利亚卷），重庆出版社,1992 年，重庆。

③ 有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北京。

季米特洛夫格勒的建设，使作家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对劳动英雄的刻画、对美好未来的呼唤、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共产党和祖国阵线的热爱，成了作家创作的主要内容。诗人博·博日洛夫在《季米特洛夫格勒》一诗的开头写道：

这里没有城市。这里一切都是梦想。
城市要在未来的年代成长。
但是宽广的林阴大道将穿过
这深秋夜晚火焰熠熠的地方。

在诗歌方面，伊万·拉多耶夫(Иван Радоев, 1927—)、拉·拉林、多·若待夫以及一些青年诗人如伊凡·达维德科夫（1926— ），斯坦卡·彭切娃（1929— ）、克利门特·查切夫（1925— ）等人都有成功的作品。许多诗人出了单行本，如拉马尔的长诗《马里查河》(1954)、勃·迪米特罗娃的《罗多皮山之歌》(1954)、博戈米尔·赖诺夫(Богомир Райнов, 1919— ）的《五年计划的诗》[1](1951)等。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工人诗人佩尼奥·佩内夫（Пеньо Пенев, 1930—1959)。这位同季米特洛夫格勒一起成长的“穿着棉工作服”的诗人[2]，写出了这一时期感人至深的作品。在他的诗歌里，人们可以看到工人“在浇灌地基的时候”的伟大、光辉、欢乐和向往，也可以读到这一时期的忧虑、不安、缺点和失误。

当浇灌地基的时候

往事、情感、梦幻、黄昏，

① 有中译文，见 1959年第 8 期《诗刊》(片段)。

② 他的一些诗有中译文，见《白色的长椅》（保加利亚 20 世纪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年，上海。

还有人们，都会燃尽，
院中的槐花也会凋残，
晚风将在枝头低吟。

我们的后代会来到这里，
成为我们的继承人，
那时生命将离我们而去，
它将歌唱，像檐滴一样愉快而均匀。

心儿仍将在歌中诉说一切，
鸟儿又将把新巢筑成，
刚刚诞生的金光灿烂的星儿
仍然会在母亲的怀抱里大放光明。

矢车菊和紫罗兰又将开放，
仍旧是那样蓝得喜人——
但家园的日子已今非昔比，
故人已离去，新人又来临。

历史会不会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
向他们诉说，或者是默不作声：
那用泪水灌浇的希望
曾怎样在我们心中发芽生根……

在经受过战斗洗礼的大道上，
我们怎样把最后一颗地雷排除干净；
我们的欢乐怎样在模板里
随着高楼一层层增长……

我们怎么才只有二十五岁，
就已经白发如霜；
我们怎么在清晨踏着最初的露水出发，
却不是为了要把那微不足道的幸福品尝……

后人啊，你们就是读遍群书，
最终也未必能够想像：
当浇灌地基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模样！

啊，我们遇到过多少困难！
我们的命运多么值得羡慕！
我们度过的不是日子，不是时代——
我们度过的是斗争，是斗争！

在小说方面，反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比较优秀的作品有：安德列·古利亚什基(Андрей Гиляшки，1914—)的长篇小说《维德罗沃村》（1952）、帕·纬任诺夫的长篇小说《干枯的平原》（1952)、埃米尔·科拉洛夫的长篇小说《马里查河畔》（1952）、斯·达斯卡洛夫的长篇小说《利波万磨房》（1951）和《自己的土地》（1952)、克鲁姆·格里戈罗夫（1909—1987）的短篇小说集《村委会主席》（1950）和中篇小说《伊格利切沃》（1953）、哈拉兰·鲁塞夫（Харалан Русев，1914—1968）的长篇小说《悬崖峭壁》[1]（1948)，伊·马丁诺夫的《矿工》[2]（1950）和长篇小说《青春》（1952）、尼科拉·马林诺夫(1909—)的长篇小说《第 17 厂》（1953）、伊·沃伦的短

① 有中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上海。
② 有两种中译本：见《马丁诺夫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北京；《早晨》，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上海。

篇小说集《两个世界之间》(1958)等。尽管这些作品在刻画新人和迅速变化的现实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个人崇拜时期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存在着平铺直叙、幼稚的虚构、生硬的结局等缺点，特别是在所谓的“生产主题”的作品里，人几乎淹没在生产过程的描写中，淹没在机器和技术设备中，淹没在教学和事实中，而且是非好即坏。

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初几年，出版了不少反映不同时期人民斗争的长篇小说，如卡·卡尔切夫的《活着的人们还记得》(1950)、安·古利亚什基的自传体小说《爱情》(1955)、阿尔曼德·巴鲁赫(Арманд Барух，1908—)的《命运攸关的秋天》(1949)、迪米特尔·安格洛夫(Димитър Ангелов，1904—)的《出生入死》(1953)、埃米尔·马诺夫的《冒险者的末日》(1954)、佩·斯拉文斯基的《统治者的末日》(1951)等。这些作品大多真实地再现了历次斗争，但从艺术的角度评价，还有许多不够成熟的地方。

革命胜利后的和平生活为作家提供了创作大型作品的有利条件。50年代前期被文学史家称为“长篇小说的狂飙”。迪·迪莫夫的《烟草》[①](1951)、迪米特尔·塔列夫(Димитър Талев，1898—1966)四部曲的第一部《铁灯》[②](1952)、埃·斯坦涅夫的《伊万·康达雷夫》(1958)、格·卡拉斯沃夫的系列长篇小说《平凡的人》的第一部(1952)。

革命胜利后的和平生活也为社会主义戏剧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卡门·齐达罗夫的《皇上的恩典》(1949)、克·丘利亚夫科夫的《斗争在继续》、奥·瓦西列夫的《警报》、洛赞·斯特雷尔科夫(Лозан Стрелков，1912—1981)的《侦察》(1950)、托多尔·格诺夫(Тодор Генов，1903—)的《信念》(1954)等在思想主题的创新方面、在一系列迫切问题的提出方面、在品种风格的丰富方面，都作出了重要

① 有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北京。
② 有中译本，作家出版社，1961年，北京。

的贡献。在这些剧作中，《皇上的恩典》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一部，并被搬上了银幕。下面是《皇上的恩典》的故事梗概。

奥匈和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菲迪南在保加利亚即位。他酷爱权势，性情暴戾，在位期间给保加利亚人民带来了无穷灾祸。在他的统治下，保加利亚参加了两次巴尔干战争，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民族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战双方都力图把保加利亚争取过去。只有共产党反对参加战争。大战初期同盟国一方的暂时得胜，加强了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中亲德派的势力。

1915 年 9 月，住在一个小镇上的伊丽娜一家准备去俄国旅行。伊丽娜在巴尔干战争中失去了丈夫，身边有一子一女。她的儿子博扬正在院子里一边为菲迪南皇帝的金框肖像做包装木盒，一边同他的女友薇拉话别。那幅肖像上有皇帝的亲笔题字，上款是“赠给伊丽娜·拉迪奥诺娃”，下款是“保加利亚皇帝菲迪南一世”。忽然间，回来探亲的陆军大尉雅森（伊丽娜的外甥）走进院子，说他刚收到召他回团部的电报。雅森曾是博扬的叔叔拉迪奥诺夫的学生，赞成菲迪南同德国结盟的政策。他与反对参加战争的老师展开了一场舌战。

雅森正要离去，邻居贫农斯托扬陪伊丽娜从车站回来。伊丽娜对大家说，皇帝亲口告诉她保加利亚不会打仗。但她的话音未落，就听到街上击鼓者的“全国动员”的喊声。伊丽娜大叫：“我不相信我曾经救过的人会这样欺骗我！”她立即给菲迪南写了一封既痛苦又严厉的信。

一年以后，已在红十字会工作的伊丽娜被召入宫。菲迪南问她，在取得这些胜利之后她是否已经原谅了他。伊丽娜直率地说：现在谈胜利还为时过早，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她还告诉菲迪南，人民对德国人频频来访十分不满，士兵们都不想再战，他们不愿为德国人打通通往东方的道路而卖命。她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人民不相信菲迪南。最后，菲迪南意味深长地说：“没想到连救过我的母子二人也不相信我了。”

1917 年 11 月，住在斯科普里一座临时医院里的大批伤兵在诉说着战争的痛苦，有的伤兵讲到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夺取了政权，还要签订和约。当了护士长的伊丽娜正在诊疗室里同医生兰科夫谈话。兰科夫告诉她，现在士兵自伤的现象很严重，单这个小医院就发现了 20 起。伊丽娜劝兰科夫不要把他们交给战地军事法庭。在交谈战局的时候，兰科夫劝伊丽娜再去见一次皇帝，把真情告诉他，敦促他悬崖勒马。伊丽娜说她已对菲迪南失望了，并把一段往事告诉了兰科夫。 1914 年 9 月，她和儿子博扬到乡间去卖祖传的产业，菲迪南当时也在附近的皇家庄园里。他们母子在大道上看到有人在一座桥下埋设炸弹。这时皇家车队已到。伊丽娜不顾一切，站在桥头对着飞驰而来的车队招手。车队刚停，就听到一声巨响，桥炸毁了。菲迪南把他们母子二人请到宫里，又是宴请，又是送礼。但是没想到只过了一年，这个人就把她当作最后一个傻瓜加以欺骗。因此，她决不愿再一次听他说谎。她说，这次肯定会有聪明人出来制止这些疯子胡闹，不然她将因救了这个人而悔恨终生。

这时，博扬从南线顺道来看望母亲。他说南线的形势很好，士兵们准备造反，把枪口对准后方的敌人。战争已使他睁开了眼睛，他要有所作为。伊丽娜听了这话大为震惊，又起了向菲迪南陈述意见的念头。博扬劝她不要再犯错误，说了一声“别了”，就走了。

1918 年 5 月末，哈尔科夫上校发现博扬指挥下的连队思想激进，十分不满。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后，博扬仍然违抗军令，不肯发动一次无望的突然袭击。哈尔科夫说：“我要不是因为认识您那位德高望重的母亲，现在就可以对您就地正法。”

已得到晋升的雅森来劝博扬从命，遭博扬拒绝。雅森实际上已经成为造反士兵的告密者。

同年 6 月下旬，伊丽娜回到小镇。拉迪奥诺夫和薇拉等人正在鼓动镇里的妇女造反，向当局索要她们的丈夫。斯托扬从南线回来告诉伊丽娜，博扬因煽动士兵暴动而被捕。

伊丽娜爱子心切，决定再一次求助于菲迪南。半个月后，伊丽娜进宫谒见皇帝。菲迪南告诉她，她的儿子在前线组织暴动，罪不容诛。伊丽娜说，博扬的供词写的全是事实，是出于青年的坦率。菲迪南则认为那是一篇反对皇权的起诉书，并说博扬断言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伊丽娜说，他在参战时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是战争的痛苦使他产生了这种想法。接着伊丽娜和菲迪南就什么是民意、谁应该对战争负责、谁是保加利亚的真正敌人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伊丽娜最后发现菲迪南不肯发善心，便对他说，她们母子救了皇帝，皇帝还欠着他们家一条人命，恳求赦免她的儿子。菲迪南想了好久，终于说：“我的确是欠了你们的情，我准备报答。您必须到前线去领回您的儿子。他不能再留在那里。”

7 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伊丽娜和拉迪奥诺夫来到战地法庭庭长办公室。庭长把皇宫打来的电报交给伊丽娜。她由于激动竟看不清上面的字，只好求拉迪奥诺夫读给她听。电报说：“根据皇帝的厚意，准许伊丽娜。拉迪奥诺娃将她儿子的尸体运回他的故乡。”伊丽娜听后立即昏厥过去。拉迪奥诺夫说：“这就是皇上的恩典！”

博扬连队里的一个士兵把一封信交给了伊丽娜。信中写道：“亲爱的妈妈，我知道您非常痛苦，但是，您若理解我，就不会那么痛苦了。请您不要责备我没有听您的话，没替您着想。我一直是和您在一起的。您为我感到骄傲的一天一定会到来。我恳求您明白，我国人民走俄国人民的路的日子不会太远了。那时您所承受的痛苦都将得到报偿……”

伊丽娜离开办公室时，对着墙上的菲迪南像说：“你决不会得逞……博扬还活着……我的儿子还活着！”

维塞林·安得列耶夫（1918—1991 生于皮尔多普市一个抄写员家庭，中学时期即参加地下进步活动。 1938 年入索非亚大学攻读法律，边学习，边工作，并从事工人青年联盟的组织工作。遭迫害后，转入地下，后参加游击队运动。人民政权建立后，曾先后任

《人民军报》、《文学阵线报》总编辑,作家协会书记等职。1950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安得列耶夫的诗集《游击队员之歌》(1947）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保加利亚游击队员战斗生活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诗集描写了游击队员的丰功伟绩、他们对胜利的坚强信念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文字纯朴真挚，感人至深。游击队员们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青春和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在众多歌颂游击队员的忠贞形象中，《共产党员之歌》中的安东的形象最为强烈感人。

共产党员之歌

纪念我的游击队战友

斯特凡·米列夫·尼科洛夫－安东

一连拷打多日——没有片言只语，没有哀号呻吟……
双唇犯了错误——脱口说出：安东。

说出自己的名字后，整整一周默不作声
遍体鳞伤，伤口淌着血和脓……

“你的同伙在哪里？”……他面前浮现亲爱的队伍……
两眼微睁，浑身抽搐，但英勇不屈。

凶狠野蛮的特务在他身边朝天开枪——
他坚定地回敬道“:刽子手,朝着我的胸膛!”

敌人在伤口涂撒盐末——痛如针刺刀绞。
他咬紧牙关……竟能默默忍受煎熬！……

心毒手狠的豺狼无可奈何，仍继续拷打。
他疼痛得缩成一团，但仍旧守口如瓶。

他渐渐沉静下来……敌人却吓得不知所措，
呆呆地看着他，他却一言不发，那样豪迈、沉着。

“不是人，简直是铁！”法西斯特务咬牙切齿地狂喊。
死者从容说道：“不是铁，是共产党员！”……

这首只有8节16行的短诗，深刻而集中地描述了一位被俘游击队员悲壮的结局。安东在敌人一连多日严刑拷打下没有吐露只言片语，后来下意识地道出了自己的名字“安东”。敌人以为得逞，继续拷打，但勇士至死再也没有多说一个字。经过长时期的沉默，最后的较量终于来到。这时，英雄不只比刽子手们更强大，而且比死亡更强大，他那坚定有力的回答是留给后人的召唤：人可以死去，但是理想却永存。

《游击队员之歌》是安得列耶夫惟一的诗集。他后来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回忆录、随笔和游记 回忆录《在洛皮扬森林》(1947)、游记《世界上有个莫斯科》(1951)、短篇小说集《游击队的故事》(1963)随笔《我们青春常驻》(1963)、短篇小说和特写集《两个人和一只鹿》(1968)、少年故事集《你任何时候都能成为男子汉》(1971)、《随想集》(1973)、少年儿童故事集《信任之旅》(1974)、随笔和回忆录《我不能没有你们》(1974)、谈话录《单独和你在一起》(1979)。从1973年开始出版的三部曲《不朽的人死去了》(第2部，1982)是安得列耶夫创作中的新探索。

安得列耶夫的一些诗作如《共产党员之歌》、《给我的冲锋枪》、《祖国》等都有中译文[①]。

①见《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保加利亚卷595—600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重庆。

姆拉登·伊萨耶夫（1907—1991）出生于保加利亚西北部的一个贫农家庭。在索非亚上技术学校时因参加罢课被开除。曾参加1923年的九月起义。长期从事进步新闻工作，多次被捕。人民政权建立后作为战士作家参加保加利亚卫国战争，后任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阵线报》副主编、《保加利亚军人》杂志编辑等职。1950年和1971年两度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伊萨耶夫积极参加保加利亚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并以全部精力和激情将这些事件在文学上加以再现。他同瓦普察洛夫和拉德夫斯基一起，对保加利亚诗歌在思想和主题上的革新方面、在生动深刻地描写共产主义者的形象和揭示他们丰富而崇高的内心世界方面，作出了可观的贡献。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伊萨耶夫继续他在美学方面的许多探索。1946年出版的《火》，在揭示时代矛盾和冲突方面又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其中，组诗《集中营》再现了残酷而激动人心的囚徒生活；组诗《火》描绘了保加利亚卫国战争的感人场面。

伊萨耶夫在50年代创作的诗歌，反映了保加利亚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巨大变化，以及季米特洛夫的革命生涯和对苏联、中国、印度等国的访问。在60年代和其后出版的作品，代表了他的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些作品有《慷慨》（1966）、《高空》（1969）、《你无安宁》（1971）、《太阳的辩护》（1978）、《我羡慕飞鸟》（1981）。

他在《慷慨》一书中，对已经开始的革新过程表示了积极参加的态度：

我们生活在严峻的时代。
虚假的明灯已经熄灭。
马镫声声又催人踏上征途——
我们要把言语和行动合二为一。
我从我的生命之树上

摘下最成熟的果实。
什么？难道我已不再能
建立功勋，抱有梦想，创作诗句？

60年代的保加利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高涨，充满了创作精神和探索精神，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思想、新的形象、新的问题。伊萨耶夫的精神世界也变得更广阔、更丰富。诗集《慷慨》在诗人的创作道路上就是一部有关键意义的作品。其中有对问题的重新估价，有痛苦的沉思，也有对新时期的憧憬。

《你无安宁》是一部歌颂苏联和世界的伟大新发现和不朽的学者的诗集。

1973年出版的诗集《愤怒》则是描写壮烈的1923年九月起义的。这首长诗的最后，以巴尔干山的形象作为这次起义的总结。巴尔干山在保加利亚人的心目中一向是永恒和不朽的象征。

伊萨耶夫在创作生涯的初期就熟知政论作品的巨大力量。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在诗的美妙世界里》(1973)和1981年出版的《伊萨耶夫选集》第3卷。他在这两部著作中，对许多保加利亚和世界作家都有精辟的评论。

伊萨耶夫在1976年出版的回忆录《难忘的过去》，再现了革命胜利前所经历的艰辛道路和火红的年代。

伊萨耶夫曾在1954年访问过中国，并于1956年出版了访华诗集《在中国的阳光下》。这本诗集以热烈的感情描绘了中国人民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所迸发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赫里斯托·拉德夫斯基（1903—　）生于洛维奇的农村。曾在索非亚大学攻读罗曼语言文学。长期从事革命报刊工作。人民政权建立后曾任《文学阵线报》和《九月》杂志主编、作家协会秘书长等职。1950年和1951年两度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拉德夫斯基的名字是同保加利亚 30 年代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他创作的名诗《心向党》集中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激情，鼓舞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

你既严厉又温和，
严厉里带着母亲的慈祥。
为了不愧为你的儿子，
我愿无言地把一切献上。
我凝望着你的朝霞，
我要像它一样发光，
我要像斯米尔宁斯基那样歌唱，
我要像波特夫那样战死疆场！

以这首诗命名的出版于 1932 年的诗集，标志着保加利亚无产阶级诗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诗集《脉搏》（1936）以及收集在《空气缺乏》（1945）一书中的作品，继承了斯米尔宁斯基的传统，艺术地反映了客观现实，塑造了时代的正面主人公。

拉德夫斯基用热烈的抒情诗迎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更加成熟的艺术手法讴歌时代的巨大变化。在《咫尺青天》（1963）、《解放了的国度》（1956）、《人们》（1970）等诗集中，处处可以使人感受到对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的自豪心情。

党一直是拉德夫斯基作品的主题之一。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这一主题是多姿多彩的。《春天的开始》、《是你！》、《你的忠诚战士》、《奉献》、《梦想者》、《纪念碑》等诗，都是很有特色的。长诗《月下行》特别动人。诗中写了一位 1923 年反法西斯起义中遭枪杀的烈士重返故城瓦尔纳市的场景，烈士徒然去寻找旧地，因为城市已经面貌一新。诗人以自然而引人入胜的清淡笔调，道出了烈士虽然失去了生命，却留下了永远不能消灭的理想这一主题。

50年代中期以后，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出现的革新气象的鼓舞下，拉德夫斯基写了许多富有崇高道德和理想的作品，探讨了创作的实质和当代文学的意义，提倡对社会要有奉献精神和责任感。《创作》、《诗》、《诗人》、《诗人是战士》、《像一名号手》等就是这方面的力作。对于拉德夫斯基，诗是“神秘和无限明确的”，是“预言或者发现”，“是仲裁者或领袖”，是“人类之伟大和美好的凯歌”。

在拉德夫斯基的晚期创作中有许多自我剖析的作品，如《眼珠》(1980)、《抒情笔记》(1981)等。

1971年出版的诗集《天书》，是一部风景诗集。正如许多大诗人的作品一样，这些诗都是借景抒情，这里，大自然的一切都赋予了人的情感和人的感受。

拉德夫斯基还是一位写讽刺诗和寓言诗的能手。他除了继承以佩特科·斯拉维伊科夫、伐佐夫、米哈伊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保加利亚讽刺诗人的传统外，还吸收了民间幽默的精华。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第一部讽刺作品《我们是法治国家》。接着出版了《尊敬的人》(1947)、《寓言集》(1950)、《他们还活着》(1959)、《讽刺作品集》(1961)、《这不对吗》(1966)等单行本。

拉德夫斯基的创作气质也反映在他的许多散文中，这方面有论文集《关于诗人的话》(1970)和《明天的战斗》(1979)，回忆录《像活人一样活着》(两卷，1970—1972)等。

拉德夫斯基还是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俄苏诗歌的翻译家。

拉德夫斯基曾在50年代访问过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1961年出版了他的诗集，包括《心向党》、《脉搏》、《空气缺乏》、《我的共和国》等诗集中的48首诗和6首幽默、讽刺、寓言诗。

格奥尔基·卡拉斯拉沃夫(1904—1980)生于博里索夫格勒市(今五一市)德伯尔村的一个中农家庭。曾在邮电学校和师范学校学习。参加过1923年的九月起义。后任教师。1928年在索非亚

大学攻读农学，因组织罢课被开除，后去布拉格边学习，边当建筑工人。回国后主编《观察》和《烈焰》杂志。他的作品多次被查禁，并因此而坐牢。人民政权建立后，曾任索非亚人民剧院院长、《九月》文学杂志主编，作家协会主席，科学院院士，1950 年和 1959 年两度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卡拉斯拉沃夫读书勤奋，很早就显示出文学天才，12 岁时就开始写诗，16 岁开始发表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是短篇小说集《街头沦落人》（1928），描写了城市穷孩子的苦难。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牧笛呜咽》,写的是 1923 年的九月起义。卡拉斯拉沃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斯波尔日洛夫》发表于 1931 年，再现了布拉格建筑工人的生活。这部小说奠定了他的个人风格。

30 年代以后，卡拉斯拉沃夫作品的主题更加丰富了，艺术性和思想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1933 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农村通讯员》一问世就遭反动当局查禁，卡拉斯拉沃夫也因此遭到逮捕。长篇小说《曼陀罗》（1938)和《儿媳妇》（1942)是两部描写农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前者描写小私有者玛丽奥拉拼命积累财富，最后尽受财富之害；后者以财主尤尔塔兰和儿媳塞芙达之间的冲突为线索，揭露财主的贪婪和残忍。这两部小说属于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加利亚农村生活的最成功的作品。

人民政权建立以后，卡拉斯拉沃夫全力投入保加利亚文学建设和在保加利亚当代文学中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斗争。他开始构思并着手创作 6 卷巨著《平凡的人》（1952—1975)，这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全面再现了保加利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整整 30 年的生活和斗争。小说塑造了几乎所有阶层的代表人物，作者特别注意妇女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对生活具有新观点的农村妇女斯坦卡的成长过程。在创作这部巨著的同时，卡拉斯拉沃夫还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剧本《石入泥潭》、《加贝罗夫一家》、《列宁来到我们家》、《祸从口出》、《所有人的母亲》等。他还写了中篇小说《探戈》、《不信者多马》、《解放》,少年儿

童文学作品、随笔、回忆录等。其中《探戈》一书得到的评价最高。这部结构独特的中篇小说，从狱中、农村和法西斯上层社会三个角度,通过以约尔丹、保利斯和伊万 3 位反法西斯斗士为一方和以总检查长约尔戈夫为另一方之间的故事，深刻揭露了法西斯分子对革命者的迫害和仇视。卡拉斯拉沃夫的许多小说都改编成了剧本并搬上了银幕。

卡拉斯拉沃夫是保加利亚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从文艺创作的继承和创新的角度观察，他的作品堪称保加利亚小说创作的典范，是保加利亚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桥梁。

卡拉斯拉沃夫曾于 1952 年访问过中国。他的《儿媳妇》、《探戈》、《众人之母》和一些短篇小说都有中译文。

迪米特尔·迪莫夫(1909—1868)生于洛维奇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位军官，死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继父也是军官，后成为烟草鉴定专家。母亲热爱文学。迪莫夫先在索非亚大学学法律，后改学兽医并毕业。在外省任兽医直到 1939 年。自 1939 年到 1946 年先后在兽医系和普罗夫迪夫农学系任助教和副教授。1942 年曾去西班牙进修神经系组织学。 1953 年起任教授，著述甚多。1964 年任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主席，1952 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迪莫夫从3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他是保加利亚当代文学最富有吸引力和最受人尊敬的代表之一，是擅长心理描写的城市作家。由于在他的作品中总有外国人出现，他还是一位独特的民族学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本茨中尉》(1938) 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保加利亚后方军队内部的复杂关系，显示了作者表现复杂心理冲突的强烈兴趣。他的第二部小说《有罪的灵魂》(1945)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揭露了西班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道德败坏。

迪莫夫的第三部小说《烟草》，是保加利亚文学的重大成就。

《烟草》描写了十分广阔的保加利亚生活画面。它反映的是从1929年到1944年之间的历史时期。这是世界形势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保加利亚历史中的转变时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保加利亚的生活。国内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保加利亚反法西斯运动蓬勃发展。保加利亚终于在世界人民，特别是苏联人民的支援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保加利亚烟草工业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利用国内反动政权，勾结外国垄断组织，残酷剥削烟草工人，镇压工人罢工。烟草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小说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呼。但当时的文艺批评界对小说创新的内容和手法却不知所措，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迪莫夫曾听取了某些批评，把正面人物的形象写得更全面、深刻些，于1954年出了第二版。但是作者本人从未表示对两版的取舍。直到今天对两版的看法评论界仍有不同意见。

迪莫夫在50年代后期把创作转向剧本，写了《有来历的女人》（1960）、《罪人》（1961）和《在阿尔科伊里斯休养》（1984）。这三部剧本都属于60年代上演率最高的剧本。其中以后者成就最大。它的背景也是西班牙内战，但与《有罪的灵魂》不同，他写的是保加利亚人，一位国际纵队队长的故事。

迪莫夫的《烟草》的中译本早在1959年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1956年出版的俄译本翻译出版了。

迪米特尔·塔列夫（1898—1966）生于马其顿普里莱普市一个铁匠的家庭，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对民间文学的浓厚兴趣。先后在萨格勒布和维也纳学医和哲学。1925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专业。

塔列夫经历了复杂而矛盾的创作道路。在学习期间曾接近进步人士，同情共产主义运动。30年代曾先后任《马其顿报》的校对、

编辑、主编和社长，思想逐渐右倾。人民政权的建立使他的创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曾任作家协会理事。 1959 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塔列夫是保加利亚 50 年代长篇小说繁荣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尽管他在 1925 年就出了第一部作品，但直到 30 年后出版了《铁灯》（*Железният светилник*，1952）、《伊林节》（*Илинден*，1953)和《普雷斯帕的钟声》（*Преспанските камбани*，1954）描写马其顿地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三部曲，才成为公认的作家。这三部小说加上 1966 年出版的《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声》（*Гласовете ви чувам*），成了倍受欢迎的四部曲。这一长篇巨著是由各自独立而又以一个中心主题贯穿起来的四部作品组成。情节始于 1833 年的大鼠疫,终于 1903 年的伊林节起义。作者以雄伟的气势和细腻的笔触，叙述了这段时期马其顿人民反抗土耳其压迫者的英勇斗争。每一部都反映了这场斗争的一个新阶段。

《铁灯》描写的是普雷斯帕城的居民同希腊教会的矛盾冲突。当时的普雷斯帕隶属于君士坦丁堡总主教，这种关系为希腊人控制教会并同化当地居民提供了有利条件。开始觉醒的市民，有了民族意识，为了争取教会独立、保卫民族语言和文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最终取得了胜利。《普雷斯帕的钟声》描写了居民和邻近农民与土耳其压迫者之间的直接冲突。《伊林节》写的是 1903 年 8 月 2 日伊林节起义。起义虽然失败，却标志着马其顿人民争取解放运动的高潮。《我听见了你们的呼声》则描写了马其顿人民在伊林节起义失败后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继续坚持争取解放和反对外国代理人种种阴谋的斗争。大部分评论家认为，《铁灯》在四部曲甚至在塔列夫的全部创作中成就是最高的。《铁灯》和《普雷斯帕的钟声》曾改编为剧本并多次上演，《铁灯》还拍成了电影。

塔列夫除了著名的四部曲外，还写了 3 卷本长篇小说《紧张的年代》（1928—1930）、短篇小说集《老屋》（1938）、3 卷本长篇小说《萨穆伊尔皇帝》（1958—1960）、长篇小说《希伦达尔的修道士》

(1962)等。1972—1978年出版了他的8卷文集。

塔列夫的代表作《铁灯》曾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1957年的俄译本转译出版。

埃米利扬·斯坦涅夫(1907—1979)生于保加利亚古都大特尔诺沃市一个爱国者的家庭。后全家移居埃列纳城。曾在索非亚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后又在自由大学攻读财政信贷,当过小职员。人民政权建立后在故乡管理过地方狩猎活动。1950—1955年任《文学阵线报》小说编辑室主任,1974年当选院士。1964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斯坦涅夫早在30年代就蜚声文坛,是保加利亚著名的小说家。短篇小说集《诱人的光辉》(1938)、《梦想家》(1939)、《夜狼嗥》(1943)等大都反映外省小市民的苦闷和不幸遭遇,还有一些是描写动物和大自然的作品。人民政权建立后出版的中篇小说《傍晚静悄悄》(*В тиха вечер*, 1948)和《偷桃子的人》(*Крадецът на праскови*, 1948)则标志着斯坦涅夫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成熟。前者描写一位反法西斯战士在被捕后一昼夜的心理活动和逃跑过程;后者写一个与世隔绝的军官夫人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故事。《偷桃子的人》被认为是保加利亚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之一,是斯坦涅夫在国内外最著名的作品。

大约从1950年开始,斯坦涅夫用了14年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伊万·康达雷夫》(*Иван Кондарев*, 1958—1964)。这是一部描写1923年9月反法西斯起义的准备、爆发和失败的史诗般作品。作者通过这部巨著说明,真正的人民领袖不仅在历史考验中要分担人民的命运,而且还必须给后人留下崇高的理想。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对艺术地反映九月起义作出的巨大贡献。

斯坦涅夫还写了几部历史小说,如长篇小说《普雷斯拉夫大公西宾的传说》(1984)、中篇小说《反基督者》(1970)等,探讨了保加利亚历史的哲学问题。

斯坦涅夫一生酷爱狩猎，对动物世界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因而是一位少有的动物文学作家。他还创作了许多儿童文学作品。

斯坦涅夫的作品都已收集在 1981—1983 年出版的《斯坦涅夫全集》(共 7 卷)中了,其中《傍晚静悄悄》、《偷桃子的人》和《特尔诺沃王后》等作品还搬上了银幕。

斯坦涅夫的短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小狗熊闯祸》等早在 1956 年就从俄文转译成中文出版。 1983 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集《傍晚静悄悄》,其中包括《傍晚静悄消》、《偷桃子的人》、《特尔诺沃王后》等名作共 12 篇。

2 50 年代中期以后的保加利亚文学

1944 年 9 月 9 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人民政权之后，人民的国家力图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创造日益良好的条件。保加利亚文学开始在全新的条件下发展，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崇拜使得这一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50 年代中期对个人崇拜的清算，使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开始恢复列宁主义的领导作风和准则，在文艺领域中摒弃了行政命令和压制积极性的做法，为文学艺术带来春的气息。

广大作家深深感到对社会负有重大的责任。他们逐渐克服了胜利初期不同程度的简单化、公式化的缺点，开始对主人公和重大事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反映了新社会复杂而尖锐的思想矛盾和阶级矛盾，抨击与新社会的主旋律不谐调的官僚主义、市侩作风，以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和社会主义人道精神教育人民群众，同时在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条件下探索运用新的风格和手法。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也克服了过去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教条

主义，在反对平庸和“灰色”作品，反对形形色色偏离社会主义思想的表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保加利亚作家协会的活动也在新时期有了崭新的变化。它的民主生活得到了加强，代表大会的召开也开始定期化，而且每次大会都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作家中存在的问题，确定不同的重点。1968年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新时期以来的成就和缺点。第二次（1971）和第三次（1976）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熟悉和艺术再现新的社会主义现实的情况。表现新的主人公——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的问题，成了第四次代表大会（1980）的注意中心。作为历史的乐观主义文学的新的社会主义文学则是五大（1984）讨论的重点。1989年3月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保加利亚进行全面改革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大会的主要内容就是“改革与文学”以及作家协会本身的改革。

获得解放的人民的巨大革命潜力，在文学中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几代诗人不论长幼，都由衷接受新时期的路线。他们思想活跃，文思汹涌，不断发表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早已蜚声诗坛的女诗人多拉·加贝和埃莉萨维塔·巴格梁娜的诗集《从此岸到彼岸》（1963）和《对位法》（1972），焕发了青春，反映了她们对当代的激情。另一位著名诗人尼科拉·富尔纳吉耶夫也以新的主题和形象写出了许多抒发内心情感的诗歌，发表了一连串诗集：《我曾沿着你的道路前进》（1958）、《太阳照耀群山》（1961）、《最难的事》（1964）。

一向谨严入骨、惜墨如金的诗人阿塔纳斯·达尔切夫，也在这春风化雨的新时代写出了几组充满新意的抒情佳作。他的《小站邂逅》和《致祖国》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有人认为达尔切夫的作品是保加利亚诗歌的骄傲，读保加利亚诗歌不可不读达尔切夫。

阿塔纳斯·达尔切夫（1904—1978）生于希腊的萨洛尼卡。父亲曾当过律师，中学教师和议员。四岁时随父移居伊斯坦布尔。

1914 年迁到索非亚。 1927 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哲学专业。旋即去意大利和法国游历。 1929 年回国后至人民政权成立前，曾任中学教师、译员和中学校长，其间 1936—1937 年又去法国。人民政权成立后曾任新闻和艺术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小火焰》杂志编辑和副主编。1967 年获功勋文化活动家称号，1974 年获人民艺术文化活动家称号。

达尔切夫早期作品受到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但后来逐渐脱离它而趋向具体的形象，不再追求外表的华丽和不必要的文字雕琢，较注重对道德哲学的深入思考。在动荡复杂的两次大战期间的保加利亚社会里，达尔切夫一直处在内心的矛盾和斗争之中。良知使他憎恨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残暴，但意志薄弱又使他感到孤独和无力。达尔切夫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找到本来可以使他同革命文学联系起来的道路，但他的作品逐渐接近严肃的社会问题。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对善良和人的创造力量的信念占了主流。他的爱国主义感情也得到了强烈的反映。 1933 年,达尔切夫在《对战后保加利亚抒情诗的思考》一文中曾指出：“战后抒情诗发展的新趋势，从形式上看是对过去诗体的破坏，从内容上看是对现实和社会的回归。很明显，我们已经熄灭而且成果甚微的诗歌，必须重新回到生活现实中去，并从中汲取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乳汁。”实际上这也是达尔切夫对自己创作道路的总结。

达尔切夫一生留下了约一百首诗歌，合起来也不过一卷。人们问他为什么他的诗作这么少，他常常无言以对，但偶尔也试着作出解释：“与许多表达情绪的诗作不同，我的每一首诗几乎都是以一次冲突为基础的，都是一出微型戏剧。大家都知道，人每天都有情绪，但不总有冲突。”从这个解释里，人们既可看出达尔切夫对创作抱着十分严肃的态度，又可看出他作为一个正直的诗人的内心世界。

达尔切夫的作品质朴无华，真实动人，富于形象的具体性，是对象征派的一种反作用。他的诗歌以其突出的理智精神和对生活

哲理的执著追求，对后来的保加利亚诗人，特别是 40 年代的诗人影响极深。正因为质朴真实，所以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达尔切夫还翻译了许多法国和俄国的名著。

达尔切夫的主要作品有：《窗》（1928）、《诗集》（1928）、《巴黎》（1930）、《夏特大教堂的天使》（1943）、《诗集》（1965）、《片段》（1967）、《阳台》（1972）、《诗歌和片段》（1974）、《诗·片段·思考·感想》（1978）、《达尔切夫文集》（两卷，1984—1985）等。他的作品已有法、俄、英、捷克、斯洛伐克、匈、德等文的译本。

我们从下面的一首诗中足以看出达尔切夫的诗风。

后 院

——致博里斯·阿夫拉莫夫

我不喜欢楼房端庄的正面：
它们是那样虚伪、威严。
那后院的奇异景象，
才令我兴味盎然！

这里用铁栏杆围起的阳台
层层叠叠直到房顶，
墙上挂着的排排木筐
多么像一个个鸟笼。

每天从黎明直到夜晚
那里不断传出喊声，
还有听不完的欢歌笑语，
夹杂着儿童呼叫、鸡啼和鸟鸣。

妇女们个个面孔红润

挽着袖口，敞着衣领；
出出进进直到天黑，
摸东摸西忙个不停：

忽而深深弯下腰来，
双手用力拧干衣裙，
接着如从天空降下大雨，
小小院落满是泥泞；

忽而在部居眼前，晾晒内衣，
丝毫也不觉得难为情，
这些衣服有如风帆，
整个阳台像航船准备登程。

在这些琐琐碎碎的家务事里，
还有节日的礼炮轰鸣，
礼炮就是那拍打地毯的木棒，
礼花就是那射出的灰尘。

也许是因为藏在背后，
这里的生活完全开放透明，
它是那样绵延千古，
又是那样在无谓中幸福无穷。

1965 年

老一代诗人如赫·拉德夫斯基、姆·伊萨耶夫、留·斯托扬诺夫等的新作，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并饶有公民意识和总结人生道路的内容。

拉马尔、迪·潘特列耶夫等诗人的作品中有许多描写社会主义

祖国的新貌和劳动人民的沸腾生活的诗歌，这些作品一直是各种集会上受人欢迎的朗诵节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而艰苦的战争生活，对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和一大批新诗人的成长有极大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被投入监狱或集中营，有的则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献出了生命。还有一部分出身城市，因受反动法西斯统治的迫害，憧憬自由，内心世界比较复杂，常有各种怀疑和矛盾，这一切决定了他们的创作主题，并把革命胜利看作是自已的真正诞生。他们的代表者有维塞林·安得列耶夫、博戈米尔·赖诺夫、阿列克桑德尔·乌提姆斯基（Александър Вутимски，1919—1943）、博日达尔·博日洛夫、瓦列里·彼得罗夫（Валери Петров，1920— ）、伊万·佩伊切夫（Иван Пейчев，1916—1976）、维塞林·汉切夫、阿列克桑德尔·格罗夫（Александър Геров，1919— ）、拉多伊·拉林、布拉加·迪米特罗娃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当代诗人中的“第二代诗人”或称“40 年代诗人”。

这些诗人的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激情。他们有保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摒弃残忍和暴力的强烈愿望，相信善良终会胜利。在他们的怀疑和矛盾中蕴育着怨言、决心和战斗的要求。因此，在革命胜利后，他们自然就开始歌颂革命、革命英雄和和平劳动。

一批经过地下斗争和游击队运动洗礼，并经历了革命胜利初期困难年代的诗人如佩尼奥·佩内夫、格奥尔基·贾加罗夫、帕维尔·马特夫、迪米特尔·麦托迪耶夫、多勃里·若特夫、达维德·奥瓦迪亚、尼科拉伊·齐达罗夫（Николай Зидаров，1921— ）等，在 50 年代登上了诗坛。他们的作品富于朝气和历史乐观主义精神，对游击队生活、狱中生活、卫国战争、社会主义劳动、新人的成长等主题都有充分的反映。而在 80 年代出现的诗歌繁荣时期，带有总结性的、道德和哲学性的、讨论人在历史中的地位问题的诗歌多了起来。共产主义理想在论战中、在批判中得到更深刻、更坚定的捍

卫。在他们的作品里，公民意识加强了，自我剖析的内容增多了，在语言形式、创作手法上也有许多创新，如自由体诗大量出现，与科学和技术进步有关的形象多了起来。

50年代中期以后，在明朗的政治气氛中涌现了一批新的诗人，他们以崭新的面貌登上诗坛。这一代的杰出代表是留博米尔·列夫切夫(Любомир Левчев, 1935—)。他们继承了革命先辈的理想，富于大胆创新的精神和浪漫的激情，追求道德情操上的纯洁和坚定。

1957年,弗拉迪米尔·巴舍夫(Владимир Башев, 1935—1967)和留·列夫切夫分别发表了诗集《令人不安的天线》(*Тревожни Антени*)和《群星属于我》(*Звездите са мои*)。接着，佩特尔·卡拉安戈夫(Петър Караангов, 1931—)、帕尔万·斯特凡诺夫(Първан Стефанов, 1931—)、马尔科·甘切夫(Марко Ганчев, 1932—)、迪米特尔·斯特凡诺夫(Димитър Стефанов, 1932—)、伊万·特伦内夫(Иван Тренев, 1931—)也发表了自己的诗集。随后几年，又出现了达米扬·达米扬诺夫(Дамян Дамянов, 1935—)、米哈伊尔·贝尔贝罗夫(Михаил Берберов, 1934—1989)、格奥尔基·斯特鲁姆斯基(Георги Струмски, 1932—)、尼科拉伊·赫里斯托佐夫(Николай Христозов, 1931—)、安德列·格尔曼诺夫(Андрей Германов, 1932—1981)、斯拉夫·卡拉斯拉沃夫(Слав Караславов, 1932—)、埃夫蒂姆·埃夫蒂莫夫(Евтим Евтимов, 1933—)、尼科拉·英卓夫(Никола Инджов, 1935—)、尼诺·尼科洛夫(Нино Николов, 1933—)、斯特凡·查内夫(Стефан Цанев, 1936—)、阿列克山德尔·米兰诺夫(Александър Миланов, 1933—)、康斯坦丁·巴夫洛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 1933—)、克勒斯丘·斯塔尼舍夫(Кръстьо Станишев, 1933—)、纳迪亚·科赫莉巴雷娃(Надя Кехлибарева, 1933—1988)、佩特尔·阿利皮耶夫(Петър Алипиев, 1930—)、赫里斯托·福特夫(Христо Фотев, 1934—)、阿纳斯

塔斯·斯托扬诺夫（Анастас Стоянов，1931— ）、约尔丹·米列夫（Йордан Милев，1938— ）、马尔科·内迪亚尔科夫（Малко Недялков，1931— ）、马特伊·绍普金（Матей Шопкин 1938— ）等诗人。这些人都出生在30年代，他们决定了保加利亚当代诗歌的面貌。

如果我们不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
我们的诞生还有什么意义？

诗人巴舍夫的这两句诗，充分代表了这一代诗人的豪迈胸怀。他在《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元月书信》一诗中，又充分表达了这一代人克服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痛苦过程。

我学着思考。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学着自己思考。
也许我想得很愚蠢，
也许我想得很幼稚。
我要
自己知道、发现和体验
我所开始的
一切。
这艰辛而甜蜜的事业。

这一代诗人的作品是五彩纷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诗风。从主题思想上看，也是多种多样的。由于他们中许多人来自中小城镇和穷乡僻壤，后来才到首都上大学，因此评论家常把他们分成城市派和农村派。后者的作品有时还流露出对正在消失的宗法制农村的怀念情绪。有的则把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描绘了一

幅正在迅速改变着的城乡关系的图景。

这一代作家喜爱的主题还有爱国主义和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像卡拉安戈夫的诗《血是完整的》、埃夫蒂莫夫的诗集《皮林山的颂诗》（*Пирински балади*，1964）都是十分动人的作品。

这一代诗人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功绩，那就是大力提倡自由体诗，摆脱了旧体诗的束缚。

50 年代中期以后，小说也同样是面貌一新。它当然不能像诗歌那样迅速变化，但在一些短小的作品中表现得比较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短小作品的积累，长篇巨著在 60 年代开始问世。

新时期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同教条主义决裂。作家不再去编造问题和矛盾，而是潜心走到群众中去，追求探索生活的真实。在内容方面努力克服在一个时期流行的公式化，注重心理描写和哲学的深度。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和冲突不再作表面和单维的描写，而是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发展，小中见大，大中见小。社会道德问题是新时期小说的主要主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社会加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人的头脑已经成了新与旧斗争的主战场。用共产主义的道德伦理进行教育，成了新时期小说的天职。

以上的一切就自然决定了现代主题，新社会的创造者也自然就成了当代小说的主要主人公。当然，创造时代主人公美好而丰满的形象，是当代小说的一项艰巨任务，它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走向完善，而且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创作过程。

反对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曾是一些小说家探讨的问题。这是对 50 年代初期的反思。这方面值得提出来的小说有博戈米尔·赖诺夫的《茫茫无路》（*Пътища за никъде*，1966）、安德列·古利亚什基的《我们生活中的七天》（*Седемте дни на нашия живот*，1964）卡门·卡尔切夫的《织工之家》（*Семейството на тъкачите*，两卷，1956—1960）和《新城的两个人》[①]（*Двама в новия град*，

①有中译本，中译名为《新城奇缘》，新华出版社，1985 年，北京。

1964)、阿塔纳斯·纳科夫斯基(Атанас Наковски, 1925—)的《马丽亚反对皮拉尔科夫》(*Мария против Пиралков*, 1962)、埃米尔·科拉洛夫的《悬铃木哗哗响》(*Чинарите зашумяха*, 1965)等等。

50年代中期以后在小说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作家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帕维尔·维任诺夫、斯托扬·达斯卡洛夫、伊万·马丁诺夫、伊利亚·沃伦、约尔丹·拉迪奇科夫、尼科拉伊·海托夫(Николай Хайтов, 1919—)、伊瓦伊洛·彼得罗夫、德拉戈米尔·阿森诺夫、托多尔·莫诺夫(Тодор Монов, 1928—)等。

大约在6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描写保加利亚人民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及其同迅猛发展的社会生活相冲突的作品，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些作品主要有约·拉迪奇科夫的《激烈的情绪》(*Свирепо настроение*, 1965)、格奥尔基·米舍夫(Георги Мишев, 1935—)的《母权制》(*Матриархат*, 1967)、尼·海托夫的《荒野中的故事》(*Диви Разкази*, 1967)、瓦西尔·波波夫(Васил Попов 1930—1980)的《根》(*Корените*, 1967)和《永恒的时代》(*Вечни времена*, 1973)等。其实，民族心理这一主题在保加利亚文学中从留·卡拉维洛夫到格·卡拉斯拉沃夫和迪·迪莫夫一直没有被忽视过，只不过在此前一二十年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前后重大事件层出不穷而没有成为注意的中心罢了。到了60年代初，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与之有关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而在生活中产生的重大变化。早在保加利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就开始瓦解的古老的宗法制农村及其道德准则、生活习惯等等，这时除了在人们的记忆中外，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们的残余却仍同新的生活同时存在，这些残余现象看来有时显得荒谬可笑，有时又显得可贵和不可缺少于是在文学中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将过去的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条件下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

约·拉迪奇科夫的短篇小说集《激烈的情绪》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这部作品是作者取材于民间传说和民间生活习惯并

加上自己的丰富想像而写成的。它以其不同凡响的内容和笔法而令读者惊叹。其中大部分小说都是把新与旧混合在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中，混合在主人公的头脑里。在有些作品中，甚至是通过动物的眼睛反映这“奇怪”的世界。永恒的主题常常是在古老的传说和多神教的故事中得到体现。

格·米舍夫的中篇小说《母权制》通过不为人们注意的平凡小事，描绘出由于人口流动只剩下老年妇女的农村景象，从而揭示了它对民族心理产生的影响，标题本身就有戏谑的意味。瓦·波波夫的短篇小说集《根》和它的续篇《永恒的时代》的主人公，也是留在农村的最后一批居民。这是一组互相联系的短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结构松散的长篇小说。小说中每个主人公都有留在农村的理由，同时在他们身上又分别体现了保加利亚民族心理中的某些特点，从而深刻而艺术地探讨了过去留下的值得珍视的传统。

伊·佩特罗夫的中篇小说《生我以前和以后》[①]（*Преди да се родя и след това*，1968）是争论最热烈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第一部分《生我以前》是主人公叙述他的双亲从订婚到他的诞生这一时期的故事；第二部分《生我以后》是主人公出生后最初几天的故事。主人公展示了宗法制生活习俗的最丑陋的东西，揭露了它那抹杀人的个性的实质，描绘了“善良的古老农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贫困。但是这部小说并不像乍看时那样只是对过去的揶揄。从叙述的富有抒情意味和温馨的口吻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过去的深情。作者想告诉人们，书中的人物尽管过着那种不受今人羡慕的生活，但他还是将后代养大成人。作者深深尊敬主人公同苦难搏斗的意志，从而歌颂了保加利亚人热爱自由和英勇不屈的精神。

尼科拉伊·海托夫（1919—　）生于普罗夫迪夫地区亚弗罗沃

①有中文节译本，载《外国文学》，1984年第8期。

村。少年时代当过家仆、饭店侍者、工人。从索非亚大学林学系毕业后在保加利亚南部罗多皮山区和里拉山区当林业工程师，这段经历对他的创作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后任编辑、索非亚文化委员会主席、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书记、主席。他继承了保加利亚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被誉为“森林诗人”。作品的主人公多是勤劳纯朴的普通农民。他是文学的多面手，除了短篇小说外，他还写剧本、电视剧本、游记、政论、随笔、地方志、儿童文学作品等。他对历史的兴趣反映在他写的地方志专著和关于保加利亚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的随笔《罗多皮的统治者》（1965）、《罗多皮起义者的故事》（1972）、《起义首领佩特科》（1974）。对当前问题的关注反映在一些政论著作如《刺人的玫瑰》（关于自然保护问题，1975）、《魔镜》（关于当前规范语的状态，1981）等。游记有《摘掉面纱的罗多皮山》（1960）、《千金榆叶》（1965)等。短篇小说集有《山林的故事》（1965）、《荒野中的故事》[①]（1967）等。剧本有《在大地上》（1963）、《海杜特》（1968)等。1979 年和 1989 年分别出版了两卷本和三卷本的《海托夫选集》。根据他的作品拍成电影的有《花花世界》（1971）、《山羊角》（1972）、《无根之树》（1974）、《樱桃园》（1977）等。1969 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荒野中的故事》是海托夫最成功的作品。书中 17 篇小说全是用第一人称写成的，是一些发生在罗多皮山区互相独立又互有联系的故事，尽管它们发生的年代可能相距数百年。其中，《无根之树》讲的是一位一直居住在农村的老人“回到”住在城市的子女身边，但是他不习惯城市的生活方式。他不仅受不了那预制板住宅的封闭空间，更受不了那人际交往中的冷漠：即使在最亲近的关系之间也只是在上班前后说一两句问候的话。他对同龄的退休者之间在街心花园里也只能谈各自的疾病，感到不可理解。如果这

① 书中的个别小说有中译文，见《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新华出版社，1984 年，北京。

只是不值得介意的“小事”，那么当他看到他的亲人成为物品的奴隶，而不是使用它们时，更使他感到痛心。在孙辈面前偶尔说出一个方言词，也会引起一场争吵：子女们认为这会败坏孙辈的语言，让他们在学校受人讥笑。这种代沟变成价值观的相左。老人最后“逃回”了农村。但是在农村他看到也有人把春天的林中草地只看成是野餐的理想场所。

《荒野中的故事》里的《小路》、《火车鸣笛》等篇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其他小说中有的写维护男子汉的尊严；有的写宗法制的道德标准妨碍人去伸张正义；有的写守林人不顾奸商背后的权势，凭“良心”护林而丢了饭碗，沦为乞丐，最后使得他不得不承认他的“良心”是一种病，是“先天缺陷”；有的写一个做土皮鞋的鞋匠竞争不过新式胶鞋而破产，最后开了一家烤肉饼店才得以谋生。

乍一看来，这些小说好像是把新与旧、现代与过去、城市与农村对立起来，其实，经过仔细玩味，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到，作者的用心是取两者之长，舍两者之短，以达到圆满和谐的境地。这本小说集对保加利亚小说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约尔丹·拉迪奇科夫（1929— ）生于保加利亚西北部的卡利马尼查村。中学毕业后曾因患肺结核疗养数年。先后在《人民青年报》、《新闻晚报》、保加利亚电影制片厂和《文学阵线报》任编辑，曾任保加利亚国务院社会精神财富发展委员会顾问、保加利亚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作品原以抒情和浪漫色彩著称，后逐渐为讽刺怪诞的风格所代替。著有短篇小说集《心为人们跳动》（1959）、《激烈的情绪》（1965）、《我们这些麻雀》（1968）、《带火药味的读本》（1969），中篇小说集《山羊胡子》（1967）、《所有的人和谁也不是》（1967）、《忆马》（1975）；长篇小说《诺亚方舟》（1988），剧本《慌乱一团》（1967）、《飞的尝试》（1979），《拉迪奇科夫选集》（共3卷，1989）等。1971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到目前为止，拉迪奇科夫最重要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带火药

味的读本》和《所有的人和谁也不是》。前者由互相联系的 10 篇小说组成。故事发生在保加利亚反法西斯斗争时期。 3 个主人公从不同角度用 3个故事分别在 3个短篇里讲同一个斗争。最后一篇《岩石》像是结束语。第一个主人公拉扎尔是个不懂政治的贫苦农民。他把自己的斗篷给了一个游击队员。从此担惊受怕，怕万一游击队员被俘或者打死，村里每个人都会认出他的斗篷。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拉扎尔从带火药味的读本里逐渐了解了革命。第二个主人公弗洛罗是个帮助游击队的老百姓，赶着大车到各集市上去卖陶罐，暗中为游击队输送武器。后来不幸中了敌人的埋伏，遭到枪杀。第三个主人公安格尔·科洛夫是个烤面包的小贩，不言不语，性子温和，像块面团。他也是一位游击队的帮助者，经常给游击队员送面粉。后来被叛徒出卖，和妻子一起在烤炉里被活活烧死。这样，10篇小说就像一部松散的长篇小说，勾画出一幅人民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广阔壮观的图画。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叛徒列科·阿列科索夫，他是一个石匠。人民政权建立后，人民为了纪念安格尔·科洛夫夫妇，让阿列科索夫为他们做雕像。石匠挑选了好几块石头，每次雕到烈士的脸部时，石头就变成粉末。最后，石匠去采石场取石头时，许多块岩石一起滚了下来，把石匠砸成齑粉。似乎大自然也不能容忍这种亵渎：由叛徒去雕刻被他陷害的人的纪念碑。这样，作者就赋予小说以传奇和浪漫色彩，与人民的心理充分吻合。面包匠在火中对周围的老乡说了一段朴素而震撼人心的话：“请告诉我们在山里的人，我不能再给他们送面粉了。我和妻子用了所有的面粉和了一个面包，现在把它烤好了……每一个面包都是神圣的，而现在烤的这个面包是最神圣的！”小说顿时成了史诗。

3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保加利亚文学

50 年代中期以后，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了迅猛

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71 年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 10 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在经济、社会结构和提高人民福利方面，在精神生活方面，在社会管理、国家建设和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在国际关系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以便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推进到更高的阶段。

这一崭新的阶段也向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加利亚文学要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更好地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的目标是出色地表现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生活，揭示赢得革命胜利、热爱祖国和未来的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建设激情。因此，提高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就成了主要问题。在这方面，反对“灰色潮流”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所谓灰色潮流就是那些败坏读者胃口的低劣平庸作品。作家和评论家在报刊上对这种作品出现的原因，展开了分析和讨论，并且强调指出，要坚持创作和评论中的明确而坚定的阶级性和党性标准。

文学在这一阶段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写好现代主题和创造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和改革者的现代人形象。历次的作家代表大会和报刊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作家们对现代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对时代和个人的心理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因而使文学作品在道德和哲学方面的深度加强了。与此同时，还在表达方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各种体裁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出现了许多正确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主义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现代人的崇高道德的优秀作品 帕·维任诺夫的长篇小说《夜驰白马》[①](*Нощем с белите коне*, 1975)和中篇小说《障碍》[②](*Бариерата*, 1976)、安·古利亚什基的长篇小说《红木楼梯房子》 (*Домът с махагоново*

① 有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北京。

② 有两种中译本 载《译林》 ,1981 年第 1 期 载《世界文学》 ,1981 年第 3期。

стълбище, 1975)、博·赖诺夫的自传体随笔《这一奇怪的行业》(*Този странен занаят*, 1976)、瓦·波波夫的长篇小说《低地》(*Низината*, 1977)、迪科·富切吉耶夫(Дико Фучеджиев, 1928—)的长篇小说《河》(*Реката*, 1974)、约·拉迪奇科夫的中篇小说《所有的人和谁也不是》(*Всички и никой*, 1975)、留·列夫切夫的诗集《可以烧掉的日记》(*Дневник за изгаряне*, 1973),帕·马特夫的诗集《长久的沉默》(*Натрупани Мълчания*, 1973)、迪米特尔·潘特列耶夫的诗集《温暖的大地》(*Топла земя*, 1973)、帕·斯特凡诺夫的诗集《圆顶钢筋》(*Арматура за барабани*, 1973)、阿纳斯塔斯·斯托扬诺夫的诗集《古老的爱情》(*Пралюбов*, 1973)、多·若特夫的短篇小说集《经历过的故事》、德·阿森诺夫的长篇小说《血不会再流》(*Тази кръв няма да се пролее*, 1973)、阿·纳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朝夕世界》(*Светът вечер, светът сутрин*, 1973)、根丘·斯托耶夫((Генчо Стоев, 1925—)的长篇小说《环路》(*Циклопът*, 1973)等等。

这一时期,保加利亚作家从坚持和发扬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立场出发,同现实生活中的市侩作风和名利思想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许多作品特别是剧本,如格·贾加罗夫的《这一小块土地》(*Тази малка земя*, 1974)、德·阿森诺夫的《黄金储备》[1](*Златното покритие*, 1974)和《一天之末》(*В края на деня*, 1975)、斯塔尼斯拉夫·斯特拉蒂耶夫(Станислав Стратиев, 1941—)的喜剧《绒料上衣》(*Сако от велур*, 1979)、《罗马澡堂》(*Римска баня*, 1977)等,在引导社会健康发展、确立新人的崇高思想道德风尚、展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彩和鞭笞消极现象等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70、80年代的保加利亚诗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各代诗人不同的声音汇成了宏亮的大合唱,歌颂自由、未来和共产主义崇高

①有中译文,《可靠的后盾》,载《外国戏剧》,1983年。

精神。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开始受到诗人的重视。这一时期在诗坛上比较活跃的有下面几位诗人。

勃拉加·迪米特罗娃是一位在诗歌和小说方面都很有造诣的作家。她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取得副博士学位后就已经成为一位富有公民精神的诗人，写有关于义务劳动运动、保加利亚卫国战争、季米特洛夫的诗篇，后来又以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歌颂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她的诗歌以现代题材为主，突出了理智精神。她克服了“女性诗”的局限，在作品中反映了当代世界的激烈冲突和人类生活中的复杂问题。《关于领袖的诗》(1950)、《罗多皮之歌》(1954)、《露天地》(1956)等诗歌和长诗《莉梁娜》(1959)等作品都充满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激情。迪米特罗娃也写爱情诗，像《明天见》(1959)就是一部洋溢着真诚和鼓舞力量的抒情诗集。后来的作品如《名字》(1971)、《怎么办》(1974)、《迷宫》(1987)等都是一些有关社会问题并富有哲理的诗作。她的长篇小说《走向自己》(*Пътуване към себе си*，1965)、《偏离正题》(*Отклонение*，1967)、《最后的审判》(*Страшният съд*，1968)、《雪崩》(*Лавина*，1971)等也是关于现代社会问题的。

多勃里·若特夫的第一本诗集《渴望》(*Жажда*)出版于1951年。在此之前，诗人经历了与人民的敌人顽强斗争的艰苦道路。上中学时因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被判15年徒刑。越狱成功后参加了游击队。人民政权建立之后曾在青年团中央、《人民青年报》编辑部、人民青年出版社、《黄蜂报》工作，在工作和创作的同时，热心指导青年人在政治和业务上成长，帮助青年诗人提高写作水平。若特夫的前期作品大多反映敌人的野蛮迫害和艰苦的游击队生活；后来的作品讴歌了当代共产党人的胸襟，抨击了社会的消极现象。他的诗集《强劲的风》(*Буйният вятър*，1958)中的《未成年的人》描写了被敌人枪杀的工人青年联盟成员佩特尔·基里亚科夫的光辉形象，催人泪下。其他重要作品有：《在魔鬼家作客》(1962)、《我的爱》(1964)、《呐喊》(1968)、《从魔鬼到计算机》(1968)、《相爱

的太阳》（1973）、《鹰的盘旋》（1977）、《重返走过的地方》（1981）等。记述作者作为游击队员的感受的短篇小说集《经历过的故事》，也是一部动人的作品。

弗拉迪米尔·戈列夫（Владимир Голев，1922— ）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写诗，但是他的最优秀的作品都出现在60和70年代。他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法律系。曾在索非亚电台、莫斯科电台、电影制片厂、保共中央艺术文化部工作，1975年起长期担任文学月刊《九月》的主编。戈列夫是一位植根于祖国大地、同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的诗人。他的诗富有公民意识，充满对祖国历史和大自然的热爱。5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更富于深沉的哲理，题材也更加广阔丰富。1969年出版的诗集《宇宙》（*Мироздание*）使他获得了季米特洛夫奖金。其他主要诗作有《皮林山上的旗帜》（1952）、《祖国的海洋》（1952）、《迎风歌唱》（1958）、《青松在唱什么》（1961）、《如果我们偶然老了》（1970）、《责任》（1971）、《过晚的承认》（1974）、《盗窃时间的人》（1981）等。戈列夫还写剧本和儿童文学作品。近年来写的小说也很出色，其中包括自传体的中篇小说《老房子的回忆》（*Спомени за старата къща*，1979）、《一个夏天的回忆》（*Спомени за едно лято*，1983）、《一切从头开始》（*Всичко отначало*，1984）。

伊万·达维德科夫（Иван Давидков，1926— ）是这一时期显露才华的另一位诗人。他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专业。曾在索非亚电台、电影制片厂、《小火焰》杂志社工作，后长期担任保加利亚作家出版社的总编。他的诗歌清新隽永，文字自然流畅，充满真诚和细腻的抒情性。他惯于在人们的日常劳动中发现诗情画意，在美不胜收的风景中寄托深厚的激情。主要作品有《拉白色手风琴的乌克兰人》（1951）、《树挂的光芒》（1957）、《德聂伯河从我窗下流过》（1960）、《色雷斯山丘》（1968）、《采石场》（1972）、《飞鸟的眼睛》（1983）等。达维德科夫还为少年儿童写了许多诗歌，翻译了许多乌克兰诗人的作品。近年来，他还写了一些

现代题材的小说：中篇小说《远方的浅滩》（1967），长篇小说《同雨夜谈》（*Вечерен разговор с дъжда*，1973）、《雄狮的冬梦》（*Зимните сънища на лъвовете*，1982）等。

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为题材的诗人还有许多，如达·奥瓦迪亚、伊万·拉多耶夫、阿塔纳斯·斯托扬诺夫（Атанас Стоянов，1931— ）、勒切扎尔·埃伦科夫（Лъчезар Еленков，1936— ）、马特伊·绍普金（Матей Шопкин，1936— ）、格奥尔基·斯特鲁姆斯基（Георги Струмски，1932— ）、约尔丹·米列夫（Йордан Милев，1938— ）、尼科拉·英卓夫、科利奥·塞沃夫（Кольо Севов，1933— ）、赫里斯托·富特夫（Христо Фотев，1934— ），以及年轻一代诗人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夫（Георги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1943— ）、佩特尔·阿纳斯塔索夫（Петър Анастасов，1942— ）、斯托伊乔·斯托伊切夫（Стойчо Стойчев，1937— ）等。

70年代和80年代的小说，也同诗歌一样，更多地反映了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小说家们都致力于表达在争取确立社会主义社会新成就的斗争中的矛盾和冲突。在写作技巧上也有许多新的突破：第一人称自白体的作品增多了；常常运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使作品的节奏加快；对话的形式也占了重要地位，而冗长的场景描写已不多见。在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向更成熟的方面发展的新主题中作出贡献的小说家有：伊·沃伦、埃·科拉洛夫、埃·马诺夫、德·阿森诺夫、迪·富切吉耶夫、勃·迪米特罗娃、阿·纳科夫斯基、留本·迪洛夫（Любен Дилов，1927— ）等人。

伊利亚·沃伦（1905—1982）毕业于索非亚神学院，后又在索非亚大学攻读斯拉夫语言文学。曾任文学月刊《九月》副主编等职。早在30和4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约夫》（*Йов*），使他成为一位心理描写大师。小说通过一个虔诚神甫的独生子死亡的悲惨故事，分析了神甫复杂的内心世界，他终于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回到劳动人民当中去度过有意义的余生。作

者因此书获季米特洛夫奖金（1966）。伊·沃伦还擅长把大自然风光与人物的性格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他作品有《黑色的休闲地》（1928）、《麦垛》（1931）、《两个世界之间》（1958）、《农村纪事》（1973）、《生命的力量》（1981）等，

埃米尔·科拉洛夫（1906—1986）1933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中学时期即参加革命，成为党的通信员。人民政权建立后曾任人民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作品以生动反映现实生活见长。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家。1965年出版的《悬铃木哗哗响》和1972年出版的《每个人都有出头之日》（*Всеки има свой ден*）等长篇小说着重描写人的精神力量和美。前者写一位教师与一个舞弊的厂长进行斗争的故事，受到评论界的推崇。科拉洛夫的作品很多，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长篇小说《伟大的渴望》（*Великата жажда*，1930）、《不妥协的人们》（*Непримиримите*，1938）、《九月起义参加者》（*Септемврийци*，1945），《培养勇士的学校》（*Училище за смелите*，1951）[①]《马里查河畔》（*Край Марица*，1952）、《决斗》（*Двубоят*，1953）、《新的编年史》（*Нова летопис*，1958），中篇小说《佩罗尼卡》[②]（*Пероника*，1965）等。1952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埃米尔·马诺夫（1919—1982），1941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法律专业。中学时代就是工人青年联盟的一个积极成员，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1年曾因组织党的首都战斗小组而被判无期徒刑。人民政权成立后曾任人民军上校、科学艺术文化委员会副主席、保加利亚作家出版社副总编、《祖国语言》杂志主编、保加利亚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埃米尔·马诺夫属于反法西斯作家一代。党和人民争取社会正义和共产主义的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鞭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

① 有中译本，中译名为《他们成为勇敢的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北京。

② 有中译本，中译名为《爱的波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年，北京。

不良现象和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构成了他作品的主题。他的小说以尖锐的冲突见长。在他的笔下，社会主义建设不是无冲突的田园生活，而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紧张决斗。马诺夫把自己的某些亲身经历融于长篇小说《伽拉忒亚的逃跑》(*Бягството на Галатея*, 1963) 的主人公菲利普的形象中，通过菲利普的沉思和复杂的内心矛盾，表达了作者的爱憎。分别在 1954 年、1959 年和 1965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鲁莽小伙子的末日》、《白昼正在诞生》和《峭壁》(这三部小说又以《飞在蓝鸟之后》(*Подир синята птица*) 为总名于 1970 年出版了三部曲）里，在 1973 年出版的《厂长之子》(*Синът на директора*) 里，这位共产党员作家捍卫了人的良知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崇高道德原则。

马诺夫的其他长篇小说有《我的第一个夏天》(*Моето първо лято*, 1967)、《天河之歌》(*Галактическа балада*, 1971)，《维勃罗比亚之旅》(*Пътуване в Уибробия*, 1975)。后者描写进行环球飞行的两个保加利亚人失事迫降在南半球的“维勃罗比亚国”的故事。那里技术的发展已经毁灭了一切精神财富，人的生存已毫无意义。作品旨在谴责技术主义。此外，他还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剧本。马诺夫对保加利亚儿童文学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德拉戈米尔·阿森诺夫(1926—1981)1953 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法律专业，1974 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他中学时代即参加革命活动。人民政权成立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曾任《祖国的语言》杂志、《文学阵线报》主编，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书记等职。

阿森诺夫的小说以描写城市生活为主，着重于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伦理问题。最成功的作品是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三部曲《褐色的前程》(*Кафявите хоризонти*, 1981)、《大石屋》(*Големият каменен дом*, 1963)、《风的果实》(*Плодът на ветровете*, 1988)。小说描写了法西斯专政彻底消灭前十年的故事。当时人类面临三个前途：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小说通过一个逐渐成长为自觉战士的孩子的目光，反映

了欧洲这一重要时期。接着又写出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血不会流》（*Тази кръв няма да се пролее*，1973），小说描写了主人公维克托实现自己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理想而走过的漫长而艰苦的道路。晚期作品《最大的罪过》（*Най-тежкият грях*，1980）和未完成的作品《一个女人心的悲歌》（*Елегия за едно женско сърце*，1984)的风格与以前的作品迥然下同，小说通过自白的方式阐述当代社会的人际关系。

阿森诺夫的其他小说有，中篇小说《我们的排》（1956)、短篇小说集《良心》（1956）、长篇小说《道路相错》（1959）、长篇小说《一个永恒日子的始末》（1978）。

迪科·富切吉耶夫（1928—　)1952 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法律系，1980 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早年参加革命青年组织工人青年联盟。人民政权成立后先后任《索非亚晚报》、保加利亚电影制片厂、人民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外交部官员，作家协会书记，伐佐夫剧院院长等职。

富切吉耶夫的小说从道德心理角度反映当代生活。许多作品探讨人与自然的问题，特别是生态问题。 1974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河》（*Реката*）写的就是具有实用主义思想的新浮游选矿厂厂长贝利奇基和林学家麦达罗夫之间围绕保护一条河的生态环境而展开的冲突。富切吉耶夫通过麦达罗夫的形象，力图说明保护自然环境和保护人的行动中的自然本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建设新生活，以科学技术改变社会条件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保护人类的精神之美。在 1978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沙漠绿草》（*Зелената трева на пустинята*）更进而指出大自然也是人的思维和行动的必不可少和永恒的“调节器”，从而通过现代泛神论捍卫了人类所有的许多品质。

富切吉耶夫的其他作品有：中篇小说《狼之梦》（1961)、短篇小说集《春天的汁液》（1963）、中篇小说《维列卡河上的天空》（1963）、短篇小说集《愤怒的旅行》（1985）、短篇小说集《空中桥梁》（1970）、

中篇小说集《平凡的故事》（1972）、中篇小说《寒冷的北风》（1972）、《世界在我们心中》（作品选，1978）、《冷酷的疏远》（1981）、《如果你养育了一只杜鹃鸟》[①]（1982）等。

最近二三十年来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特别是宇宙科学的突飞猛进，促使人们对科幻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兴趣。留·迪洛夫是近年来保加利亚科幻小说的杰出代表之一，留·迪洛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全家客居德国柏林。1954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保加利亚文学专业，后在作家协会和《九月》文学月刊等编辑部工作。留·迪洛夫的主要兴趣在于道德哲学问题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他的作品常常是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他于1958年出版的《原子人》被认为是保加利亚科幻小说的成功之作。这方面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不断探索的人》（1964），长篇小说《恐惧的众多名称》（1967）、《宇宙服的重量》（1969），中篇小说集《我们的奇异朋友天文学家》（1971），长篇小说《伊卡尔的道路》（1974），中篇小说集《喂饱苍鹰》（1977）、《双星》（1979），长篇小说《努米和尼基星际奇遇记》（1980）、《放过的机会》（1981），中篇小说集《不要吸烟！系紧腰带》（1982）、《拉格郎日点》（1983）等。

70年代前后，历史小说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并出现了一些有别于以前的历史小说的特点。新时期的历史小说更注重描写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突出了小说的道德心理内容，并通过人物反映、评价历史和事件。而在此以前的历史小说常常只是艺术地再现了历史事实，而忽视对人物的深刻描写。由于这种变化，70年代前后的历史小说，使它们所反映的历史时期同现代人的思维和看法更加接近了，使人们更易于从历史中汲取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营养，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热爱社会主义新生活，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

在众多的历史小说中，以安东·东切夫（Антон Дончев，

①有中译文，载《世界文学》，1985年第6期。

1930—)的《离别的时刻》、根·斯托耶夫的《黄金的价值》、维拉·穆塔弗奇耶娃（Вера Мутафчиева，1929—)的《杰姆事件》和《动乱年代》、斯特凡·迪切夫（Стефан Дичев，1920—)的《为了自由》和《通向索非亚之路》、埃·斯坦涅夫的《普雷斯拉夫大公西宾的传说》和《反基督者》、安·古利亚什基的《黄金世纪》以及斯·卡拉斯拉沃夫的《萨洛尼卡兄弟》等最为出色。

安东·东切夫 1954 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法律专业。1966 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曾在文化部、人民青年出版社、保加利亚电影制片厂工作。他的作品以历史小说为主，同时也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历史小说中以《离别的时刻》（*Време разделно*，1964）一书最为著名。小说描写的是保加利亚历史上最为残酷的一页：保加利亚罗多皮山区一部分居民在奥斯曼帝国奴役下被强迫信奉伊斯兰教的惨剧。小说充满浪漫色彩，把人物、神话、传说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更加突出了人民为捍卫自己的信仰、尊严和土地而不畏牺牲的气慨，并将这种民族精神传给千秋万代。这部小说不仅在保加利亚广为人知，而且在国外也十分有名，至今已有 24 种语言的译本。

除了《离别的时刻》外，东切夫还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觉醒》（1955 与迪米特尔·曼托夫合写）和《萨穆伊尔时代的传说》（1961）等，《觉醒》描写的是 1185—1187 年佩特尔和阿森领导的反抗拜占庭压迫的起义。

根乔·斯托耶夫在 1965 年出版了著名的中篇小说《黄金的价值》（*Цената на златото*），这是一部描写 1876 年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压迫的四月起义的作品。保加利亚文学中有无数作品描写了保加利亚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斯托耶夫的这部小说却很有新意。他不像大部分作者那样描写战斗本身，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事件的道德、哲学和思想根源上，集中在阶级冲突上。故事发生在保加利亚中部佩鲁什蒂查村的教堂中。全村居民都在教堂避难，富人们妄想用黄金换取生命，而普通百姓在浴血奋战中逐渐认识到只有斗争才能获得自由。最后证明黄金是买不来

自由的。

斯托耶夫 1951 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哲学专业。早年参加革命青年运动，曾被判处死刑，后因未成年而撤销判决。人民政权成立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

斯托耶夫的其他重要作品有：随笔《真正的人》（1953），中篇小说集《有如飞燕》（1970），长篇小说《倒霉的日子》（1965）、《环路》（1973）、《归来》（*Завръщане*，1976）。《归来》是《黄金的价值》的续篇。内容是反抗奥斯曼异族统治的先烈们的理想怎样被获得解放的新兴资产阶级所践踏。

维拉·穆塔弗奇耶娃（1929— ）生于索非亚，是著名历史学家穆塔弗奇耶夫之女。1951 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历史专业。曾在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为巴尔干学研究所研究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奥斯曼历史学家，在创作文艺作品之前已在国内外发表了五十多篇专著。1961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以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主。她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和以今天的观点评价历史。主要作品有《动乱年代》（*Летопис на смутното време*，1964—1965）、《杰姆事件》（*Случаят Джем*，1966）、《最后的希什曼人》（1969）、《骑士》（1970）、《小亚西比得》（1975）、《大亚西比得》（1976）、《索弗罗尼传》（1978）等，《杰姆事件》是其代表作。

《杰姆事件》是一部心理描写小说，体现了历史题材小说的新趋势。杰姆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次子。公元 1481 年穆罕默德二世死，其子拜齐德二世继位。杰姆自立于布卢萨。拜齐德遣兵将杰姆击败。杰姆逃到罗德岛，被圣约翰武士团所获。自此以后十余年，西欧各国把他居为奇货，利用他作为挟制拜齐德二世的工具。小说以一个虚构的法庭审判的形式进行，十分新颖。小说评价了东方与西欧的关系，土耳其人侵犯欧洲大陆的原因等复杂的历史问题。与此同时，小说还提出了对祖国和时代的责任、荣誉与耻辱等永恒的道德问题。

穆塔弗奇耶娃于 1981 年撰写了保加利亚大型历史影片《阿斯

帕鲁赫可汗》（*Хан Аспарух*）的脚本，并因此于 1982 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集体）。

斯特凡·迪切夫（1920— ）曾在原捷克斯洛伐克攻读工科，1943 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法律专业。曾任《宇宙》杂志主编、人民文化出版社社长。1959 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斯·迪切夫的全部创作都是以历史为主题的。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为了自由》（*За свободата*，1954—1956）写的是 19 世纪 60 年代的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包括从人民逐渐觉醒到决心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漫长过程。小说树立了当时所有重要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其中有格奥尔基·拉科夫斯基、留本·卡拉维洛夫、斯特凡·卡拉贾、哈吉·迪米特尔、帕纳约特·希特夫、菲利普·托丘、瓦西尔·列夫所基、赫里斯托·波特夫等人，其中以拉科夫斯基的形象最为丰满生动。小说通过真实的和虚构的历史人物，用形象的语言使人民深刻地认识了这一决定保加利亚人民命运时代的真实情况。

迪切夫 1962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通向索非亚之路》（*Пътят към София*）是《为了自由》的续集，故事围绕着 1877—1878 年的俄土战争和索非亚的解放展开，生动地记述了保加利亚取得独立的历程。

埃·斯坦涅夫这一时期发表了两部历史小说《普雷斯拉夫大公西宾的传说》（*Легенда за Сибин，преславския княз*，1968）和《反基督者》（Антихрист，1970）。前者描写的是保加利亚沙皇博里斯（1207—1218 在位）和博戈米尔运动。埃·斯坦涅夫创造了西宾大公、卡洛麦拉、蒂希克等动人的形象，并通过对他们的心理描写肯定了人寻求真善美的权利。后者描写的是 14 世纪末保加利亚被奥斯曼帝国侵吞之前的深刻的政治道德危机，人民丧失信心，邪说异端蜂起，一派亡国灭种的惨相。被剃去须发的特奥菲尔修道士就是这种民族灾难的象征。

安·古利亚什基也在这一时期写了《黄金世纪》（*Златният век*，1970—1971）和《浪迹天涯》（*Скитник броди по света*，1982）

两部历史小说。《黄金世纪》描写的是保加利亚西梅安大帝统治时期(893—927)的太平盛世。作者通过西梅安和普通百姓汉科两个形象，揭示了保加利亚历史上的这一黄金时代的思想道德风貌和文化繁荣的景象。

斯拉夫·卡拉斯拉沃夫(1932—)在1978—1979 年发表的历史长篇小说《萨洛尼卡兄弟》(*Солунските братя*)是他近年来出版的几部历史小说中最重要的作品。小说描写的是斯拉夫文字的创始者基里尔和麦托迪两兄弟的故事以及他们的门徒在斯拉夫国家，特别是保加利亚传播斯拉夫文字和文化的广阔图画。

斯·卡拉斯拉沃夫生于色雷斯平原的一个中农家庭。早年参加青年学生运动，任流动记者。人民政权成立后曾任《人民青年报》、《九月儿童》杂志、索非亚电台、作家出版社等的编辑,人民青年出版社总编和社长，作家协会秘书长，祖国阵线出版社社长等职。创作诗歌、儿童文学作品、戏剧和小说，是一位文学的多面手。他的诗歌大多描写土地、农村和色雷斯平原，诗风朴实明朗，形象具体。小说主要取材于历史，重墨描写保加利亚人民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慨和对自由、独立和社会正义的渴望。《哈吉·迪米特尔纪事》(1968)、《暴君斯拉夫》(1970)、《伊万科的衰落》(1972)、《萨洛尼卡兄弟》等都是颇受人们喜爱的历史小说。 1986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70年代前后，回忆反法西斯斗争的作品大量出现，形成了一个高潮。许多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的作家和在其他战线工作的人士纷纷通过个人的亲身经历，以文艺形式反映那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但仍令人记忆犹新的艰苦英勇的时代。许多作品通过已经牺牲的和仍然健在的反法西斯战士的感人肺腑的事迹，探讨了生与死的问题，揭示了反法西斯战士相信未来，坚信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的胸襟。许多作品还歌颂了友情、同志间的相互信任和纯洁高尚的革命情操。另外一些作品则赞扬了普通老百姓对反法西斯斗争的巨大贡献和不畏强暴、自我牺牲的精神，从而揭示了

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

埃·马诺夫的《被俘的鸟群》（*Пленено ято*, 1947）是最早问世的反法西斯斗争回忆录之一，内容是一个未成年少年参加破坏小组的故事，文笔朴实自然。

诗人维·安得列耶夫在人民政权建立初期根据个人参加游击队的经历写的回忆录《在洛皮扬森林》（*В Лопянската гора*, 1947）和《游击队的故事》（*Партизански разкази*, 1963）几乎同他的著名诗集《游击队之歌》齐名。在歌谣体回忆录《不朽的人们死去了》（*Умираха безсмъртни*，第1卷，1973，第2卷，1982）一书中，作者引用了许多同志的书面和口头材料，从而使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光辉形象和英勇事迹的细节。

诗人达·奥瓦迪亚的回忆录《八月，八月……》（*Август, август...*, 1965），特别是后来发表的《列瓦内夫斯基》（*Леваневски*, 1978），也打破了回忆录的传统写法。作者把事实作了新颖而巧妙的结合，使人能从新的角度观察个别事件，得出往往不同于往常的评价，既保持了作者作为亲身经历者的权威性，又纠正了某些不准确的评述和成见。

诗人多·若特夫回忆录式的短篇小说集《经历过的故事》通过对狱中的一些小事的细腻观察和深邃思索，道出了人生的哲理。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非专业作家也写出了许多很受欢迎的回忆录，如佐拉·德拉戈伊切娃的《职责的嘱托》、多勃里·朱罗夫（Добри Джоров, 1916—　）和埃列娜·朱罗娃（Елена Джурова）的《穆尔加什山》（*Мургаш*）、米特卡·格雷勃切娃的《为了人民》、阿塔纳斯·塞麦尔吉耶夫的《无人回来》、内德尔乔·甘乔夫斯基的《铁窗·人·时代》、斯拉夫乔·特伦斯基的《不久以前》等等。作者都是反法西斯斗争或游击队运动的领导人。他们真实而生动的文笔不仅丰富了保加利亚人民的现代史，而且也极富文学价值。

创作环境的改善使纪实文学和随笔这两种体裁在70年代前后达到了真正的繁荣。康·康斯坦丁诺夫、斯·扎戈尔钦诺夫、阿·

达尔切夫、伊·沃伦、埃·卡兰菲洛夫等作家在这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康·康斯坦丁诺夫的《悠悠岁月漫漫路》(*Път през годините*, 3卷,1959—1966)、《群峰》(*Върхове*, 1987)和《节日》(*Празници*, 1969)以细腻的心理观察和独特的笔法,在再现一些形象和事件方面颇有新意。在他的笔下,伐佐夫、迪姆乔·德贝梁诺夫、迪米特尔·博亚吉耶夫、圣埃克苏佩里等保加利亚和外国作家的形象都有新的挖掘。

在诗人阿·达尔切夫的《片段》(*Фрагменти*, 1967)和小说家伊·沃伦的《思想和话语》(*Мисъл и думи*, 1967)里,集中了许多警句、格言、箴言和评论。这些都是作者对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与创作,对作家、事件的观察和沉思的结晶,文字短小精练,意味深长。

埃·卡兰菲洛夫(1915—)是文学评论家、政论家,1972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1974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法律系。曾任《火炬》、《文学阵线报》等文学报刊的主编,作家出版社社长、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学教授、科学院语言文学统一中心副主任、科学院通讯院士(1975)和院士(1989)。所著《过去留下的阴影》(*Сенки от миналото*, 1960)主要探讨了人类行为的消极现象,是他最早的社会问题随笔。此后又写了许多关于现代科技发展和精神原则之间的矛盾。《主人公与性格》(*Герои и характери*, 3卷,1962—1967)是作者对人类性格及其在文学中的再创造的重要研究成果,取材于保加利亚和外国的文学名著。卡兰菲洛夫的《保加利亚人》(3卷,1968—1975)则是一部研究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点的巨著,全书涉及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拉科夫斯基、列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等几十位保加利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在这部书里,作者身兼学者、民族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评论家和散文家。该书被认为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本。

保加利亚的纪实文学大多同保加利亚历史、反法西斯斗争、某些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或个别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以下值得一提的作品:伊万·帕翁诺夫斯基(Иван

Пауновски, 1935—)的《报应》(*Възмездието*, 1971)、西梅安·普拉夫恰诺夫(1936—)的《一个最后的夏天》(1972)和《原告和被告》(1977),1978 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的尼科拉伊·赫里斯托佐夫的《跟着失踪者的足迹》(1972)和《卫戍部队的射击场》、屯乔·热切夫(1929—)的《保加利亚的复活节或保加利亚的激情》(1975)、彭乔·丹切夫(1915—)的《枪击前后》、伊万·丁科夫(1932—)的《接触保加利亚》(1974)。

保加利亚戏剧创作在 70 年代前后取得了空前的发展。50 年代中期以前的所谓无冲突论已经过去。戏剧开始介入现实。这种开放的气氛在戏剧创作中引起了一种新的现象——诗的浪潮。一批颇有才华的诗人开始写剧本，在戏剧创作中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们把诗歌创作中的某些特点如感情充沛、抒情气氛、联想和象征手法引入戏剧创作，从而加强了戏剧的艺术感染力，甚至改变了戏剧的结构，扩大了作品的时间范围。这一切使戏剧更便于深入现实和当代人的内心世界，有利于打破旧时期的清规戒律。

诗人格·贾加罗夫 1965 年发表的《检察长》(*Прокурорът*)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剧本写的是一个个人崇拜盛行时期的故事。检察长沃伊洛夫一向不假思索地签署对一些共产党员的逮捕令，因为他深信他们是有罪的。但是当检察员请他同意逮捕他的一位老战友时，他才惊醒过来，因为他丝毫不怀疑这位战友的忠诚。故事就是在这种冲突中展开的。沃伊诺夫终于战胜了党内和他内心的不公和恐惧，捍卫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良心。戏剧以一场春雨作为结束，暗示它将涤荡大地和人们心灵上的污垢。贾加罗夫的其他剧本还有《大门已关上》(*Вратите се затварят*, 1961)和《这一小块土地》(*Тази малка земя*, 1974)。

诗人伊万·佩伊切夫的剧本《每一个秋天的夜晚》[1](*Всяка

[1] 有中译文，见《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保加利亚卷，重庆出版社，1992 年，重庆。

есенна вечер，1960）也是这种诗的浪潮中的典型作品。剧本取材于反法西斯斗争。一个缺乏主见的诚实青年，在一个秋天的夜晚遇到了一位做地下工作的姑娘。他对姑娘的爱慕使他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不顾生命去保护姑娘，同时也保护了爱情和对自由的希望。全剧是在一种浓厚的抒情气氛中进行的，从而加强了剧本的艺术感染力。它告诉人们：一个诚实的人是不可能对争取自由的斗争无动于衷的。

伊万·拉多耶夫的剧本《世界如此之小》（*Светът е малък*，1962）写的是远离祖国的侨回忆过去、怀念祖国、向往家乡的情景。这里现实、回忆、憧憬交织在一起，为生活凭添了无限的抒情气氛。拉多耶夫的《红与褐》（*Червено и кафяво*，1972）是一部关于季米特洛夫的剧本。莱比锡审判已经结束，但季米特洛夫仍然处在危险之中，因为他仍然在刽子手的魔爪中。诗的形象语言用在政治问题上，收到异乎寻常的效果。

在这同一时期，一些成名的小说家也开始创作剧本，后来被称为戏剧中的“小说浪潮”。这些剧本大多面向现代生活，从普通日常生活中汲取材料，充满强烈的公民意识。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有德·阿森诺夫、约·拉迪奇科夫等人。阿森诺夫在1964年发表的剧本《生日》（*Рожден ден*）就显示了作者对日常生活的敏锐观察力。《生日》有力地鞭笞了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小市民庸俗作风。1965年发表的《献给绍莫夫大夫的玫瑰》（*Рози за д-р Шомов*）则辛辣地讥讽了消极现象，并以新人精神上的美和诚实作了尖锐的对比。阿森诺夫的戏剧才华在《黄金储备》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施展。剧本成功地塑造了坚定追求理想的共产党员工程师努内娃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墨守成规和追求名利的腐败思想作风。

拉迪奇科夫则将他在小说创作中的民间寓言色彩和离奇古怪文风带进戏剧作品中，从而使人耳目一新。他的第一部剧本《乱作一团》（*Суматоха*，1966）就将想像与现实，过去与未来巧妙地结合

起来，使许多机智善辩的农民活跃在舞台上。接着他又发表了《元月》（*Януари*，1973）、《拉扎里查》（*Лазарица*，1973）、《飞的尝试》（*Опит за летене*，1979）等剧本。这些作品里的人物对生活和世界都有自己的哲学，而这种哲学产生于他们的困苦生活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们以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环顾世界并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在拉迪奇科夫的笔下，他们都朴实诚恳、热爱劳动、热爱土地和生活，拉迪奇科夫是人民的传统、风俗习惯和理想的崇拜者。他在运用民间语言方面也有独到的地方。

70年代前后还涌现了一批新的剧作家，如尼科拉·鲁塞夫（1932— ）、潘乔·潘切夫（1933— ）、科留·格奥尔基耶夫（1926— ）、斯特凡·查内夫、内迪亚尔科·约尔丹诺夫（1940— ）等人。

4 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批评

人民政权建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指导和评论一向是十分重视的。上面已经提到，季米特洛夫还在客居苏联的时候就非常关心保加利亚作家的成长。保加利亚共产党十分重视文学批评。人民政权建立后，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在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领域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作出了贡献。

托多尔·巴甫洛夫（1890—1977）生于什蒂普市。曾在索非亚大学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毕业后长期任教师。因从事革命工作多次遭逮捕。巴甫洛夫曾任科学院院士、科学院院长、名誉院长。他还是许多国家的科学院名誉院士和大学的名誉博士。他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研究、评价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问题，反对唯心主义和庸俗唯物论的文艺观点，反对接受文学遗产中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他还是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对哲学、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化论、反

映论等有大量论著。在文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文学与哲学问题》(1930,1938)、《艺术通论》(1937,1938)、《马雅科夫斯基的诗歌与文学理论和实践的几个基本问题》(1940)、《保加利亚的诗人和作家》(1948,1950)、《艺术与生活》(1953)、《文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1954)、《一般创作方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1956)、《巴甫洛夫选集》(10卷,1957—1971)。

格奥尔基·查内夫(Георги Цанев, 1895—1986)生于弗拉查地区博罗凡村。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专业,后去布拉格查理大学深造,长期任中学教员。人民政权建立后在索非亚大学任教,1952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74年当选院士。他为发展保加利亚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作出了巨大贡献。查内夫能准确指出作品的艺术价值并给予肯定。他的评论文章热情、简练,没有空话,令人信服。他对伐佐夫、雅沃罗夫等作家的思想创作道路的研究,对保加利亚文学史有特殊的意义。查内夫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文学史的研究和培养文学人材方面。1983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著有《作家与创作》(1932)、《今日保加利亚文学诸问题》(1939)、《在现实主义道路上》(1960)、《文学批评选集》(1961)、《作家与问题》(1965)、《传统与创新》(1965)、《保加利亚文学史札记》(4卷,1967—1975)、《查内夫选集》(3卷,1975)、《保加利亚文学中的历史小说》(1976)、《会见过去》(1977)等。

佩特尔·迪内科夫(Петър Динеков, 1910—1992)生于索非亚地区斯莫尔斯科村。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去华沙深造,1945年任教授,1967年当选院士。曾任索非亚大学副校长、科学院民间创作研究所所长等职。编辑过多种文集,他着重研究保加利亚民间创作、保加利亚古代文学、复兴时期文学和波兰文学;对波特夫、约夫科夫、巴格梁娜、斯坦涅夫等著名作家有独到研究。主要著作有《19世纪至保加利亚解放时期的索非亚》(1937)、《文学传奇》(1942)、《保加利亚古代文学》(两卷,1950—1953)、《库兹曼·沙普卡雷夫——民间创作搜集者》(1940)、《文学形象》

(1957)、《作家与作品》(1958)、《保加利亚民间创作》(第1卷，1959)、《复兴时期的作家》(1962)、《文学问题》(1963)、《保加利亚文学史问题》(1969)、《在赫里斯托·波特夫的世界里》(1976)、《文学与文化》(1982)、《在生活与文学之中》(1982)、《保加利亚古代文学问题》(1989)。

潘特列伊·扎列夫(Пантелей Зарев，1911—)生于维丁市。青年时期曾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1941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哲学专业。曾任海关职员、教师、保共中央文学艺术部部长、教授、索非亚大学文学理论教研室主任、索非亚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科学院第一副院长、作家协会主席等职。潘·扎列夫是保加利亚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在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主要著作有：《保加利亚的复兴时期》(1945)、《保加利亚文学(发展中的问题)》(1950)、《风格与艺术性》(1958)、《文学创作过程的丰富多彩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60)、《民族心理与文学》(1970)、《理论·心理学·风格技巧》(1984)。扎列夫在对保加利亚最著名的作家波特夫、伐佐夫、迪莫夫、格·卡拉斯拉沃夫、斯坦涅夫等人的生平和创作的分析方面，也有许多著述。5卷本的《保加利亚文学大观》(*Панорама на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а*，1966—1079)是扎列夫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他的作品充满对每一位作家独特之处的热爱，并能准确指出他们的贡献。他对文学史的思考是同当代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使人更容易领会到文学创作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所著的《文学理论》(1979—1981)，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了文学创作过程的方法论问题，并总结了保加利亚文学发展的经验，是文科学生的重要教材。

潘乔·丹切夫(Панчо Данчев，1915—1989)生于西梅安格勒。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专业，后任中学教师。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曾任出版社和文学刊物编辑、索非亚戏剧学院美学教授，是保加利亚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杰出代表。1986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著有《保加利亚文学中的个人主义》

(1949)、《当代保加利亚诗人》(1951)、《文学艺术问题》(1955)、《马列主义美学问题》(1960)、《作家与时代》(1962)、《批评与美学》(1970)、《当代问题与作者》(1973)、《丹切夫选集》(3卷,1985)等。

西梅安·苏尔塔诺夫(Симеон Султанов, 1927—1989)生于斯利文市。曾在索非亚大学攻读语言文学,历任《义务劳动队舞台》杂志、《青年》杂志、《人民青年报》和人民青年出版社编辑,作家出版社总编、社长。苏尔塔诺夫主要研究保加利亚近代和当代作家,并潜心挖掘祖国文学遗产的艺术宝库。曾编辑过许多作家的文集。著有《安格尔·卡拉利切夫》(1958)、《四位小说家》(1960)、《讽刺作家》(1964)、《约夫科夫及其世界》(1968)、《单独会见斯·明科夫》(1978)和《没有结束的谈话》(1976)、《苏尔塔诺夫选集》(两卷,1987)等。

罗扎莉亚·莉科娃(Розалия Ликова, 1922—　)生于卢科维特市,于索非亚大学法律专业和斯拉夫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执教,1967年任教授。主要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保加利亚文学,对象征派作家有独到的研究。著有《论1923至1944年间保加利亚诗歌的某些特点》(1961)、《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保加利亚散文》(1965)、《作家与时代》(1968)、《当代作家与问题》(1968)、《文学与艺术探索》(1982)、《欧洲象征派问题》(1984)、《保加利亚象征派问题》(1985)等。

米列娜·查内娃(Милена Цанева, 1930—　)生于索非亚。索非亚大学保加利亚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即留校执教,现任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索非亚大学保加利亚文学教研室主任、《文学思想》杂志副主编。她主要研究1878年解放后的保加利亚文学,特别是伐佐夫的生平和创作;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保加利亚诗歌也有研究。著作有《伐佐夫的诗的世界》(1965)、《伐佐夫在普罗夫迪夫》(1966)、《伊凡·伐佐夫》(1973)、《五位诗人》(1974)、《作家与作品》(1980)、《诗人与社会》(1985)、《作者·作品·问题》(1990)等。

5 列夫切夫的《禁止停留》

1956 年 4 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总结了 1944 年 9月 9 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的工作。全会在肯定了十几年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批判了在保共内部存在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现象，恢复了党和国家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准则和集体领导原则，为党和人民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了条件，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四月全会是保加利亚发展新时期的开始。

留博米尔·列夫切夫在 1957 年出版的诗集《群星属于我》，就是在四月全会后开出的一朵艳丽的鲜花。列夫切夫当时只是一个 20 岁的青年，没有经历过革命胜利前的对敌斗争和游击队生活，对革命胜利后一段时期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也没有很多切身体会。他热爱生活，相信未来，要用满腔热情拥抱真善美。吹散了束缚人们思想的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四月全会新风，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唱出了“群星属于我”的豪迈激昂的歌，展示了飞向太空的雄心壮志，抨击了那些嘲笑他要当“群星之主”的市侩，驳斥了那些劝他“描绘”繁星以“自慰”的保守分子。他指出，缺乏信心比地球还要“沉重”。就这样，歌颂新时期的新一代诗人出现了。列夫切夫、弗拉迪米尔·巴舍夫、安德烈·格尔曼诺夫、珀尔万·斯特凡诺夫、佩特尔·卡拉安戈夫、赫里斯托·福特夫等这时登上诗坛的人，后来被人们称为“四月全会一代诗人”。

列夫切夫 1935 年生于保加利亚巴尔干山脉北麓的小城特罗扬。父亲是一位进步医生。1946 年，列夫切夫在父亲去世后，由舅父收养。1957 年毕业于索非亚克利门特。奥赫里德斯基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曾在《人民青年报》编辑部、索非亚电视台文艺部、季米特洛夫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鼓动部和克雷米科夫齐冶金联合

企业工作。后来又任《文学阵线报》的编辑和主编，1972年任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75年任文化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79年任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主席。1972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他还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和设在巴黎的欧洲科学艺术文学院的正式成员。著有《群星属于我》(1957)、《立场》(1962)、《诗歌朗诵会》(1968)、《可以烧掉的日记》(1973)、《天河》(1973)、《自由》(1974)、《相爱之后》(1980)、《缓慢的行军》(1984)、《列夫切夫诗集》(两卷,1985)和《诗的艺术》(1986)等三十多种诗集和诗论。列夫切夫的诗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

当然，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人们称这些诗人为“四月全会的一代”只是就这些诗人产生的时代背景而言。列夫切夫就是一位极具特色的诗人，他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激情，注视现实，关心现实，和当代人同呼吸，共甘苦。他从不粉饰，而是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洞察力反映现实，同情热爱人民群众。例如，他在《疲倦的女工之歌》中深情地写道：

她们疲倦得
连打扮自己的力气
都没有。
因为她们刚刚用方筛罗过沙粉。
因为她们刚刚和过混凝土面包……
而后来……
因为她们刚刚收拾过天空。
因为她们刚刚喂饱了太阳。
又安顿它去入睡……

那情人来了，
把她们搂在令人窒息的怀抱里
带走了。

她们站着瞌睡
左右摇晃着。
微笑着……

这里，诗人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把伟大的母爱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女工的崇高形象，她们的艰苦生活画面，同时也道出了诗人对女工们的无比同情和崇敬。又如，列夫切夫看到现在的孩子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受到父母的溺爱，十分不安。他把跪在小轿车后窗前看风景的孩子，同过去受惩罚的人们相比，说这些孩子今天也在“受惩罚”(《世界之手》)。这里，诗人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后如何继续保持发扬革命传统和艰苦朴素作风的问题，进而提出诗人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任务。实际上，他想说的是：诗人所写的一切，都要受到历史的考验。列夫切夫在题为《6 月 2 日》的一首纪念烈士的诗中说得更加明确：

我们在镜子里照见了自己，
在我们身上却照见了时代。

列夫切夫是“建设诗歌”的主要作者之一。这里，他除了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外，还对过去作了深刻的反思，并预示了光明的未来。他曾在索非亚郊外的克雷米科夫齐冶金联合工厂长期和工人在一起劳动，写下了《到克雷米科夫齐的票价多少》、《第一座高炉》等力作。在后一首诗中，诗人把高炉比作钢铁的梦、纪念馆，把建筑工人比作“活的小高炉”，而先烈的革命精神就是它们的矿石。从铁水联想到诗，又从人们对是否有充分的铁矿资源的疑虑联想到人的精神资源……这里，诗人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制度以罕见的速度改变生活的一幅欣欣向荣的建设图景，也不仅仅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造就一代新人，诗人进一步（这可能重要得多）提出了这一代新人是否有充分的精神

资源这样一个迫切问题，并指出先烈的英勇业绩和光辉榜样，应是后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列夫切夫的诗歌充满革命乐观精神。这种乐观精神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他对未来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真理的忠诚。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的全部诗歌。他在 21 岁时写的《加西亚·洛尔伽之歌》就开始表明了这一点。加西亚·洛尔伽（1898—1936）是西班牙著名诗人、戏剧家、反法西斯战士。他的诗植根于西班牙古典和民间的诗歌，又吸收了西欧现代诗的表现方法，大胆创新，想像丰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被人们广为传诵。加西亚·洛尔伽的活动和创作深深打动了列夫切夫，成了他“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列夫切夫并不是以伤感的心情歌颂加西亚·洛尔伽。他在诗中寄托了自己对这位诗人的无限哀思和崇敬，他要像逝者那样继续“引吭高歌”，相信逝者心爱的吉他不会沉默，而“将弹起欢快的曲调”，并且决心在逝者的墓碑上磨利短剑，继承逝者的遗志，“准备下一次战斗”，从而把一首悼歌写成了一首战歌。

列夫切夫在 1984 年 12 月召开的保加利亚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以《历史乐观主义的文学》为题作了总结报告。在当今由于科技发展造成大自然的污染和破坏，帝国主义利用科技制造核恐怖，世界面临着种种问题，许多新生事物经受着历史考验的时候，他指出，文学工作者应当“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用自己的创作去揭示人类美好未来的希望，用理想和艺术力量来给共产主义的未来描绘出一幅和谐完美的人类关系的图画”。他自己就在诗中写道：

我无可救药地染上了
明天传奇病。

——《70 年世界博览会》

正因为他热爱生活，对祖国和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所以他憎恨庸俗、保守、虚伪和缺乏个性。在他的许多诗歌里都洋溢着不断追求、不断创新的精神。他在《和季米特洛夫谈话》一诗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难道不只是贫困，
难道美好也会让人产生
要求革命的伟大愿望？

他还说过：

我的责任就是建设一个
没有存在过的世界……

——《时间就是希望》

为此，诗人要求不断认识世界，认识未来，顽强进取，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一切：

请不要让青春什么都清清楚楚，
让老朽去明白一切事物。

——《清清楚楚》

对于诗歌的永恒主题之一的“爱情”，他也表现出“不断追求，不断创新”的精神。他在《相爱之后》这首诗中，一反一般诗人喜欢描写初恋和热恋的做法，以浓墨重彩勾画“相爱之后”的感受。诗人把热恋比做“游戏”，游戏总会很快结束。生活里常常是：恋爱结束就会从浪漫走入现实，从梦幻跌入平庸，手“不再是翅膀”了，爱情也失去了它原来的魅力。但是诗人认为，“相爱之后”会使双方真正“联系起来”，继续“心驰神往”，而且会“热烈燃烧”。“相爱之

后”不是爱情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更漫长的共同生活道路的开始。这样，诗人就赋予爱情以新的“追求”和“创新”，使爱情永葆青春。这时，双方“靠得如此之近”，以致“分辨不出”那两颗猛烈跳动着的心到底属于谁，而达到“合二而一”的境界。

列夫切夫的诗属于自由体，这是由强烈的现实题材决定的。他的诗在平凡中见真谛，富于内在的节奏感，读起来不但不使人觉得冗长、枯燥，反而以起伏跌宕的旋律扣人心弦，做到虚与实，感情与理智，共产主义坚定性和人道精神的丰富内容与完美的诗歌技巧的高度结合。作者经常以奇特的联想，巧妙的比喻，深刻的哲理，新颖的意境使读者得到艺术享受。但是，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某些联想和隐喻令人费解。

人们常说，想像（包括联想）是诗的翅膀。列夫切夫凭借想像的翅膀，翱翔在诗歌的天空，给读者带来丰富的色彩、优美的声音、众多的形象、绚丽的图画。而他巧用比喻的功夫，又使他的诗如在夏夜的晴空上缀满晶莹的星斗，发出美妙的光芒。在前面提到的《疲倦女工之歌》中，他把女工比做母亲，把工地作业比做家务劳动，把方筛比做粉罗，把混凝土浇件比做面包，把大自然比做家，把天空比做床铺，把太阳比做孩子……这样，诗人就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把伟大的母爱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女工的崇高形象。而诗人把姗姗来迟又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比做女工们的情人，就更耐人寻味了。通过这些联想、比喻和刻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乐观向上、无私奉献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风貌。从而激起了对一代新人的尊敬、热爱和同情。

《自然辩证法》一诗中的联想和比喻更加引人入胜。《自然辩证法》本来是恩格斯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作者把它作为标题，立意十分新颖，而这首缅怀恩格斯的短诗，又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别具一格的诠释。作者把浩瀚的大洋比做坟墓，就使得生与死这两个抽象的概念有了具体的形象，揭示了它们之间互相转化的关系，也暗示了世界是发展变化的，社会也是发展变化的。资本

主义制度必将被比它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最怕怀疑，它要求人们相信它是最后的，也是最完善的制度，不容怀疑。因此，“怀疑”就成了刺向资本主义心脏的“利剑”,而‘利剑’又多如‘纵横交错的海路”,这正是恩格斯和他的战友马克思首先为后人铸就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像开闭炉门般’学习《共产党宣言》后,觉醒了。在表面‘宁静’的世界上，蕴育着“暴风雨”——无产阶级革命。人们行动起来了。为了躲避反动派的监视和镇压，革命者在渔船上印制“传单”。这首诗从立意、构思、联想到比喻都堪称上乘，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佳作。

列夫切夫几十年来创作精力旺盛、才思汹涌，一直热情讴歌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生活，鞭笞妄图把历史拉向后退的一切腐朽力量，辛勤战斗在保加利亚诗坛，博得了“时代歌手”的称誉。

下面引录的一首诗最能反映列夫切夫诗歌的特点。这首诗初看是一首爱情诗，写一对情侣找到一个接吻的理想场所的欣喜。仔细读后不难看出：诗人是想通过主人公的愿望——让“千百万节车厢”把他们的亲吻“送往世界各个角落”——表达对世界人民的热爱。再认真玩味，还会发现，一个随处可见的上面写着“禁止停留”的木牌，正是一个借喻。作者通过这块木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人生从童年到成年，又从成年到老年，要经过无数座“神奇的桥”，而在每一座桥上都不应“停留”。主人公说“这是我最喜爱的地方”，正是表达了作者自己要永远前进，不断进取的革新者的志向。原诗没有标题，因而给读者留下了更加广阔的想像余地。

禁止停留

我们停了下来。
恰恰在一块木牌下面，
牌上写着：
“禁止停留！”

那时你对我说：
“这是我最喜爱的地方……”

一座桥。
由钢轨和木板构成的桥。
啊，锈痕累累的长虹！
还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
“禁止停留！”

桥下流的不是河水，
而是钢轨。
扬旗
不断扑腾着翅膀。
午夜的调车作业发出隆隆雷声。

机车在我们脚下
驶过，
如云的蒸汽把我们吞噬。
无人看见，
只有我们两个，
相互拥抱接吻。

千百万节车厢
把我们的亲吻，
送往
世界各个角落。
我们离去了，
这时我对你说：
“这才是我最喜爱的地方……”

一座桥。

神奇的桥。难忘的桥。

一座童年和成年之间的桥。

还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

“禁止停留！”

6 瓦列里·彼得罗夫的《喜信》

瓦列里·彼得罗夫(1920—)生于索非亚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知名的律师，母亲是中学法语教师。从小就生长在左派文艺界人士当中。1939年毕业于索非亚意大利语学校，1944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医学院。行医时间不长。1945年作为战地作家参加了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彼得罗夫是《黄蜂报》的创办人之一，先后任该报的编辑、副主编和编委。1947—1950年任保加利亚驻意大利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后在保加利亚作家出版社和保加利亚故事影片制片厂任编辑多年，并在戏剧学院讲授电影创作。彼得罗夫获人民艺术文化活动家称号。1962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彼得罗夫1936年在《学生激情》杂志上首次发表作品。在《艺术与评论》杂志上显露了文学才华。1940—1948年是彼得罗夫的丰收期,这期间他写了《帕列奇科》、《童年》、《蓝海之滨》、《上路》、《天花板的回忆》等长诗,组诗《巴尔干山之夜》、《旧事新提》等。建立在戏谑、一语双关、费解的联想和动人的韵律基础上的彼得罗夫诗风，常常令许多评论家难以理解。他的许多作品是描写现代城市生活和青年、大学生的心理的。他的抒情长诗《在温和的秋天》(1961)是在保加利亚文学界克服了简单化和风格单一化之后的一部佳作。评论界也开始改变对他的看法，肯定了他的作品的丰富

多采。1967 年出版的《亦雨亦晴》,是一些抒情的小诗,内容是对青年人的天真的沉思、观察和嘲笑。 60 年代彼得罗夫主要转向讽刺诗，诗中充满机智、人情味和乐观精神，其中一部分收进了诗集《一笑了之》。

彼得罗夫具有把人生的悲欢苦甜结合在艺术统一体中的少有的才华。他那聪慧的目光能敏锐地发现人们的崇高美德，又能深入地窥见他们的弱点。因此，人们在品尝他的赞叹之前先尝到辛辣的讽刺。他在嘲笑他的主人公的同时，又对他表示好心的同情。他的诗风具体、现实、细腻、隽永。有时人们很难区分他是在严肃地讲述，还是在开玩笑。他的这些特点曾使他在一段时期不为人们所理解，并得到不准确，甚至不公正的评价。

彼得罗夫对保加利亚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日程的第一点》（1956）、《在小岛上》（1958）、《第一课》（1960）、《太阳与影子》(1962)、《没有铠甲的骑士》（1966）以及一些短片和动画片的脚本都是他的作品。

彼得罗夫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剧作家。他把小型文艺节目的一些现代手法引入戏剧。他的抒情剧《当玫瑰起舞的时候》（1961）就把舞台艺术的各种因素、幽默、乐观精神和青年激情结合了起来。

彼得罗夫还是保加利亚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他把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都译成了保文。罗达里、吉普林、米哈尔科夫等作家的作品也是由他介绍给保加利亚儿童的。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彼得罗夫曾在 1958 年出版了一本中国游记《关于中国的书》。这部长达 655 页的巨著是他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写成的。彼得罗夫是在 1955 年夏天同保加利亚著名画家斯托扬·维内夫一道访问中国的，一共历时 4 个月。他写的这本引人入胜的游记小说的主人公乍一看好像是作者自己、维内夫和陪同他们一起访问的中国译员。但是读完全书后，又立刻会使人感到游记的真正主人公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彼得罗夫以一个艺术家

特有的细致观察力，生动地描绘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他们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彼得罗夫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和丰富的文化典籍，以艺术的手法从各个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彼得罗夫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热爱和对中国人民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信心来写这本书的。每章每节都浸透着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同时在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淳朴、好客的中国人民是怎样热情而亲切地迎接来访的外国朋友的。这本游记由于内容丰富、文字优美，长期以来都是保加利亚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籍。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一首小诗中充分领略到彼得罗夫的乐观精神。就以这首诗作为这本小册子的结束吧。

喜信

一封充满喜讯的书信
使我如此心欢！
我看着封面的邮戳，
一算已走了几天。

我在想：那就是说，
昨天我那般悲伤的时候，
这张充满欢乐的小纸
早已离开发信人高飞远走。

那就是说，有时我们觉得
世界是如此暗淡无光，
人们啊,莫悲伤 ——
喜信正在路上！

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

История на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а(《保加利亚文学史》)，том I-IV, Изд. на БАН, София, 1962—1976

Речник на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а(《保加利亚文学词典》)，том I-III, София, Изд. на БАН, 1976—1982

Очерци по история на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лед девети септембри 1944 година(《1944 年 9 月 9 日以后保加利亚文学史论文集》)，том I-II, Изд. на БАН, София, 1979—1980

Тринадесет века българска литература (《保加利亚文学 13 个世纪》)，том I-II, Иван Богданов, Изд. на БАН, София, 1983

Проблеми на старата българска литература(《保加利亚古代文学问题》)，Петър Динековр, Български писател, София, 1989

История на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а 1878—1944(《保加利亚文学史 1878—1944》), Светлозар Игов, Изд. на БАН, София, 1990

Речник по нова българска литература(《保加利亚新文学词典》)，Магдалена Шишкова, Хемус, София, 1994

保加利亚文学大事年表

一、保加利亚古代文学

年代	事件
681	保加利亚立国
690	《保加利亚可汗名录》成书
815	麦托迪诞生
827	基里尔诞生
840	克利门特·奥赫里德斯基诞生
9—10 世纪	康斯坦丁·普雷斯拉夫斯基、约翰教区长、切尔诺里泽茨·赫拉伯尔诞生
855	基里尔和麦托迪创立斯拉夫文字
869. 2. 4	基里尔逝世
886	基里尔和麦托迪的门徒到达保加利亚
893	古保加利亚语取代希腊语成为保加利亚正式语言
1018	拜占庭统治保加利亚
1186	保加利亚从拜占庭统治下获得解放第二保加利亚国家建立
1325—1330	埃夫蒂米宗主教诞生

二、在奥斯曼帝国异族统治下的保加利亚文学

年代	事件
1396	奥斯曼帝国统治保加利亚
1722	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诞生
1739	索夫罗尼·弗拉昌斯基诞生
1762	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完成《斯拉夫

保加利亚史》

1821. 4	格奥尔基 · 拉科夫斯基诞生， 1867. 10. 9 逝世
1827. 11. 17	佩特科·斯拉维伊科夫诞生
1834. 11	留本·卡拉维洛夫诞生， 1879. 1. 21 逝世
1837. 7. 6	瓦西尔·列夫斯基诞生， 1873. 2. 19 逝世
1838	瓦西尔 ·德鲁梅夫诞生
1848. 1. 6	赫里斯托· 波特夫诞生
1850. 6. 27	伊凡,伐佐夫诞生
1850 或 1851	扎哈里 ·斯托扬诺夫诞生，1889. 9. 2 逝世
1863. 1. 1	阿列科 ·康斯坦丁诺夫诞生， 1897. 5. 11 逝世
1866. 4. 27	潘乔，斯拉维伊科夫诞生， 1912. 5. 28 逝世
1876. 4	全民四月起义爆发
1876. 5. 20	赫里斯托· 波特夫殉难

三、独立道路上的保加利亚文学

1877. 1. 1	佩约 · 雅沃罗夫诞生， 1914. 10. 16 逝世
1877. 7. 18	埃林 · 彼林诞生，1949. 12. 3 逝世
1880. 11. 9	约尔丹·约夫科夫诞生，1937. 10. 15 逝世
1883	伐佐夫的中篇小说《流亡者》初次发表
1884	伐佐夫的《被遗忘者的史诗》第 2 部

	分发表在诗集《田野和森林》中，1926年出版单行本
	扎·斯托扬诺夫的《保加利亚起义札记》出版
1885	东鲁麦利亚和保加利亚王国合并
1891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成立
1893. 4. 29	埃莉萨维塔·巴格梁娜诞生，1991. 3. 23逝世
1894	《轭下》单行本出版
1895	《甘纽大叔》出版
1895. 1. 15	格奥·米列夫诞生，1925. 5. 15逝世
1896	潘·斯拉维伊科夫的长诗《血歌》开始发表，1925年全诗出版
1898. 9. 14	迪米特尔·塔列夫诞生，1966. 10. 20逝世
1898. 9. 30	赫里斯托·斯米尔宁斯基诞生，1923. 6. 18逝世
1900	雅沃罗夫的长诗《冰雹》首次发表
1903. 10. 10	赫里斯托·拉德夫斯基诞生
1904. 1. 12	格奥尔基·卡拉斯拉沃夫诞生，1980. 1. 26逝世
1904. 6. 12	阿塔纳斯·达尔切夫诞生
1907. 11. 14	埃米利扬·斯坦涅夫诞生
1909. 6. 25	迪米特尔·迪莫夫诞生，1966. 4. 1逝世
1909. 12. 28	尼科拉·扬科夫·瓦普察洛夫诞生
1911	埃林·彼林的《格拉克一家》出版
1913	保加利亚作家协会成立

1914.5.7	安德列·古利亚什基诞生
1914.7.31	卡门·卡尔切夫诞生，1988.1.14 逝世
1914、11.9	帕维尔·维任诺夫诞生，1983.12.21 逝世
1916.4.1	保加利亚采用新历，4月1日改成4月14日
1916.12.16	伊万·佩伊切夫诞生，1976.7.9 逝世
1919.5.25—27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第22次代表大会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9.6.19	博戈米尔·赖诺夫诞生
1919.9.15	尼科拉伊·海托夫诞生
1920.4.22	瓦列里·彼得罗夫诞生
1921.9.22	伊凡·伐佐夫逝世
1922	斯米尔宁斯基的《总有一天》出版
1922.1.2	勃拉加·迪米特罗娃诞生
1923.1.19	伊瓦伊洛·彼得罗夫诞生
1923.9.22—23	九月反法西斯起义爆发
1924	米列夫的长诗《九月》出版
1924.12.6	帕维尔·马特夫诞生
1925.2.5	根丘·斯托耶夫诞生
1925.7.14	格奥尔基·贾加罗夫诞生
1926	斯特拉希米罗夫的长篇小说《霍罗舞》出版
1929.10.16	约尔丹·拉迪奇科夫诞生

1930. 5. 7	佩尼奥·佩内夫诞生
1930. 9. 14	安东·东切夫诞生
1932	拉德夫斯基的《心向党》出版
1933. 9. 21 —1933 . 12. 23	莱比锡审判，季米特洛夫给予法西斯第一次政治打击
1935	留·斯托扬诺夫的中篇小说《霍乱》出版
1939. 9. 1	希特勒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1940	瓦普察洛夫的诗集《马达之歌》出版
1941. 3. 1	保加利亚加入轴心国一方
1941. 6. 26	保加利亚成立第一支游击队
1942	格·卡拉斯拉沃夫的长篇小说《儿媳妇》出版
1942. 7. 23	尼科拉·瓦普察洛夫就义

四、社会主义时期的保加利亚文学

1944. 9. 9	保加利亚人民反法西斯武装起义胜利，人民政权建立
1944. 9. 22	保加利亚共产党发表告人民书，宣布保加利亚参加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
1945. 9	保加利亚作家全国代表会议召开
1947	安得列耶夫的诗集《游击队之歌》出版
1948	奥·瓦西列夫的剧本《警报》出版
1949. 7. 2	季米特洛夫逝世
1949. 9. 27	《文学阵线报》创刊
1951	迪莫夫的长篇小说《烟草》出版
1952	塔列夫的《铁灯》出版

	格·卡拉斯拉沃夫的五卷小说《老百姓》开始出版，1973 年出齐
1953	迪·安格洛夫的长篇小说《出生入死》出版
1954	汉切夫的诗集《子弹夹中的诗》出版
1956	卡尔切夫的长篇小说《织工之家》出版
	拉多伊·拉林的讽刺诗集《绝密》出版
1957	开始出版《火焰》、《文学思想》、《人民文化报》、《祖国的语言》等报刊
	列夫切夫的《群星属于我》出版
1958	斯坦涅夫的长篇小说《伊万·康达雷夫》开始出版，1964 年出齐四部
	古利亚什基的《金色的羊毛》出版
1959	佩·佩内夫的遗作长诗《考验的日子》发表，1969 年出单行本
1960	佩伊切夫的《每一个秋夜》出版
1961	瓦·彼得罗夫的长诗《在温和的秋天》出版
1962	保加利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保加利亚文学史》（4 卷，1976 年出齐）
	若特夫的长诗《在魔鬼家做客》出版
1964	东切夫的《离别的时刻》出版
	伊利亚·沃伦的《约夫》出版
1965	贾加罗夫的剧本《检查长》出版
1966	博·赖诺夫的《茫茫无路》出版
1967	海托夫的《荒野中的故事》出版
	·波波夫的《根》出版

	多拉·加贝的诗集《请等一等，太阳》出版
	达尔切夫的的随笔《片段》出版
	卡尔切夫的《索非亚故事》出版
1968	伊·彼得罗夫的中篇小说《在我出生以前》出版，1972 年增补后改名为《在我出生以前和以后》
1968. 5. 20—22	保加利亚作家协会第 1 次代表大会召开
1969	拉迪奇科夫的《带火药味的读本》出版
1971	保加利亚作家协会第 2 次代表大会召开
1975	维任诺夫的小说《夜驰白马》出版
1976	保加利亚作家协会第 3 次代表大会召开
	保加利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保加利亚文学词典》（3卷，1982 年出齐）
1978	富切吉耶夫的长篇小说《沙漠绿草》出版
1979	保加利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44 年 9 月 9 日以后的保加利亚文学史论文集》（2 卷，1980 年出齐）
1980	保加利亚作家协会第 4 次代表大会召开
1981. 5. 25—31	第 1 届国际保加利亚学代表大会在索非亚召开
1981. 10. 20—21	保加利亚隆重庆祝保加利亚立国

	1300周年
1984	保加利亚作家协会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
1986.5.23—6.3	第2届国际保加利亚学代表大会在索非亚召开
1986.10.24—27	第6届索非亚国际作家会见举行，以林默涵为首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参加
1988.9	第10届国际斯拉夫学代表大会在索非亚召开
1989	保加利亚作家协会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

保加利亚文学在中国

保加利亚是一个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东欧古国。在漫长的岁月里，保加利亚两次被外国侵占，一次是 11 世纪到 12 世纪的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另一次是 14 世纪到 19 世纪 70 年代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但是，勤劳勇敢的保加利亚人民，在长期的外国奴役下，并没有丧失它的语言和民族文化。保加利亚的文学，正是在人民的辛勤劳动和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成长繁荣起来的。

我国早在解放前，文学翻译界就把保加利亚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了。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十分重视翻译介绍外国反抗黑暗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文学，借以促进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正是鲁迅第一个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保加利亚文学。早在 1921 年，他就译出了保加利亚新文学的鼻祖、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伊凡·伐佐夫的短篇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并且热情而详细地介绍了这位作家的生平，发表在同年的《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中，后来又收进他的翻译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里。1935 年，鲁迅又翻译了伐佐夫的另一篇小说《村妇》，发表在《译文》月刊的终刊号上，后来收进《译丛补》一书中。著名文学家茅盾于 20 年代翻译过伐佐夫的《他来了么？》和埃林·彼林的《老牛》等短篇小说，收在他辑译的《文学周报》社丛刊《雪人》一书中。胡愈之译过伐佐夫的《失去的晚间》，收在他辑译

的世界短篇杰作选《星火》一书中。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也翻译过保加利亚的文学作品。他翻译的多勃里·内米罗夫的短篇小说《笑》(原名《里多》),收在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翻译小文库第十种《笑》一书中。但是，在解放前，我国出版的保加利亚文学作品，毕竟为数不多。据现有材料，一共只出版过5种单行本:《灵魂的一角及其他》(1929年,斯塔马托夫著)、《过岭记》(1931年，伐佐夫著，包括五篇短篇小说）、《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集》(1937年)、《保加利亚短篇集》(1945年,包括16位作家的16篇作品,本书和《过岭记》都是老翻译家孙用译的)、《甘佑先生》(1946年，康斯坦丁诺夫著）。此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和诗歌，散见在一些小说选和报刊中。孙用曾翻译了1925年索非亚出版的世界语《保加利亚文选》所收的40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和诗歌，陆续发表在江浙一带的报刊上。

除了翻译作品外，解放前也曾有过关于保加利亚文学的介绍性文章。除了上面提到的作品大都有简短的作者介绍外，据目前已知的材料，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保加利亚文学的文章，当推1908年独应（周作人的笔名）发表在《河南》杂志同年第9期上的文章“哀弦篇”。这是一篇介绍欧洲弱小民族文学的综合性文章，里面提到保加利亚的拉科夫斯基、波特夫和伐佐夫等作家。

大规模有系统地介绍保加利亚文学，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据初步统计，近五十年来，我国共介绍了一百多位保加利亚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三十多位作家的单行本60种。诸家作品综合集24种，多国别作品综合集几十种。这里还不包括散见于各种文学刊物上的大量翻译作品。近五十年来，在翻译介绍保加利亚文学方面，出现了两个高潮：50年代和80年代。其中，50年代出版的作品主要是从俄文、英文、世界语翻译过来的，而80年代出版的作品则主要是直接从保加利亚文译出的。

介绍到中国来的保加利亚民间文学中，比较重要的有《保加利亚民歌选集》(1958)和《保加利亚民间故事》。前者收了各类主题

和在各种民间节日歌唱的民歌 78 首,后者收了 12 篇故事。80、90 年代，这方面的译本突然多了起来，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和湖南少儿出版社各出版了一种保加利亚民间故事集，另外还有两种加布罗沃笑话集。

保加利亚复兴时期（18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 70 年代）的文学中，介绍得最多的是卡拉维洛夫和波特夫。 19 世纪保加利亚的杰出作家卡拉维洛夫的代表作《旧日的保加利亚人》和其他三篇中短篇小说(《受难者》、《宠儿》、《有钱的穷人》)合收在《旧日的保加利亚人》一书中。他的另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首领》收在 1979 年出版的《东欧短篇小说选》中。保加利亚复兴时期文学的顶峰、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革命家和诗人波特夫的不朽诗篇，在中国有多种译文。 1956 年出版的《波特夫诗集》收齐了他的 20 首诗歌。

保加利亚新文学的奠基人、现实主义小说家、爱国诗人伊凡·伐佐夫的作品，在中国介绍得最早，数量也最多。他的著名长篇小说《轭下》早在解放初期就有了中译本，先后印行过 5 次。1982 年又根据保文对原译本进行了增补校订，出了新的全译本。伐佐夫的中篇小说曾出过近十种不同的专集和合集。他的游记《斯达拉山一隅》也有了中译文。伐佐夫的《诗选》,收了包括长诗《大石堆》在内的近百首诗歌，是迄今选译最多的版本。此外，他的一些作品还收录在 10 多种外国诗选中。

保加利亚 1878 年解放（指从土耳其压迫下获得的解放）后的文学，除伐佐夫的作品外，要算埃林·彼林介绍得最多了。他的中篇小说共出过 3 种译本，不少作品还收进了 5 种合集中。1980 年出版的《埃林·彼林选集》，共收了包括中篇小说《盖拉克一家》和《大地》在内的 70 篇作品，是迄今最充实的选集。埃林·彼林的一些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也有不少中译文。斯塔马托夫的短篇小说在中国一共出过 3 种译本,共有 20 多篇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家如阿·康斯坦丁诺夫、斯特拉希米罗夫、托多罗夫的一些作品，也译成了

中文。1986年还刊出了弗拉伊科夫的《长工》。康斯坦丁诺夫的《甘纽大叔》1988年出了新译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保加利亚文学，以杰出的作家卡拉斯拉沃夫的作品介绍得最多。他的长篇小说《儿媳妇》出过两版，1982年又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探戈》。留·斯托扬诺夫的中篇小说《霍乱》和一些短篇小说，约夫科夫的《白燕》和其他8篇短篇小说，格·拉伊切夫、克·贝列夫和基昂乔·贝列夫的短篇小说都有中译本。

这一时期的无产阶级诗歌，在中国介绍得最为充分，它的优秀代表斯米尔宁斯基和瓦普察洛夫的诗歌，有过多种选集。1952年7月，中国文学界曾举行大会，隆重纪念瓦普察洛夫殉难10周年，大会由当时的作家协会主席丁玲主持，著名诗人艾青在会上作了关于瓦普察洛夫生平和创作的报告。瓦普察洛夫的一些著名诗作，也同时介绍到中国。前面提到过的波特夫和斯米尔宁斯基、瓦普察洛夫在中国合称"保加利亚三大革命诗人"，1955年，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曾在北京作过关于这三位诗人的生平和创作的报告。斯米尔宁斯基的短篇小说也有不少译成了中文。此外，拉德夫斯基的诗歌出了专集，格奥·米列夫的名诗《九月》也有中译本。1958年，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图书馆还联合举办过纪念雅沃罗夫诞生80周年纪念晚会。

保加利亚1944年9月9日人民政权建立后的文学，在小说方面介绍得比较充分。迪莫夫的《烟草》，塔列夫的《铁灯》，古利亚什基的《农业机器站》，达斯卡洛夫的长篇小说《路》的第一部分《加尔乔》，维任诺夫的中篇小说《旗帜在运动场上飘扬》、《第二连》，伊瓦伊洛·彼得罗夫的《侬卡》，斯拉夫切夫的《哥儿俩》，科拉洛夫的《他们成为勇敢的人》、《爱的波折》(即《白鲁尼卡》)，哈拉兰·鲁塞夫的《悬崖峭壁》等都有中文译本。卡拉里切夫、斯塔涅夫、戈里戈罗夫、奥·瓦西列夫、斯·斯托扬诺夫、塔列夫、马丁诺夫、阿普里洛夫、阿森诺夫、阿塔纳索娃、沃德尼恰尔斯基、沃尔科娃、达纳伊洛夫、

斯·达斯卡洛夫、特·达斯卡洛夫、迪阿瓦托夫、迪诺夫斯卡、埃夫蒂莫娃、卡林娜·玛林挪、卡门诺娃、基里洛夫、克拉耶夫、马林诺夫、麦塞奇科夫、米海洛夫、内兹纳科莫夫、尼科洛夫、奥沙乌诺夫、扎·彼得罗夫、伊·彼得罗夫、皮克利瓦诺夫、普罗德夫、罗多普斯基、塞维尔尼亚克、斯列勃罗夫、特·斯托扬诺夫、彼·洛内夫、佩·托多罗夫等人的短篇小说，也都有介绍。卡门·卡尔切夫关于季米特洛夫的传记文学《季米特洛夫一家》和长篇小说《新城奇缘》也分别于1987年和1985年译成了中文。80年代还出版了斯坦涅夫的中短篇小说集《傍晚静悄悄》(其中共有12篇作品)、赖诺夫的《黑天鹅》(有两种译本)、维任诺夫的《夜驰白马》、《障碍》(有两种译本)、《白色蜥蜴》、《多元空间》、《像一颗启明星的人》、《星星在我们顶空》，古利亚什基的《怪人》。

在诗歌方面，50年代，拉马尔、弗尔纳吉耶夫、巴格梁娜、伊萨耶夫、马特夫、博日洛夫、赖诺夫、米尔切夫、米列娃和安得列耶夫的一些诗作都译成了中文，散见在报刊上。伊萨耶夫、米尔切夫和米列娃等诗人的访华诗作也有零星介绍。80、90年代，许多现代诗人的作品在中国的外国文学刊物上开始多了起来。多拉·加贝、达尔切夫、汉切夫、若特夫、瓦·彼得罗夫、迪米特罗娃、麦托迪耶夫、拉多伊·拉林、奥瓦迪亚、马特夫、贾加罗夫、佩内夫、列夫切夫、斯特凡诺娃、佩·佩内夫、奥尔林诺夫、卡拉安戈夫、甘切夫、达米扬诺夫、肯切夫、绍普金、戈列夫等当代诗人的诗歌，都有介绍。

在戏剧方面，50年代，奥·瓦西列夫的《人间乐园》(即《警报》，曾在中国演出过)、《幸福》，丘里亚夫科夫的《第一次打击》都有中译本。其中，描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对希特勒法西斯进行英勇斗争的剧本《第一次打击》，还在沈阳和北京上演过，著名话剧演员李默然成功地塑造了季米特洛夫的光辉形象。80年代以来，阿森诺夫的《可靠的后盾》、达纳伊洛夫的《外科医生》、格·卡拉斯拉沃夫的《所有人的母亲》、佩伊切夫的《每一个秋夜》都有了中译文。

在儿童文学方面，除上面说过的埃林·彼林的一些童话外，早年还出版了斯坦涅夫的《小狗熊闯祸》,瓦西列夫的《小领袖》、《小飞马》、《神马》,哈吉马尔切夫的《牧童加里特柯》(另一种译本的书名是《小牧童》)。近年来还出版了莉莉亚·塔列娃的《昨天·今天·明天》、《大小孩和小大人》、《柏尔科变聪明了》。

在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方面，值得提出的是季米特洛夫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早在 50 年代就有了比较多的介绍。1982 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诞生 100 周年，又重新出版了经过增订的《论文学、艺术和文化》，这个版本把迄今已知的季米特洛夫关于这方面的论述都收集进去了。此外，著名文艺理论家托·巴甫洛夫的某些文艺批评著作和卡兰菲洛夫的诗评也有中译文。

从以上情况看，我国介绍保加利亚文学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绩。特别是解放后的近五十年来，对保加利亚新文学的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基本上都有所介绍，而译成中文的作品，大部分也是他们的代表作。

在保加利亚文学的介绍方面，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保加利亚古代文学的介绍，在中国还是个空白。复兴时期的文学中，一些重要的作家如德鲁麦夫、钦图洛夫、拉科夫斯基、佩特科·斯拉维伊科夫等人的作品在中国都还没有译文。波特夫的优秀散文、政论和小品文也都没有介绍过来。1878 年解放后文学中的不同流派几乎没有介绍，例如，布拉戈耶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波梁诺夫、基尔科夫、弗莱科夫、潘乔·斯拉维科夫、雅沃罗夫、明科夫、亚森诺夫、丘多米尔、兰科夫、齐达罗夫、维尔科夫等作家的作品都极少译成中文。保加利亚人民政权建立以后的文学介绍得虽然比较多些，但也有重大遗漏，特别是近年的作品介绍得很不充分，例如，伊利亚·沃伦、拉迪奇科夫、海托夫、扎戈尔钦斯基、福切吉耶夫等作家的小说，介绍得很少。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出版了一些有相当规模的合集。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重庆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了一

套 52 卷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其中第 36 卷是保加利亚卷。该卷长达 665 页，包括达斯卡洛夫、马丁诺夫、卡尔切夫、若特夫、察切夫、克鲁莫夫短篇小说 6 篇，卡拉斯拉沃夫和斯塔涅夫的中篇小说《探戈》和《傍晚静悄悄》,维任诺夫的长篇小说《星星在我们顶空》，马诺夫的纪实文学《被俘的鸟群》中的 3 篇，丘利亚夫科夫、奥·瓦西列夫、佩伊切夫的剧本《第一次打击》、《警报》、《每一个秋夜》，安得列耶夫、博日洛夫、瓦普察洛夫、贾加罗夫、若特夫、伊萨耶夫、克尔帕切夫、马特夫、尼维亚宁、奥瓦迪亚、奥尔林诺夫、彼得罗夫、拉德夫斯基、拉林、斯帕索夫、汉切夫等人的诗歌 47 首。这些作品都是从众多作家的大量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了保加利亚人民所进行的历时二十余年的反法西斯斗争。新华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是另一部内容充实的合集，其中包括留·斯托扬诺夫、格·卡拉斯拉沃夫、塔列夫、卡尔切夫、卡拉利切夫、沃伦、埃·斯塔涅夫、博·赖诺夫、维任诺夫、海托夫、拉迪奇科夫、哈吉利耶夫、恰夫达罗夫—切尔卡什、若特夫、留,斯塔涅夫、马丁诺夫、奥·瓦西列夫、瓦·波波夫、纳科夫斯基、阿森诺夫、瓦塞夫、留茨卡诺娃等 22 位作家的精品。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白色的长椅》(保加利亚 20 世纪诗选),包括加贝、巴格梁娜、达尔切夫、伊萨耶夫、汉切夫、赖诺夫、彼得罗夫、若特夫、迪米特罗娃、麦托迪耶夫、拉林、博日洛夫、奥瓦迪亚、马特夫、贾加罗夫、斯特凡诺娃、佩内夫、奥尔林诺夫、卡拉安戈夫、甘切夫、列夫切夫、达米扬诺夫、肯切夫、绍普金、戈列夫等 25 位诗人的佳作。

介绍到中国来的保加利亚文学作品早期大部分是转译的，其中以从俄文转译的最多，其次是从英文、世界语、德文转译的。近二十年来，直接从保文翻译的作品已经占主要地位，如《爱的波折》、《探戈》、《季米特洛夫论文学、艺术和文化》、《伐佐夫诗选》、《傍晚静悄悄》、《夜驰白马》、《黑天鹅》、《甘纽大叔》、《两分钟幽默故事》、《白色的长椅》等等，以及散见于各文学刊物里的许多中短

篇小说、诗歌、剧本等，都是直接译自保文的。

另外，解放以后，中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对保加利亚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成绩。近年来，关于保加利亚一些名作家的评论文章不时在报刊，特别是外国文学刊物上出现。其中，《当代保加利亚戏剧述评》、《保加利亚近三十年小说纵览》、《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回顾》、《两次世界大战间保加利亚现实主义思潮》、《保加利亚诗歌中的中国革命》、《保加利亚当代文学漫谈》、《保加利亚的反法西斯文学》、《保加利亚当代小说中的几种倾向》,以及关于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波特夫、伐佐夫、斯米尔宁斯基、瓦普察洛夫、巴格梁娜、达尔切夫、维任诺夫、卡拉斯拉沃夫、马诺夫、古利亚什基、拉迪奇科夫、博希列克等作家的介绍，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许多关于世界文学史、东欧文学史的著作中也都有有关保加利亚文学的论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重庆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的《东欧文学史》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东欧文学史简编》。

值得指出的是，80、90年代还出版了许多关于外国文学的工具书，其中收有大量关于保加利亚文学和文学家的资料。比较重要的有：《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卷(30 条)、《世界文学大辞典》(50 条)、《外国名作家大辞典》(33 条)、《外国文学家大辞典》(176 条),《外国文学作品提要》(10 篇)、《外国名剧故事》(3 篇),《外国微型小说赏析》、《世界名诗鉴赏金库》、《外国抒情诗赏析辞典》、《外国有争议作品集》等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我国人民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日益增加。我们相信，在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努力下，今后一定会有更多不同风格的保加利亚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文学工作者也一定会写出更多关于保加利亚文学的专论。

人名索引

波波夫,瓦 Васил Попов
波梁诺夫,迪 Димитър Полянов
波普迪米特罗夫，波 Емануил Попдимитров
波特夫(保泰夫),赫 Христо Ботев
博戈米尔 Богомил
博日洛夫,博 Божидар Божилов
博亚吉耶夫，迪 Димитър Бояджиев
布拉戈耶夫，迪 Димитър Благоев
采尔科夫斯基，昌 Цанко Церковски
查内夫,斯 Стефан Цанев
察切夫,克 Климент Цачев
达尔切夫,阿 Атанас Далчев
达米扬诺夫，达 Дамян Дамянов
达纳伊洛夫，格 Георги Данаилов
达斯卡洛夫，斯 Стоян Даскалов
达维德科夫，伊 Иван Давидков
丹切夫,彭 Пенчо Данчев
德贝梁诺夫，迪 Димчо Дебелянов
德拉戈伊切娃，佐 Цола Драгойчева
德拉吉诺夫，麦 Методий Драгинов
德鲁麦夫,瓦 Васил Друмев
迪洛夫,留 Любен Дилов
迪米特罗娃，勃 Блага Димитрова
迪莫夫(狄莫夫),迪 Димитър Димов
迪切夫,斯 Стефан Дичев
丁科夫,伊 Иван Динков
东切夫,安 Антон Дончев
伐佐夫,伊 Иван Вазов
弗拉迪斯拉夫·格拉马蒂克 Владислав Граматик

弗拉伊科夫,托 Тодор Влайков
福特夫，赫 Христо Фотев
富尔纳吉耶夫，尼 Никола Фурнаджиев
富切吉耶夫，迪 Дико Фучеджиев
甘切夫,马 Марко Ганчев
戈里戈罗夫，克 Крум Григоров
戈列夫,弗 Владимир Голев
戈列夫,伊 Иван Голев
格奥尔基耶夫，科 Кольо Георгиев
格奥尔基耶夫，米 Михалаки Георгиев
格尔曼诺夫，安 Андрей Германов
格雷勃切娃，米 Митка Гребчева
格里戈里·察姆布拉克 Григорий Цамблак
格罗夫,格 Александър Геров
格罗夫,奈 Найден Геров
格诺夫,托 Тодор Генов
古利亚什基，安 Андрей Гуляшки
哈吉利耶夫，迪 Димитър Хаджилиев
哈吉伊斯基，伊 Иван Хаджийски
海托夫,尼 Николай Хайтов
汉切夫,维 Веселин Ханчев
赫雷尔科夫，尼 Николай Хрелков
赫里斯托佐夫，尼 Николай Христозов
基尔科夫,格 Георги Кирков
基里尔 Кирил
季米特洛夫，格 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
加贝,多 Дора Габе
贾加罗夫,格 Георги Джагаров
金切夫,察 Цани Гинчев

卡尔切夫,卡 Камен Калчев
卡拉安戈夫,卡 Петър Караангов
卡拉利切夫,安 Ангел Каралийчев
卡拉斯拉沃夫,格 Георги Караславов
卡拉斯拉沃夫,斯 Слав Караславов
卡拉维洛夫,留 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
卡兰菲洛夫,埃 Ефрем Каранфилов
卡林娜·玛林挪,Калина Малина
卡门诺娃,安 Анна Каменова
康斯坦丁·普雷斯拉夫斯基 Константин Преславски
康斯坦丁诺夫,阿 Алеко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康斯坦丁诺夫,格 Георги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康斯坦丁诺夫,康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科赫莉巴雷娃,纳 Надя Кехлибарева
科拉洛夫,埃 Емил Коралов
科斯托夫,斯 Стефан Костов
克尔帕切夫,赫 Христо Кърпачев
克勒斯特夫,克 Кръстьо Кръстев
克利门特 Климент
克鲁莫夫,博 Борис Крумов
肯切夫,尼 Николай Нънчев
拉德夫斯基,赫 Христо Радевски
拉迪奇科夫,约 Йордан Радичков
拉科夫斯基,格 Георги Раковски
拉林,拉 Радой Ралин
拉马尔 Ламар
拉伊切夫,格 Георги Райчев
拉兹茨维特尼科夫, 阿 Асен Разцветников
赖诺夫(拉伊诺夫),博 Богомир Райнов

兰科夫,尼 Никола Ланков
利利耶夫,尼 Николай Лилиев
列夫切夫,留 Любомир Левчев
留茨卡诺娃，维 Весела Люцканова
鲁塞夫,哈 Характан Русев
鲁塞夫,尼 Никола Русев
马丁诺夫(马尔蒂诺夫),伊 Иван Мартинов
马尔科夫斯基，文 Венко Марковски
马兰戈佐夫，马 Николай Марангозов
马诺夫,埃 Емил Манов
马特夫,帕 Павел Матев
马特耶夫,潘 Пантелей Матеев
马特伊·格拉马蒂克 Матей Граматик
麦托迪 Методий
麦托迪耶夫，迪 Димитър Методиев
米尔切夫,伊 Иван Милчев
米哈伊洛夫斯基，斯 Стоян Михайловски
米拉迪诺夫，迪 Димитър Миладинов
米拉迪诺夫，康 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ладинов
米兰诺夫,阿 Александър Миланов
米列夫,格 Гео Милев
米列夫,约 Йордан Милев
米舍夫,格 Георги Мишев
明科夫,斯 Светослав Минков
莫诺夫,托 Тодор Монов
穆塔弗奇耶娃，维 Вера Мутафчиева
内迪亚尔科夫，马 Малко Недялков
内米罗夫,多 Добри Немиров
内什科夫,维 Величко Нешков

内兹纳科莫夫，佩 Петър Незнакомов
内兹纳科莫夫，伊 Иван Остриков
纳科夫斯基，阿 Атанас Наковски
纳乌姆 Наум
尼科洛夫,尼 Нино Николов
尼维亚宁,伊 Иван Нивянин
帕翁诺夫斯基，伊 Иван Пауновски
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 Паисий Хилендарски
潘乔·潘切夫 Панчо Панчев
潘特列耶夫，迪 Димитър Пантелеев
佩内夫,博 Боян Пенев
佩内夫,佩 Пеньо Пенев
佩特坎诺夫，康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канов
佩伊切夫,伊 Иван Пейчев
佩约神父 Поп Пейо
普拉夫恰诺夫，西 Симеон Правчанов
普罗德夫,斯 Стефан Продев
齐达罗夫,卡 Камен Зидаров
齐达罗夫,尼 Николай Зидаров
恰夫达罗夫一切尔卡什，迪 Димитър Чавдаров-Челкаш
切尔诺里泽茨·赫拉伯尔 Черноризец Храбър
钦图洛夫,多 Добри Чинтулов
丘利亚夫科夫，克 Крум Кюлявков
丘柳莫夫,科 Костадин Кюлюмов
热切夫,屯 Тончо Жечев
塞麦尔吉耶夫，阿 Атанас Семерджиев
塞维尔尼亚克 Северняк
塞沃夫,科 Кольо Севов
绍普金,马 Матей Шопкин

斯拉维伊科夫，潘 Пенчо Славейков
斯拉维伊科夫，佩 Петко Славейков
斯拉文斯基，佩 Петър Славински
斯米尔宁斯基，赫 Христо Смирненски
斯帕索夫，茨 Цветан Спасов
斯塔马托夫，格 Георги Стаматов
斯塔尼舍夫，克 Кръстьо Станишев
斯坦涅夫(斯塔内夫)，埃 Емилиен Станев
斯特凡诺夫，迪 Димитър Стефанов
斯特凡诺夫，帕 Първан Стефанов
斯特凡诺娃，莉 Лиляна Стефанова
斯特拉蒂耶夫，斯 Станислав Стратиев
斯特拉希米罗夫，安 Антон Страшимиров
斯特雷尔科夫，洛 Лозан Стрелков
斯特鲁姆斯基，格 Георги Струмски
斯托扬诺夫，阿 Анастас Стоянов
斯托扬诺夫，拉 Рачо Стоянов
斯托扬诺夫，柳 Людмил Стоянов
斯托扬诺夫，札 Захари Стоянов
斯托伊切夫，斯 Стойчо Стойчев
索夫罗尼·弗拉昌斯基 Софроний Врачански
塔列夫，迪 Димитър Талев
特奥多罗夫一巴兰，阿 Александър Теодоров-Балан
特拉扬诺夫，特 Теодор Траянов
特伦内夫，伊 Иван Тренев
特伦斯基，斯 Славчо Трънски
托多罗夫，安 Ангел Тодоров
托多罗夫，佩 Петко Тодоров
瓦普察洛夫，尼 Никола Вапцаров

瓦塞夫,斯 Славчо Васев
瓦西列夫,奥 Орлин Василев
维尔科夫,克 Крум Велков
维利奇科夫,康 Константин Величков
维任诺夫,维 Павел Вежинов
沃德尼恰尔斯基，瓦 Васил Воденичарски
沃列夫,马 Матвей Вълев
沃伦,伊 Илия Волен
沃伊尼科夫,多 Добри Войников
乌提姆斯基,阿 Александър Вутимски
雅沃罗夫,佩 Пейо Яворов
亚森诺夫,赫 Христо Ясенов
伊戈夫,斯 Светлозар Игов
伊萨耶夫,姆 Младен Исаев
英卓夫,尼 Никола Инджов
约安 Йоан
约尔丹诺夫,内 Недялко Йорданов
约夫科夫,约 Йордан Йовков
约翰教区长 Йоан Екзарх
扎戈尔钦诺夫，斯 Стоян Загорчинов
扎列夫,潘 Пантелей Зарев
朱罗夫,多 Добри Джоров